

昭君 文化

1

ZHAO JUN WEN HUA



昭君文化
Zhao Jun Wen Hua

昭君文化

Zhao Jun Wen Hua

季刊/2013年第1期/总第1期

主 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 办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
内蒙古湖北商会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星亮 王 群 杨斌庆
陈瑞清 奇英成 汤爱军
林 幹 周天游 蒋 方
主 任 郝存柱
副主任 巴特尔 郝诚之 马 冀
常付田 赵前宽 陶明杰
编 委 周竞红 吴绪久 邹志斌
蔡长明 王占荣 李世馨
武高明 马晓波 武春香
贾翠霞 温 古

主 编 王占荣
执行主编 李世馨

责任编辑 秋 雪
美术编辑 谢 天

地 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亿峰岛物业
办公楼三楼

邮政编码 010020

电 话 0471-5263784 13015212148

邮 箱 13015212148@163.com

QQ 875790820

印 刷 呼和浩特铭泰精工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刘清泉 张玉英

准印证号 15-36Z/C

定 价 9.00 元



创刊词

《昭君文化》诞生了！

昭君文化这一社会科学概念自1997年提出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众多有识之士参与到研究、弘扬、传播的行列中来，各位从各自的学界、视角出发，多方位、多角度地探索分析，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使昭君文化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

《昭君文化》是昭君文化研究、弘扬、传播、开发、欣赏的阵地，是昭君文化研究新成果、弘扬新思路、开发新起点的展示平台，是昭君文化研究者、传承者、开发者、爱好者的交流平台，是昭君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展示和欣赏的平台。

昭君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非常广泛，是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昭君文化既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是先进的现代文化，是扎根于中华沃土的一朵奇葩。昭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世界共有的！她为人类世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加入历史的诠释，注入永恒的信心，让我们共同为这朵奇葩浇水育肥，让她永葆青春！

《昭君文化》是一朵刚刚诞生的幼苗，让我们共同努力，各显神通，浇灌她，培育她，让她成长起来，丰富起来，强大起来，盛开起来，成为参天大树！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 006 我与昭君文化 郝存柱

● 旧文新读

- 011 对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 林 幹

● 文化昭君

- 016 弘扬昭君文化,凝聚中国力量
——写在《昭君文化》创刊之际 郝诚之
- 019 “包容”与“共生”
——王朝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化差异性群体关系 周竞红
- 022 昭君文化的政治学意蕴 王建娥

● 文艺昭君

- 025 如何看待悲剧的王昭君形象 马 冀

● 历史昭君

- 032 山西境昭君出塞传说地名考释 刘溢海

● 传说昭君

- 039 昭君故事传说研究述评 赵可新
- 047 王昭君传说地缘小考 蔡长明

● 匈奴研究

- 052 关于匈奴文化 沈昌伟
- 057 战国至西汉初叶时期的民族关系初探 李志阳

●论 坛

- 060 昭君出塞与白羊城的地位 刘志尧

●新作苑

【传记】

- 064 我与昭君 乌日勒春香

【诗歌】

- 071 昭君颂 克 冰
 072 观电视剧《王昭君》 刘 立
 072 昭君村怀古(诗三首) 项小琼

【散文】

- 073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闲话昭君出塞 万 奇
 077 昭君,流淌在香溪的永远记忆 吴绪久
 079 在水一方有佳人 魏 平

●风物志

- 081 一条文化的河流 王 进

●访谈录

- 084 “昭君请嫁”访谈录 蒋 方 吉晶晶

●回 顾

- 087 中国第一个研究昭君文化的社会团体组织 李世馨

●作品窗口

- 093 《我与昭君》序 贾方舟
 094 马蹄飞处绽春香
 ——为乌日勒春香著书《我与昭君》宣言 萧 宽
 095 读乌日勒春香《我与昭君》 滑国璋



我与昭君文化

■ 郝存柱

《昭君文化》这一刊物要出版,作为昭君文化研究、传播的组织者、志愿者、见证人,想把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情况做个回顾:(一)昭君文化的提出和认可;(二)昭君文化研究;(三)昭君文化节;(四)昭君文化研究的展望。

一、昭君文化的提出和认可

西汉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两千多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直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达官显贵、骚人墨客,下至戍边将士、羁旅行役、市井细民,乃至思妇怨女,都曾为她的芳名、事迹而牵动内心的情愫。在民间长期流传着关于她的故事和传说,在她的故乡到处都可以见到她的遗迹,在她出塞途经的塞外甚至也出现了十几座昭君坟。围绕王昭君历史学家们也进行了无数的考证、探讨和争论,艺术家们创作了无数的绘画、雕塑、音乐、歌舞和各种各样的民间工艺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和文学领域,包括历代正史方志、地理游记、文史笔记等著作,涉及王昭君史料和评价的不下数百种,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超过 1000 多首、戏曲 50 多种、小说 20 多种,收集的民间故事已有 40 种之多。无论哪个朝代和哪个历史阶段都有歌咏王昭君的文学艺

术作品问世和流传。这些文化积淀都体现着当时人们对王昭君的认识和评价。

特别是解放后的若干年中,王昭君更加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陈毅、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曹禺、老舍、邓拓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都曾表现出对王昭君的极大兴趣。周恩来是最早谈到王昭君的,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高瞻远瞩,赞扬“王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革命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陆续发表了写王昭君的文章、诗词、戏剧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董必武的《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懣,舞文弄墨总徒劳。”在学术界也多次出现了昭君研究的争论热潮。

在两千年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那么多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同情,这就是历史,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这也是文化,是两千多年来的文化。这样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都是罕见的。

呼和浩特关注王昭君研究应该有历史背景,更有现实基础,昭君博物院(原昭君墓)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昭君墓,由于它的存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好多专家学者都要去昭君墓考察,他们为昭君墓、为呼和浩特留下不少宝贵的指导思想。如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中写道:“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放弃的,那就是被人们称之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呼和浩特的专家林幹和马骥先生也编著了《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一书,这些都为研究好王昭君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内蒙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历来是个大事,民族的团结和民族的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人民要团结稳定,党和政府要团结稳定,是党心也是民意,这是个实际问题,也是客观要求。如何把研究王昭君和这一实际工作结合在

一起,这应该是一个结点。1997年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如何把研究昭君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时,在众多专家提出昭君文化现象的基础上,又经专家、学者、领导、同志们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念——“昭君文化”。要研究昭君文化,把研究昭君文化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那个“结点”。当时提出的“昭君文化”研究,就是“弘扬昭君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昭君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尊重了历史、顺应了民意,是个科学的定位,也应该是好多领导、众多学者和热心于研究昭君的朋友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把这个“结点”结得更好,1998年昭君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我当时任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主动要求担任昭君文化研究会会长,日常工作由宣传部的同志负责,这个“结点”就真正地接上了。2000年呼和浩特市委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上产生了《关于加强首府文化建设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提出“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指导方针,这不仅确定了首府文化建设的方向,也为昭君文化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定了位,这时的昭君文化的研究是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方针也支持了至今为止的昭君文化节和文化节扩大的外延活动。

胡锦涛总书记“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理论的提出,加深了我们对市委《关于加强首府文化建设的意见》的理解,也深刻了对昭君文化研究内涵的认识,思想上提高了,认识上也有了飞跃。

从1999年开始,昭君文化研究会开始组织论坛,昭君文化节首届开始活动,到去年已经过十三届了,昭君文化的理念支撑了昭君文化节的不断召开。

从2003年以后,我们主持编写和出版了《昭君文化丛书》(5册)和长篇小说《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等,这不仅为昭君文化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深入研究昭君文化作了理性引导。

2009年,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将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原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评为“特别贡献奖”,将我评为“和平使者”奖,这首先肯定的是昭君文化研究会所提出的“昭君文化”这个创新理念。

二、昭君文化研究

昭君文化确切地说应该是1997年提出,经过调研和筹备,于1998年3月正式成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选举我为研究会会长,从1999年开始进行了首届昭君文化研讨会,到2012年成功地包括高层论坛举办了十三届。

昭君文化研讨会(包括昭君文化高层论坛)都是在昭君文化研究会主持下举办的。昭君文化研究会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提出昭君文化研究应该走出呼和浩特、走出内蒙古,于是我们向国家民政部提出申请成立国字号的民间社团,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挂靠了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08年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其间俞正声、刘云山、乌云其木格、陈奎元、杨晶、王群等同志都曾给予了应有的支持。特别要感谢俞正声同志(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并听取了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的情况,他的肯定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的成立为昭君文化研究拓宽了路子,首先地域上扩大了,走出了呼和浩特,走出了内蒙古;其次参加论坛的面也宽了,我们联系了多个党和国家部门及大专院校,联系到了全国各地研究昭君文化的不少专家和学者,和他们建立起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的密切联系。

从昭君文化研讨到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这不仅是个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容和层次上的变化。第一届昭君文化研讨会共收到8篇论文,是初探“昭君文化”这个概念。第二届昭君文化研讨会共收到13篇论文,对“昭君文化”概念有所突

破。最典型的是郝诚之同志的论文《昭君文化是先进文化》和林幹教授的论文《关于开展昭君文化的思考》,这两篇论文把昭君文化研讨引入正轨,肯定了昭君文化是主流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先进文化。第三届至第七届昭君文化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一届比一届多,对昭君文化的探讨越来越深刻。郝诚之同志的论文《再论昭君文化是先进中华文化》、刘颖同志的论文《昭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李世馨同志的论文《昭君文化是呼和浩特的特色文化》、李燕如同志的论文《喜欢王昭君,是因为人类需要和平》、马骥、伏凌涛同志的论文《昭君文化与建设和谐社会》等等,都突出了昭君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紧密联系。2007年以后的高层论坛,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省级领导伏来旺(时任内蒙古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董恒宇(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参加,也有博士后、教授参加,论坛集中对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王昭君的和平精神对当代人类构建和平的文明意义作了深入的探讨,对昭君文化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昭君文化和谐、和平、发展的理念在深入人心,昭君文化的研究还要不断深入,昭君文化的资源还得充分挖掘。

三、昭君文化节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是1999年开始的,到2012年共成功举办了十三届,每届都是呼和浩特市委、政府主办,宣传部和有关单位承办的(在我的主持下办了三届)。总结这十三届昭君文化节,大体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初探、尝试、展开、发展、提高。

首届昭君文化节称“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暨第六届昭君庙会”,之所以加了个庙会,当时应该是两个情况,一是文化部门已积极地准备了第六届庙会,而主要领导和我的想法是开始举办昭君文化节,这种结果就是把这两种想法结合起来,这样也顺应了同志们的某种心理,在工作上做了过渡。这次文化节确定了“弘扬昭君文化,

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的办节宗旨,共有10项具体活动,包括理论研讨、旅游文化、民俗文化表演、招商引资等。这一届文化节由于准备时间短,招商引资很不理想,好在给文化节开了个头,理清了办节的思路,明确了办节重点和办好节庆的支点。这可以说是对昭君文化节的初探。这届昭君文化节在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影响很大,引起了中央、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重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为昭君文化节批示:“在内蒙古自治区提出弘扬昭君文化不仅是内蒙古的一件大好事,而且是中国的一件大好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布伦为昭君文化节批示:“要认真考虑,要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意见。”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书记乌云其木格为昭君文化节和昭君文化批示:“这是件好事,应该提倡,请新闻媒体给予关注。”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国民为举办文化节批示:“弘扬昭君文化是内蒙古的一件大事。”还有好多领导做了批示。在这种形势下,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调研和论证,发出《关于加强首府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中提出“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指导方针,这个决定是市委常委会审定,全委会通过的。决定之后,2000年8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从此就把庙会停止了。这次文化节邀请了国内多位著名的艺术家与本地区的文艺团体,举办了大型的开幕式文艺晚会,在旅游、经贸洽谈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引进资金五亿多元人民币。这次文化节注重了把办节作为招商引资的平台,所以说应该是个大胆的尝试。2001年8月,“中国·呼和浩特第三届昭君文化节”举办,主题是“崛起的西部”,因为当时国家正实施西部大开发,所以确定了这个主题。活动的项目增到二十多项,与此同时举办了呼和浩特首届国际民间艺术节,收到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引进资金十一亿多元人民币,从此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也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100个民间艺术活动之一。这次文化节活动的项目更增多,规模扩大了,主题也十分明确,就文化节而言应该是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

2002年8月举办了“中国·呼和浩特第四届昭君文化节”,整体创意和策划突出了民族性、群众性、开放性的特点,以“青城与世界同行”为主题,开幕式晚会在中央电视台、内蒙古电视台、呼和浩特市电视台都播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届文化节多侧面、深层次地反映了呼和浩特的经济和文化特色,经贸洽谈项目达到55项,项目投资三十多亿元,各类的会展成交额也很可观。2004年“中国·呼和浩特第五届昭君文化节”与“中国·内蒙古首届国际草原文化节”合办,突出了草原特色、民族特色、政治特色、现代特色,体现了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和开放性,这次文化节共邀请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商家来呼洽谈、考察,达成合作的意向三十多项,协议资金额达五十多亿元。2005年市委、市政府为把昭君文化节办得更好,投资一亿多元对呼和浩特昭君墓景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景区由原来的100亩增加到205亩,内容也丰富了很多。2005-2006年的文化节引进资金额达到八十五亿多元。这个阶段的文化节重点突出、创意新的特点把文化节引向新的阶段,我们把这个阶段归纳为发展阶段。200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市委、政府决定把第八届昭君文化节作为自治区大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省长罗清泉同志有贺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书记王群同志有贺词,第八届昭君文化节再次和内蒙古第四届国际草原文化节合办,同时开始举办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同时也将昭君文化的品牌进一步提升。以后的几届昭君文化节都和民族商品交易会同行,经济效益全都成倍地增长,去年洽谈项目达600亿元。这个阶段的昭君文化节外延不断扩大,效益明显提高,对昭君文化节来讲应该是个提高的阶段。经过多年的努力,“昭君文化”已经成为呼和浩特的名牌,昭君文化节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对内投资的文化交流平台,也是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全国上千个节庆活动中脱颖而出,被连续评为“中国十大节庆”、“节庆中华奖”、“中国十大节庆城市”

等。实践证明,通过昭君文化使呼和浩特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呼和浩特这个历史名城的深厚底蕴,促进了呼和浩特与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四、昭君文化研究的展望

我们把昭君文化的理念归结为“和谐、和平、发展”,而“和谐、和平、发展”应该是个永恒的主题,所以说昭君文化不仅要研究,还要传播,不断研究就是传播的过程,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任重而道远。我们正在不断发现和挖掘昭君固有的资源和力量,为研究好昭君文化开辟新的途径。根据多年昭君文化研究的实际和去年以来市委、政府领导前所未有的重视,有些想法还想让所有热心于昭君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同志们以及领导提出意见并予以支持。

1. 昭君文化是呼和浩特的特色文化,昭君文化节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对外联系的平台,应该持之以恒地办下去,不能因为领导的更替而改变力度,昭君文化研究发展到现在确实来之不易,它能把文化研究工作和社会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昭君文化对民族工作、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昭君文化与和平文化的研究,昭君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昭君文化与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研究,昭君文化与统战工作理论的研究,昭君文化与企业文化及昭君文化产业的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很多都值得研究。昭君文化现象已存在两千多年了,但仍然是常讲常新,这充分显示出昭君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包容性,任何文化不可替代。《昭君文化》刊物的问世,想把昭君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凝聚起来,使他们的学习、研究、交流形成一个常态的环境。

2. 昭君文化研究的水平要不断提高,现代意识要更加突出。研究的水平一方面是理论的深度要加强,要有更多的高品位、高水平的论文、著作,另一方面实际意义要加强,要产生能够对国家、地

区和领导同志提供有价值的、有可行性的咨询和建议,促进地区(包括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这样,我们昭君文化研究会就会发挥既是学术社团,又是政府、社会的智囊团和咨询部的作用。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学会的影响就会自然扩大。

3. 昭君文化研究的队伍要不断扩大,自古以来研究和关注昭君的人很多,现在有了组织(昭君文化研究会),研究和关注昭君的人就会更多。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学者、文学家、企业家及各地、各民族的人民群众都会参加进来。昭君永远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昭君文化具有地域性,但更具有全国性和世界性。我们要充分认识昭君文化研究的这种优势。要把国内外有较高水平的专家吸引过来,进一步扩大昭君文化的影响,特别要注意培养中青年昭君文化研究者,要以特殊的手段支持他们,还要多吸收他们入会,使昭君文化研究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4. 昭君文化的国际影响也应加大。随着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天下仍不太平的情况下,和平、发展、合作更显突出,文化要先行。昭君文化也要不断走向世界。目前在东南亚、部分西欧国家也有昭君文化的影响。在今天和平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昭君文化也将会给这一主题以有益的启示。

5. 关于昭君文化企业、文化产业、文化设施、艺术作品创作等,目前有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院、兴山昭君文化园,还有以昭君命名的企业品牌、昭君艺术作品,而且越来越多,这应该说是很好的基础,要以此作为引导。有的同志已经做了很多的考虑,要新建昭君书画院、昭君大营、昭君生态园等,还要制作昭君动漫、昭君电视剧,这些都是很好的思路。我们要为昭君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支持、配合和帮助,为成全昭君文化的事业、企业做出贡献。

作者郝存柱,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会分会会长。



对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

林 幹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每年都举行昭君文化理论研讨会,看来“昭君文化研究会”和学术界都很重视昭君文化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所谓理论研究,就是指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到“昭君文化”这个范畴和学术领域中来。理论是用来驾驭史料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昭君文化的研究将会失去正确的方向。但理论不能代替史料、抛弃史实。那种离开史料和史实去空谈理论的治学方法是不足取的。故从理论上去研究昭君文化,必须以第一手资料和确凿的史实为依据,然后用科学的理论去驾驭它和处理它,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不是堆砌史料,更不是用史料去代替史学和文化的内容。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反过来又能推动实践并预示实践的行程,故不能轻视。昭君文化内容丰富,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很多,这里仅能举出几点,略抒一得之见。

一、昭君文化的性质和内涵

何谓昭君文化?昭君文化就是以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和昭君出塞远嫁漠北匈奴政权的杰出首领呼韩邪单于的历史事件为标志,实现了漠北地区与中

原地区的政治统一；出现了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民族团结的局面，出现了北方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属于中华民族传统范畴的优秀文化。换言之，昭君文化就是以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为基础，以昭君出塞为标志，以建设和提高内蒙古首府文化及促进内蒙古经济文化发展为目的，有助于孕育民族团结的凝聚力的优秀文化。

昭君文化虽属文化范畴，但“文化”这个概念，在目前国内外学者中对它的认识尚不一致，众说纷纭。而且文化又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分，有时“文化”还往往与“文明”并提。

那么昭君文化究属物质文化，抑属精神文化？昭君文化与昭君文明又有何区别？我个人认为：第一，文化是人类克服自然的程度的表现。因为克服的程度不同，因而各个民族的文化程度，发展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有文有野。但因克服工作不断进行，克服手段不断改进，因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文明不断进步。第二，人类在克服自然的过程中，因制造工具的材料不同，或用石器，或用铜器，或用铁器，因而反映了人类克服自然的三个不同时代——石器文化时代、铜器文化时代和铁器文化时代。第三，人类克服自然的结果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态就谓之文明。例如劳动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战斗武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等，都是文明的表现形态。因之，文化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明也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昭君文化主要属于精神文化，它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形态就是昭君文明的形态。但昭君文化也不是完全没有物质因素，例如昭君墓、碑，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昭君品牌的商业和企业等，都是属于昭君文化范畴中的物质因素和物质文明形态。故在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主持下编撰中的这套《昭君文化丛书》，既有专从历史、文学、艺术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论述，也有如《昭君画册》（丛书之一）所收集的属于物质文化方面的器物和艺术品种（照片和拓片）。

昭君文化既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组

成部分，故研究昭君文化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虽然昭君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性和特定内容，但特性也是作为共性的基础之一而存在的。故研究昭君文化不能离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整体而孤立地进行，必须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整体中去把握它的特性，注意正确阐明昭君文化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特殊作用。

二、昭君文化形成的过程

王昭君是公元前33年（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出塞的。早在昭君出塞前的十八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自汉初以来约一百五十年间（公元前201—前51年）匈奴与汉朝对抗的局面已经扭转，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漠北匈奴政权业已归附汉朝，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的领导，成为汉朝的藩属，漠北与中原已经统一。因此呼韩邪才会于公元前33年由漠北前往汉朝首都长安朝见汉帝（这是呼韩邪归附汉朝后第三次入汉朝见汉帝），并在朝见期间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即愿当汉家女婿以便与汉朝进一步亲近），汉元帝才会把王昭君许配给他为妻，这才会出现“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件。

呼韩邪的附汉及漠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汉、匈两族的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中有漠北游牧经济与中原农业经济互相依存、互相调节、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有漠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互相结合、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基础。因而昭君出塞后之所以能够出现北部边塞六十余年“黎庶（人民）无干戈之役，数世不见烟火之警（没有战争），牛马布野，人民炽盛”和两族开关“合市”的繁荣局面，以及汉、匈两族长期友好团结合作的关系，都是建筑在上述漠北与中原的政治统一、匈奴与汉族的民族团结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协调、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由于昭君出塞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产生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后人对她的崇敬和景仰。因此两千多年来,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词、戏剧、小说、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电视剧、歌剧、舞剧、现代交响乐、邮票等作品,连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女子能够受到历代如此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长期的倾心和青睐。唐代初期(公元7世纪初期)以后,在各地又出现了许多昭君墓,其中以坐落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青冢”出现最早(约出现在唐初),也最为著名。进入近代,外国(如日本、越南、英国、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家)也有学者在研究王昭君并发表了一些著作。从此昭君这个人物越出了国界,逐步登上了国际舞台。

以上都是属于与昭君有关的文化现象(文明形态)——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逐渐普遍化和大众化。在我国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昭君”命名的商品和企业也出现了,如昭君烟、昭君酒、昭君绒毛衫、昭君大酒店、昭君商店(专售妇女用品)……均驰名中外,因而昭君文化又扩展为昭君企业文化。

由于昭君出塞事件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凝聚各族各阶层人民,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而呼和浩特市“青冢”(不论是真的或是假的),尤其被各族人民视为“民族团结的象征”,长期受人瞻仰。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去研究昭君问题的专家学者日益增多,有关昭君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不断举行,学术论著时有出版。2000年6月在呼和浩特市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还成立了研究昭君的专门学术机构——昭君文化研究会。因此“昭君文化”的命名正式被提出、被公认,并聚集了一批有志于研究昭君文化的学者和对昭君文化有兴趣的人,对昭君文化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于是“昭君文化”的名称正式形成。随着昭君文化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作为一门新兴的学

科——“昭君学”也可能建立。

三、对涉及昭君文化的若干理论问题的辨析

(一)昭君文化是以昭君出塞和亲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但昭君出塞这个历史事件涉及政治方面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较多,常常被一些非马列主义者所误解或曲解,混淆视听,故须辨明,例如史实表明,昭君出塞和亲是扮演着一个民族友好使者的角色,但有人认为她是一个“特务”,是汉朝派往匈奴单于庭的一名“国际间谍”。又如昭君出塞时远嫁至漠北的匈奴地区,当时早已成为汉朝的藩属,漠北地区业已和中原地区统一(至唐朝则正式列入中国版图)。但后来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漠北地区在清朝初年以后称为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称蒙古国)。那么当时漠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是属于外国的历史文化?匈奴族是属于中国民族,还是属于外国民族?汉、匈关系应按国内民族关系处理,还是按国内民族与外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这些问题,我在拙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章业已辨明,即匈奴是中国民族,1921年外蒙古独立前漠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漠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属于中国文化,漠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包括匈奴)与中原汉族的关系按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此外,在另一本拙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四章还有专论“匈奴是中国民族”的章节。《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一书受到党中央的鼓励,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又如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游牧经济文化与农业经济文化是不能调和的,只能是对立,因此提出了“游牧文化圈与农业文化圈二元对立”的错误理论。这种理论,我亦于拙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第十章中予以辨正。

上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去研究、去分析,是很难加以正确阐明的。

(二)昭君出塞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巩固和促进民族团结。而我们今天研究昭君文化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从理论上阐明一下有关民族团结的问题,将有助于昭君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一种政治现象,它在阶级社会中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结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是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马、恩还举例说,如各个部落的敌视、袭击和防止被袭击而联合起来等等。因此在古代,有时许多部落便组成部落联盟,如匈奴部落联盟、东胡部落联盟、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早期蒙古的蒙兀室韦部落联盟……这些部落之所以要联合,除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外,还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才使他们不得不组成一个联合体。故古代民族团结的情况,有的是在总体利益一致之下的团结,有的是在局部利益之下的团结,还有的则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和特殊的条件之下的团结。

民族团结问题属于历史范畴,是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经济文化形态,特别是受阶级的影响与制约的,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但在总体上来说,是不断前进的和不断改善的。严格说来,真正的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建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才开始实现的。这是民族平等团结关系的新的里程碑,而这个新的里程碑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由旧里程碑逐步演进才达到的。

须要注意: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我们今天却要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历史上各民族不平等的地位和现象,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民族平等团结关系是相对的,我们既不能以今天民族团结关系的性质、标准和内容为尺度去否定或贬低历史上的民族团结关系,也不能无视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把历史上的民族团结关系与今天的民族

团结关系等同起来。此外还应注意,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民族团结关系的建立,大多是在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自我保护之下孕育、发生的,是以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的局部功利为条件的。那个时期的民族团结关系的建立,大多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

例如上述汉宣帝时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之所以愿意归附汉朝,主要原因在于他当时被郅支单于(呼韩邪之兄)击败,漠北单于庭(统治中心)被郅支占领,他率领部众仓促南逃,处境艰难,且将会受到北面郅支和南面汉朝南北夹攻的危险。正如他的重臣左伊秩訾王所说:“今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所以他不得不投到汉朝一边,在汉朝的保护下,在今内蒙古呼、包二市一带驻牧了8年。及至郅支统治乖方,在漠北无法立足,西迁中亚之后,他才回到漠北的单于庭去。公元前36年,郅支在中亚被汉将陈汤发兵击杀,呼韩邪又感到他原先在郅支与汉朝之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失去,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政权和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取得汉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才于公元前33年再一次入汉觐见汉帝,并提出要当“汉家女婿”的。而汉朝也是为了保持漠北地区的稳定和北部边境的安宁,宣帝和元帝才先后答应他的附汉请求和把王昭君嫁给他为妻的。故后来呼韩邪把王昭君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妾之义),意即匈奴得了昭君为妻,从此匈奴(胡)部族可获得安宁。汉元帝亦把昭君出塞之年(公元前33年,建昭五年)改为“竟宁”元年(汉代“竟”即“境”字,故“竟宁”即边境安宁之义)。这就可以表明当时双方民族团结关系的实质和政治内容。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虽不时发生矛盾、冲突和战争,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通过战争以外的种种方式,如和亲、迁徙、杂居、通婚、政治交往、经济文化交流等,都推动着各族之间,特别是推动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改进,其主流和总趋势是融合和

团结的因素愈来愈增多,隔阂和分离的因素愈来愈减少。其间各族人民群众的和平相处、频繁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成为贯穿整个中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根轴线,成为各族之间紧密团结的社会基础。故研究昭君出塞和昭君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于此可见。

四、要用 21 世纪的眼光去 研究昭君文化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现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故以民族团结和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为内容的昭君文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立足内蒙古,面向全国,跻身世界,以 21 世纪的新眼光去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扩大它的内容,使它适应 21 世纪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并提高自身的价值,启示未来。

当今世界的主题虽是和平与发展,但国际性区域间的纷争仍不断出现,世界仍不太平。国际纷争的原因很复杂,而民族问题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扮演民族友好使者角色的王昭君,不仅受到中华各族人民的极大敬仰,而且也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族人民的普遍重视和欢迎。在世界历史上,哪一个民族内部不团结或哪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彼此互相敌对,其后果必然招致本民族自身的削弱或受到外国、外族的欺凌。故昭君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其意义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其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今后中国将会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多地吸收外资和扩大与各国的贸易往来。因此由昭君文化导致的昭君企业文化,其作用显得特别突出。21 世纪的世界是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贸易竞争十分激烈。而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创新”是夺取经济竞争、贸易竞争和企业竞争最有力的制胜手段。故创新精神既是昭君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企业文化的生命力。昭君文化的创新,包括挖掘有关研究昭君文化的新资料,提出新理论,新见解,运用新方法,写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著作。而企业文化的创新则包括原料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和经营管理的创新。因此各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懂得:要使国力增强、财富增值,必须繁荣经济;要使经济繁荣则必须依靠企业兴旺,而企业之能否兴旺,关键在于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故企业文化的创新必须与昭君文化的创新结合起来,使企业文化具有民族化、多样化,并带有昭君文化的斑斓色彩和新时代的精神,这样企业本身的生命力也就增强了。

《光明日报》2002 年 5 月 9 日(A4 版)有一则以《呼市用“昭君”打造城市名片》为题的报道,反映了我们要用 21 世纪的眼光去研究昭君文化的观点。现摘要录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被公认为我国‘民族团结’象征的历史人物王昭君,正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对外交流合作的‘代言人’。前不久,国家旅游局将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确定为全国 100 个民间艺术节活动之一。以弘扬昭君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为宗旨的昭君文化节,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文化经贸平台。自 1999 年举办以来,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呼市将利用‘昭君’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打造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文化品牌,以加快呼和浩特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步伐。……每次昭君节,海内外客商云集,各国艺人荟萃,成为呼和浩特走向世界、展示形象的名片和平台。今年,昭君文化节将更加突出‘呼和浩特与世界同行’的主题。”

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做到“昭君文化与世界文化同行”,与时代并进!

作者林幹,男,汉族,内蒙古大学教授,
北方民族史专家。



弘扬昭君文化，凝聚中国力量

——写在《昭君文化》创刊之际

■ 郝诚之

一、以史为镜，多元一体是国情

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在中国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史料也记载，王昭君，姓王名嫱，是两千多年前生长于长江支流香溪河畔的平民女子。选入汉朝王宫，当过“待诏掖庭”；自愿出塞平等和亲，被匈奴部落首领呼韩邪单于尊为匈奴王后“宁胡阏氏”，受到草原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至今，在黄河两岸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还屹立着以她命名、四季享祭的“青冢”多座。1959年在庆祝包头钢铁公司一号高炉出铁剪彩的晚宴上，周恩来总理端起了“昭君牌”黄酒，高兴地说：“昭君出塞，为蒙汉民族的团结做出了贡献。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革命的昭君到内蒙古来，加强蒙汉民族团结，建设好祖国的北部边疆。”1961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呼和浩特，细细读过关于昭君的碑文石刻后，写下了有别前贤、气壮山河的名诗《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舞文弄墨总徒劳。”台湾学者说得好，我们不是说汉族奇女子昭君有扭转乾坤的能力，而是说她小小年纪就胆识过人，能挺身而出和

亲,化干戈为玉帛,从而巩固和加强了汉、匈两个民族的团结友好,故高风亮节流传至今。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1961年秋深入内蒙古考察后,在《内蒙访古》一文中发出如下感叹:“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忘掉的。那就是被称作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翦伯赞《内蒙访古》,《人民日报》1961年12月13日)

昭君出塞及其影响的文化现象正在被重视、被研究,归类为“昭君文化”。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郝存柱先生对笔者说:“昭君文化已不是一个美女的文化、单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天下一家、玉帛交欢’的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因为昭君出塞是平等和亲,不是清朝的‘公主下嫁’,因此是两千年前‘北有强胡、南有大汉’双方自愿的正确选择。马背民族唱着‘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的牧歌,汉代诗人吟着‘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的新诗,友好相处于长城脚下,雄辩地说明中国的国情是”多元一体,华夏一统;合则双利,分则两伤。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我中华民族硕果仅存、历史从未中断?就是因为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讲信修睦,海纳百川。内蒙古大学林幹教授深刻指出,胡汉和亲,结束了汉匈两族一百五十年(公元前201—前51年)来的战争状态;打破“自三代(夏、商、周)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虽败不称臣”的对峙局面,结束了匈奴二十余年来的分裂状态,迎来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传》赞)的太平盛世,北方人民获得休养生息达60余年。“单于天降”、“单于和亲”的汉代瓦当如今成了国宝;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千古佳话代代相传,久唱不衰,就是因为它记载了国史,记录了民意。

二、以民为本,人心向背看兴衰

人心向背是中国力量的风向标、中国信心的

奠基石。人民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依靠。

“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靠什么?为什么?据内蒙古大学马冀教授不完全统计,“历代正史、方志、地理、游记和文集、笔记、诗话等著作中涉及王昭君史料和评价的近一百种;历代歌咏王昭君的诗词近一千首;戏曲约五十种;小说约二十种;已搜集的民间故事约十五种”。还不包括古韵新声的昭君电影、电视剧、交响乐、蒙古语说书和知名品牌的昭君茶、昭君脐橙、昭君黄酒、昭君山庄、昭君大酒店、昭君旅行社等等。据遵照周恩来总理遗愿写出话剧《王昭君》的曹禺先生回忆,为了采风,他“两次深入内蒙古草原,听了著名歌手马头琴大师琶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曹老说,他“喜欢活在草原人民心里的王昭君,也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悦的姑娘”,“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笔者在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听过王昭君与饮品奶茶、与食品酿皮、与化妆品白粉的民间故事,深受感动。在兴安岭下的科尔沁草原上,笔者得知哲里木盟的广播电台蒙文部连续十多年每周定时播出蒙古语说唱艺术家道尔吉先生的《王昭君》长篇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期也未中断,这是何等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啊!

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从长江、香江边,到恒山、阴山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小提琴协奏曲、青铜雕塑和仿“汉画像石”墨玉艺术连环画壁画共三大类艺术家的昭君作品。一是因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海内外的大师陈钢先生,在1986年献出一部抒情、写意相结合的大型作品——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二是广东著名雕塑家潘鹤教授,完成了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夫妇双马并辔徜徉草原、艺术性和思想性融为一体的大型青铜雕塑《和亲》。三是山西大国画家周鼎先生和内蒙古散文家贾勋先生合作的一套30幅的墨玉艺术壁画《昭君出塞》。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于1986年11月,在香港、上海,由作曲家陈钢、演奏家西岐崇子联袂首演,大获成功,被誉为“《梁祝》的姊妹篇”。雕塑《和亲》至今高高矗立于

黄河边的昭君墓前,被内蒙古人民称作“民族团结的象征”。墨玉连环画艺术壁画《昭君出塞》展出于呼和浩特“九边第一泉”景区,游客评价“艺术精神直追古风,皆有汉魏六朝艺术韵味和匈奴时代阴山岩画的原始情趣”。(贾勋《青城风物过眼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三、以和为贵,共筑中华强国梦

2007年3月,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提出了“研究中华史,提倡大国学”的观点,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和谐。这是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伟大礼物。”(《光明日报》2009年4月8日第12版)

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梦。从古代《易经》的“太和”观念,周太史史伯的“和实生物”论断,到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光辉命题;从老子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康设想,到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文化自觉,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和谐这个伟大理想的追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或者说和谐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一以贯之。作为一种普遍精神,和谐含摄了儒、道、墨、释,成为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灵魂。和谐文化传统在多元综合的基础上通过合作与交流而生生不息,体现了中华民族东方哲学的价值取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和精髓。

为什么刘云山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时,要高度重视“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批示肯定“在内蒙古自治区提出昭君文化不仅是内蒙古的一件好事,而且是中国一件大好事”?要求“研究昭君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见郝存柱主编《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94页)

为什么俞正声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湖北省委书记时,要为《昭君文化高层论坛》题词:“昭君出塞是中华民族和谐相处的象征,昭君文化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指出:“因昭君出塞和亲而逐渐形成的昭君文化,是湖北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弘扬的结果,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共同推进昭君文化的发展”。

为什么杨晶同志任内蒙古省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时候,要在《关于加强首府文化建设的意见》(呼党发[2000]22号文件)中突出三句关键词:“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一再强调:“昭君文化基本内涵是民族团结,而民族团结又是我们遵循党中央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办昭君文化节对于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历史内涵,全面展示草原文化的时代风采,扎实推进民族大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高瞻远瞩,盛赞昭君是“为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有贡献的人物”。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时,胡锦涛主席接受世界著名媒体采访,坦陈“我的心愿”和中国人民一样,是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全世界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所见略同,其深意何在?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头版)

从党的十五大,我们党正式把“中国道路”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概念对接,到十六大以后又进一步把“中国梦”的目标定

位,由六个字的“富强民主文明”扩展为八个字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说明我们党对国情把握更加清醒,对大国担当更加明确。(陈晋《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梦》,《光明日报》2013年3月19日第4版)“沧桑历尽春犹在,又是青冢拥黛时”。中国梦,说到底是人民的梦、和平的梦、和谐的梦。《昭君文

化》季刊此时应运而生,堪称幸逢盛世,正当其时,大得人心。我衷心祝愿它为弘扬昭君文化、凝聚中国力量、同心共圆强国梦而集思广益,风来八面,和鸣万家,越办越好!

作者郝诚之,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包容”与“共生”

——王朝中国与当代中国文化差异性群体关系

■ 周竞红

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最有活力的社会,也是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建基于不同理念的社会包容,其社会影响力、社会结果亦殊异。现代社会在尊重基础上不同文化差异群体人口的广泛互动中形成包容并促成差异文化群体的共生才是和谐的社会,这种社会才最具影响力和持久性。

中国漫长的王朝国家历史上并不缺少处置差异文化的经验,甚至不缺少包容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王朝中国的发展方向,对王朝社会的整合与差异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也有着直接影响。从王朝中国到当代中国,社会内部文化差异一直都显著存在,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融合与分化也动态地发展着。王朝中国差异文化间形成了相当的包容,正是包容促成差异的文化间的联系随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加深,但是终究王朝中国

差异文化间包容建基于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教化、归化基础之上,建基于中央王朝政治强势和强权基础之上,而不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王朝中国差异文化间包容常常服务于各不同文化间统治阶层的利益和目的,而是不为着民众的福祉。在当代统一多民族中国社会生活中,对差异文化的尊重与包容是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平等成员基础之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重要目标,一切发展均以服务大众为指向,因此,在社会生活实际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仅仅是思想观念问题,也是推进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实践问题。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推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达成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尊重与包

容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核心和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中国各民族走向平等、团结的重要条件。

——在王朝中国冲突和包容中共生是历史国情。

王朝中国发展在数千年间一直面临着处置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冲突不仅表现于不同政府集团之间政治资源的竞争,还广泛表现于自然资源的竞争,竞争关系恶化便使双方最终走向战争,当然,在竞争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包容,包容的极端形态则促成了差异文化间社会历史文化的涵化,长此以往则促成了王朝社会的整合,以及华夏文明体系的开放性和扩展性。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差异性文化群体的记载,如《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由这一记载可推知,“华”或“夏”所居的“中国”已进入较为稳定的农业发展时期时,“夷”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还处在“不火食”、“不粒食”的阶段,他们在衣、食、语言和习俗上有着自己的特征,“华”或“夏”所居的“中国”社会发展优势显著,其文化优越性也得到强化。这些差异的文化群体之间常常因着不同政治势力或政治集团的竞争或对决而发生直接冲突,而且每一次冲突都会给民众带来血的代价,这些冲突在王朝政治的框架下,虽然可以找到各种充满歧视性的语言和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且随着关系的冲突以及强势政治确立过程而变化,并且从未被解释为有着清晰的疆域边界和权益边界的关系,人们总是会找到一些路径,使这些冲突被解释为社会失序或失范,社会政治清明问题,而不是势不两立的差异性文化群体之间持久的问题,甚至将文化间的融合以“用

夏变夷”处置之。因此,王朝中国差异性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亲疏不同的差序,一些与中央王朝关系更亲密的群体则最早脱离“非我族类”之境遇,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后成为华夏文明成员,并由此将“非我族类”进一步指向远人。“华夷之辨”的地域范畴也是随着中央王朝政治影响的状况处在一个扩展的动态过程中,是不固定在一个特别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朝中国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张力正是在冲突与差序的包容之间变迁,在冲突中包容,在包容中冲突,使王朝中国的历史成为差异性文化之间竞争、融合、创新、共存共生的动态过程。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王朝时期差异性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并非发生于不同文化群体间广泛接触的基础上,多是基于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冲突的解决事实上也是统治集团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尽管军事实力较量成为决定冲突地位的重要条件,但是,维护双方关系的主要条件仍然是经济、文化和社会需求。

王朝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包容性的形成受到“天下”观、“大一统”观和教化观的强烈影响,在这些观念影响下建立了跨多样文化而运行的王朝中央政治,为包容社会的形成设置了具体框架。此外,由于战争、灾害或政治动荡所形成的人口融合大约是社会包容性扩大的一个基本社会条件,正如贾敬颜先生曾在研究古代社会游牧文化传承时深刻指出的:“国家的分裂灭亡也好,民族的移动和迁徙也好,人总不会跑光死绝的,历史的业绩也总会有痕迹遗传。情况常常是失败者转入胜利者的队伍,以胜利者的名称或另立第三外名称而出现在历史上。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匈奴为鲜卑所代替,其人冒名鲜卑;及匈奴被汉朝驱逐以后,其老弱妇女另立所谓悦般国。”这是对游牧社会文化传承的生动描写,对于农耕文化而言,在政治势力的大变迁中,农耕者也不过是从为前一个胜利者纳捐税转向为后一个胜利者纳捐税,影响他们态度的最关键因素是王权,而不是文化样式。可见,王朝中国差异文化群体的包容建筑于政治强势基础之上,尽管王朝中央政治将其国家构

造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形态,但是,兄弟之间关系的维系是一个“长幼有序”的尊卑关系。

——民族平等、团结基础上尊重与包容的现实国情。

当代中国脱胎于王朝中国的废墟,近百年的时间才推动了国家的重大转型,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主权国家的过程,也促成了王朝中国区域内差异文化群体间关系转型的新局面的形成,差异性文化群体间关系也从围绕中央王朝分布的“五方之民”转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平等成员,民族平等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理论价值。

民族关系平等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都曾进行过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探索,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合群救国”,直至抗日战争中整个社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体认。从差异文化群体关系的角度来看,王朝中国向主权中国转型进程中产生了寻求包容共生的新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五方之民”分布格局转型为具有文化差异的民族单元分布格局,“五方之民”差异性文化群体单元之间的关系也转型为民族群体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化性的重要趋势之一。民族及其相关理论成为重置差异性文化群体关系的核心系统,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团结理念指导下,寻求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包容和共生问题。尽管中国的民族理论对前苏联有诸多的学习和借鉴,但是,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方面中国仍然顾及到了自身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因而民族区域自治并未被设计成民族自治,其原因也在于民族群体“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设置不同民族包容共处的制度,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考虑到各民族团结问题,同时也顾及到具体民族群体的统一问题,通过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不同行政层级自治机关的设置,以确保各民族的权益均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将民族平等、团结目标融入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使差异性文化群体之间达成“尊

重差异,包容多样”有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基础,这便是当代各民族继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依据。

当代中国正以非常的速度发展着,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改革都在回应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告诉人们,尽管这个社会有了诸多的变革,在处置差异性文化群体关系方面发展了诸多新理念、新制度,时人仍不能天真地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成功解决了包容与共生的根本问题,因为,社会变革、新理念、新制度还不会直接带来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包容,不过是为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包容提供了良好条件和空间,在这一条件和空间中,社会仍然需要克服封建帝国时期形成的差序包容理念影响,面对诸多的实际问题,在新理念、新制度的指导下解决更多具体而微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形势,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与维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包容多样,追求共生的社会环境愈来愈复杂,愈来愈难以把握,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供我们借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演变、社会发展进程中内部矛盾的解决均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复杂因素,民族地区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如3·14和7·5事件发生后,引发国内外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质疑,有些人则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公开发表否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观点,认为取消“民族”和民族政策可以免除相应的麻烦,民族自治地方也有一部分人未能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个仍然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进一步完善的制度,不能正确评价和认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随着中国日益走向国际社会,某些怀有强烈优越感和中心主义的欧美人士或组织,为满足自身的利益和需求,恶意解读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变化,一味地期望着中国全盘西化,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本身社会管理制度、措施等仍存在着诸多的不完善性,存在着对民众利益的实际侵害,凡此种种,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态势,使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的复杂形势所带来的

不确定性并不能成为否认我们基本政治制度的理由, 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仍是进一步解决面临问题的出发点, 探索在既有的政治制度基础上不同民族在新挑战面前的包容与共生才是当代人的基本责任。

总之, 多样性是自然环境的特性, 也是人类社会的特性, 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王朝中国曾长期面对并处置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昭君现象实际上便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关系进程的重要表征, 也是王朝中国中央政府与处置“五方之民”关系的常见现象。在王朝中国时期, 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为了处置相互间合作且竞争的关系, 发展出了诸多方式, 其中最极端的是战争, 兵戎相见是双方和解的一个前提, 在和解的状态下, 和亲、互市等社会性联系便

成为满足双方需求的重要形式, 正是在战和的变化之中, 两种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 这事实上也是王朝国家转型进程中国家整合的基本历史条件。在现代中国条件下, 昭君文化在地方社会的彰显则是多民族社会对历史资源的进一步挖掘, 在各种差异性文化接触日益广泛和常态化条件下, 给予历史上昭君现象的文化正确解读, 是寻求处置差异的文化之间合作、和平、和谐路径, 保障社会生活健康运行的现实需求。昭君文化在地区间和不同民族间提供的基本社会联系也将进一步印证“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是社会生活进步、繁荣的重要环节, 更是今天保障中国社会各民族成员之间平等、团结的重要条件。

作者周竞红, 女, 汉族, 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昭君文化的政治学意蕴

王建娥

2009年10月26日至30日, 昭君文化2009高层论坛在昭君故里湖北兴山举行。笔者有幸参加这一盛会, 聆听与会学者专家对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历史影响的讨论, 深受启发。从而产生从现代族际政治学的角度, 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发掘其中蕴涵的政治学意义的冲动。本文就是在当时会场上生发出来的一些感想的基础上写成的。肤浅与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关于昭君故事的原型及其影响的研究, 已经有许多专家写出了大量的文章。笔者不需要在此

班门弄斧。本文只是就昭君故事关涉的概念: 族际交往, 族性的本质, 族际关系的构建, 昭君行为的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一、族际交往的形式及其社会功能

昭君出塞事件属于族际关系中的一个最一般的内容, 即族际之间的交往。但是它却折射出现代族际政治所关心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族性的存在和社会功能。当代社会心理学对族性的研究发现,族裔身份和认同并非是天然冲突性的。西方学者 Laitin 认为,族际分野固然是关于公共利益的分歧和争端的一个因素,但却并不具有任何一定会导致暴力行为的特殊潜质。(David D.Hardin, Nations,States and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P.40-41)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族际之间是冲突还是合作,取决于交往集团的行为选择和政治决策。在昭君出塞这一事件中,匈奴单于主动请婚,汉朝皇室同意和亲,是双方审慎思考、理性决策的结果。它既包含有当时地缘政治的考虑,也更多地体现出交往双方对和平的渴望。族际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双方社会都是有利的,可以为双方社会提供和平与安宁。通过和亲改善匈奴与汉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族际关系的可建构性。可以根据人的意愿进行建构。

2. 分歧、差异和冲突的可协调化解性。交往主体之间有各自的利益认同和利益考虑,分歧和矛盾不可避免,也不足为奇。但这些矛盾和分歧并不是不可化解的。它可以通过族际交往的内容、途径和方式,和平地加以解决。和亲政策从双方来讲,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选择的,都表现为通过联姻、释放善意,消除敌对和猜忌,建立彼此之间的互信,实现和平。这种交往模式,充分体现了族际交往中的人性特征。

3. 文化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作用。

通过联姻,建立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消除彼此间的猜疑、戒备,扩大了双方的接触和交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又扩大了彼此间的合作,给双方社会带来了安宁,给双方的人民带来福祉。昭君出塞给匈奴人带去了汉文化,并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匈奴人更多地了解了汉文化和汉民族,促进了汉匈之间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通过昭君以及汉匈之间的友好往来,让汉人也了解了匈奴,了解了人性的共通性,减少了彼此之间的猜忌、敌意和误解,从而影响了双方的行为选择,为彼此争取到 60 年的安宁和平,给双方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促进了边塞地区的发展。

4. 承认和尊重差异的意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昭君现象的意义绝不止于汉匈双方和亲的政策选择,而且还在于昭君后来的改嫁以及她与匈奴人的友好相处。在昭君所嫁的第一任丈夫死后,昭君根据匈奴的习俗下嫁单于之子。这个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人眼中的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正是昭君现象的另一价值所在,也是昭君文化久远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汉文化中心论者的眼中,汉成帝令昭君“从胡俗”,表现的是“薄情最是帝王家”。毋庸置疑,汉成帝的命令丝毫没有从昭君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顾及昭君的思乡之念,骨肉之情。这是一个最浅显的事实。但是,在汉文化中心论者对成帝行为的批判中,也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匈奴是落后的民族,匈奴的习俗是野蛮的,不文明的。故尔成帝的从胡俗之命不仅冷酷、非人道,而且是有失伦理纲常的。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们对汉成帝“从胡俗”之命,都持明显的批判态度。然而,换一个角度来审视,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诠释,汉成帝“从胡俗”之命,又何尝不是对匈奴习俗的一种承认和尊重?在这里,改嫁行为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是对匈奴文化的一种承认与尊重。昭君因从胡俗而得民心。匈奴人民在昭君这个举动中读到的,不是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凌驾之势,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匈奴的习俗与文化。昭君改嫁向匈奴人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让他们感觉到了平等和尊重。因而发自内心的与汉友好,发自内心地崇拜昭君。这是昭君美名千古流传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正是这种尊重,正是这种“从胡俗”的行为,成就了昭君这样一段千古佳话,成就了汉匈之间几代人的和平。试想,如果昭君未从胡俗,只身返汉,它能够在匈奴人心中留下那么经久美好的形象吗?还能够有昭君佳话的万古流传吗?

二、昭君文化的审美价值

昭君之所以在匈奴人中留下那么美好的印

象,在于昭君的美。但是,在昭君这个历史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美,不是狭义的美容美貌,更包含了广义的美德美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昭君具有令四下动容的姣好容貌。这种美貌为她赢得了一定的得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单于和匈奴民众,从昭君的美貌中,解读出的是汉帝对匈奴人的友善、对和亲之举的重视。从而产生一种被承认、受厚待、得礼遇的美好感觉。

然而,让匈奴人对昭君现象作出美好解读的,不只是她的美貌,更在于她的美德。昭君的美德是通过她的美行和美举体现出来的。昭君出身于平民之家,身上没有帝王贵胄的娇骄二气,在她身上体现出江南劳动妇女的朴素、平易、勤劳、聪慧、善良和坚忍。昭君平易近人,与匈奴人结下了良好的关系,昭君精通农事稼穡,给匈奴人带来了中原农耕文化技术,对改进匈奴人的生活产生了作用。昭君尊重胡俗,下嫁单于之子,在远离故乡的地方,生儿育女,和当地的匈奴人打成一片,融入了匈奴人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些良善行为,在散发出人性光辉、表现出人格力量的同时,也向匈奴人释放出善意,在匈奴人心中播下了友好的感情,使匈奴人发自内心地对这位没有骄奢之气,更具平民情怀的汉朝妇女产生崇仰之情。因而他们才能在昭君去世之后,自发地为她修建墓冢,并且年复一年地为其洒扫培添,使其郁郁葱葱,成为北方草原的一个独特的风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居住在这片草原的居民早已经不是汉代匈奴民族,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子裔。但是留在草原的青冢却在一年又一年地向后人传述着昭君的故事。使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从中领悟到这段人际关系中蕴涵的真善美,通过对青冢的保护传达着对昭君的景慕,传递着对和平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族际关系的审美评价和真诚向往。昭君的故事也在经年累月地提醒着草原上生活的人民平等友好的民族关系与和平安康的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三、昭君文化的人类学政治学意义

昭君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一种民族友好交往的和平象征。台湾苗栗县的昭君娘崇拜就真实地释放出了这个信息,反映出地方乡土文化真实的建构过程。它不仅包含了对本土文化因子的继承和使用,同时也包含了对异地异乡文化因子的借鉴和挪用。在苗栗,无论是从族源上,还是从文化中,都找不到与昭君直接相关的任何痕迹。但是,把昭君与苗栗县民联系起来的是昭君传说所隐含的良和善,是经由这个传说传播开来的精神和道德潜质,它经过苗栗县民的再创造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适应了苗栗县建构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和谐和睦的邻里关系的现实需要,成为地方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乡土文化中规范道德、培育伦理的精神力量。(关于台湾苗栗县新莲寺昭君崇拜及其形成,见增桂龙《新莲寺的昭君信仰》,余文秀的《台湾苗栗新莲寺奉祀王昭君之缘由初探》两篇文章。载《2009·中国兴山·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117-127页。)

昭君文化和昭君现象,给我们以很多具有人类学政治学意义的启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成为一种常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种生活世界中,如果我们每一个个人,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无论是在民俗文化差异的民族地区工作生活,还是到国外旅游、工作、贸易的时候,都能像昭君那样,尊重当地社会的风俗习惯,平等地与他者交往,自觉地做一个各族友好的民间使者,以自己的文明美好的行为增进世界人民的了解和互信,这就不仅是在向世界彰显一个文明平等和谐的现代民族的民族风范,提升中华民族的世界形象,也是在为世界和平贡献绵薄。

作者王建娥,女,汉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看待悲剧的王昭君形象

■ 马 冀

昭君的一生并非悲剧的一生。然而,在旧时代大多数文学艺术作品中,她却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看待悲剧的昭君形象?本文拟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昭君悲剧形象的历史回顾

现存最早的昭君题材诗作,是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昭君守国》二首:“君守国,诸夏蒙德。”“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对昭君出塞给予高度评价,全诗充溢欢庆气氛,毫无悲戚之情。大约在昭君出塞后不久,民间就产生了有关她的歌舞。《唐书·乐志》记载有题为《昭君》的“汉曲”,并说:“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可见其主调是悲叹的,但悲叹的原因是“远嫁”,即思乡念亲,并不涉及对昭君出塞的整体评价。大约在东汉末又有托名为昭君自作的《怨旷思惟歌》,此诗载于《琴操》,其基本内容可能是继承汉代昭君歌舞的,但诗中更突出了她囚禁深宫之苦和对父母乡国的思念:“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颀颀。虽得委食,心有徊徨。”“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惻伤。”《琴操》还记载了当时民间的昭君故事,虽

然故事框架与史实相同，但却把她的结局改为不愿从胡俗再嫁，“乃吞药而死”。这是出于对昭君的同情和爱护，从汉族道德观出发的虚构。

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在诗和序文中任意篡改史实，首先是把昭君出塞的背景写为“匈奴盛，请婚于汉”，从而把昭君出塞写成匈奴恃强逼婚的结果；其次是把昭君和亲比喻为“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殊类非所安，虽贵非为荣”，把昭君和亲说成是民族耻辱；第三是极力渲染匈奴习俗的荒悖，把昭君再嫁视为最大侮辱：“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这样，全诗主旨就变成了宣扬狭隘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歧视的“哀怨”之作。这首诗对后世发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吟咏昭君的诗作基本上还是围绕“怜其远嫁”的。倒是在《西京杂记》（旧题刘歆或葛洪撰，实际可能是南朝梁吴均撰）中，昭君故事的演变值得注意。在这部笔记小说中，第一次把毛延寿等画工与昭君搭上了关系，虚构了昭君不肯贿赂画工，“遂不得见”的情节，对后代影响很大。

隋唐时期是有关昭君的创作进入全面繁盛的时代。不但作者、作品大大增多，而且视野广阔，思想活跃，题材和主题都大为扩展，由咏昭君故事扩大到咏昭君故乡，题昭君坟墓等，民间的变文、歌舞、绘画作品也很多。这一时期的昭君形象和作品主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继承汉代“怜其远嫁”传统，吟咏远嫁塞外的悲苦，设想她思乡念国的种种心绪。如李白的《王昭君》：“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颜。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咏怀古迹》之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等等。

二是把批判矛头对准毛延寿，认为他是造成昭君悲剧的罪魁，如侯夫人《遣意》：“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崔国辅《王昭君》：“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言斩画师。”等等。

三是进一步追究造成悲剧的原因，指责皇帝昏庸和朝廷软弱，甚至谴责和亲政策，认为这是投降、妥协、屈辱的政策。如白居易《昭君怨》：“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徐夤《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等等。

四是依据史实，肯定和亲，认为昭君出塞是值得庆幸的喜事，是为国立功的好事。前者如王睿《解昭君怨》：“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后者如汪遵《昭君》：“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崔涂《过昭君故宅》：“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这些诗尽管高度评价了昭君的历史功绩，但大多是从“静胡尘”的角度去看问题，并没有认识到对民族友好的重要意义。只有张仲素的《王昭君》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肯定和亲：“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五是借昭君故事抒发人生感慨，显示出“借昭君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特点。如李白《于阗采花》：“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娥眉，胡沙埋皓齿。”白居易《青冢》：“丹青一误，白黑相纷纭。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媼母。”“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

都是借毛延寿丑图感叹奸佞谗陷、黑白颠倒、祸福难凭、同侪相妒等世事人生的，颇富哲理意味。

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压迫沉重，昭君题材作品除继承唐代上述各类主题之外，普遍借昭君故事抨击当局懦弱无能，进一步深化对和亲政策的批判；同时特别注意用昭君题材激发爱国主义感情，歌颂她的爱国情操和历史功绩。前者如吕本中《明妃》：“汉氏失中策，清边烽燧频。丈夫不任事，女子去和亲。”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蛾羞。”李纲《明妃曲》：“宁辞玉质配胡虏，但恨拙谋羞汉家。”陆游《明妃曲》：“双驼驾车夷悲乐，公卿谁悟和戎非。”耶律楚材《过青冢次贾搏霄韵》：“延寿丹青本诳君，和亲犹未敛胡尘。穹庐自恨嫔戎主，泉

壤相逢愧汉臣。”后者如刘子恽《明妃出塞图》：“羞貌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靖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刘因《昭君扇头》：“一身去国名千古，多少君臣学妇人。”吴师道《昭君出塞图》：“一出宁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等等。影响最大，思想性和艺术性最好的，当数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汉宫秋》是集前代昭君题材作品之大成而又有大胆创新的充满时代精神的代表性作品，剧中虽然对昭君的爱国情操给予了热情歌颂，但这个形象的悲剧色彩却更为浓厚。由于《汉宫秋》的成功，王昭君悲剧形象已是妇孺皆知了。

宋元时期咏昭君诗作，最有突破和创新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诗中不但为毛延寿翻案，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从而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封建皇帝；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种冲破民族意识藩篱，超越胡汉界限的惊人之论，这种把人与人之间的“知心”看得高于一切的全新视角，大大加深了昭君题材的主题开拓，是一种时代的超越。此诗一出，引得欧阳修、司马光、曾巩、梅尧臣等名家纷纷唱和，此后也有不少人承袭此意，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昭君形象的悲剧色彩。

明清两代昭君题材作品数量很多，诗词之外，杂剧、传奇、小说、说唱文学成了主角。在多达三十余种的戏剧、小说中，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前代有所拓展，但总的看，由于当时已逐渐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作者思想远不如唐代那样活跃，不但缺少引人注目的创新，相反却是腐朽没落的糟粕日见增多，“忠君”、“贞节”等令人生厌的说教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昭君悲剧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了。

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昭君形象才逐渐发生变化。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话剧《王昭君》，把她塑造成一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女性，但仍没有摆脱悲剧的范畴，只是把以往的命运悲剧改写为“性格悲剧”了。新中国成立后，昭君形象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先是周恩来总理建议“要重新写一出民族和睦的昭君戏，写一个欢欢喜喜的

昭君”。接着董必武同志写下了《题昭君墓》诗。与此同时，史学界、文学界围绕昭君出塞的历史真相和昭君艺术形象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和研究。在这种背景下，以曹禺的话剧《王昭君》为代表的系列戏剧、电影、电视剧、诗词、雕塑、绘画、音乐作品陆续诞生，王昭君才摆脱了哭哭泣泣的旧貌。

综上所述，旧时代的昭君艺术形象大多违背了历史真实，染上了悲剧色彩，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悲剧气氛越来越浓，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研究这种艺术形象与历史真实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探寻其中的原因，对于我们总结前人创作的经验教训，探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研究文艺创作与时代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相同题材何以有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主题等问题，都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当然也能更直接地为昭君问题研究和昭君题材创作提供借鉴。

二、多学科、全方位地考察昭君悲剧形象的成因

对于王昭君这样一位影响深远、有关作品繁多、涉及领域宽广的人物来说，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探讨她悲剧形象的成因，不是某种单一的理由所能解释清楚的，只有按照马列主义观点，运用系统论方法，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立体性的考察，才能揭示其中的秘密，并为今天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历史学角度看，昭君的遭遇中确实有悲剧的因素，这是昭君悲剧形象产生的内因。

王昭君是历史人物，历代作品对她的描绘，基本是在她一生经历的四大关节框架中进行想象、补充和加工的。这四大关节概括说即强征入宫、不得见御、出塞和亲、从俗再嫁。在她的这些遭遇中，本来就包含着悲剧因素。她作为民女被强征入宫，背乡离亲，失去自由，这是悲剧因素之一。作为美貌无双、才华出众的绝代佳人，却“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在深宫中过着漫长的凄凉寂寞生活，这是悲剧因素之二。第三，她在“积悲怨”的情况下，自

请出塞,告别中原先进文化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到环境艰苦、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匈奴生活,其中虽然有为民族友好贡献力量的高尚动机,但在下定决心前,必然经过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在那百感交集的思绪中,有庆幸、有喜悦、有豪情,也会有悲伤。第四,在呼韩邪死后再嫁其大阏氏之子的问题上,她面临汉族传统人伦道德和“胡俗”的尖锐矛盾,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虽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服从了汉朝“从胡俗”的旨意,服从了民族友好的大局,但在那种艰难的抉择中,心情难免有悲哀愁苦,“上书求归”即是证明。这四个方面,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会被古人视为巨大的不幸,而昭君竟然集于一身,所以她便成了“红颜薄命”的代表。如实地承认昭君的悲剧性遭遇,不等于说她一生都是悲剧,更不是否定她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恰恰相反,昭君往往能在人生处于悲剧性冲突时,自觉起来与命运抗争,为自己争得了喜剧性结局,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充分显示出她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显示出她超人的远见卓识和牺牲精神,这也正是昭君的伟大之处,是其性格的闪光之处。然而,在旧时代,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高的觉悟和这样全面地分析问题的能力,因而不能抓住昭君一生最本质的方面。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当时普遍的人生观出发,真诚地对昭君表示同情,反而忽略了她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方面,这便是昭君悲剧形象产生的内在原因。

从民族文化心理来看,受安土重迁思想影响,认为“远嫁”本身就是悲剧。

中华民族农业发达很早,农业技术的提高和治水能力的增强使人们习惯于安居一地的生活,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和山隔海阻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西周时盘庚东迁,就受到百姓反对,所以他又是劝,又是吓,颇费了一番口舌。《汉书·元帝纪》就明确地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也有意识地鼓励民众安居乐业,并利用与安土重迁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亲族依附关系加强统治。这种民族文化心理,随着时代发展日

益强化,使人们把离乡背亲视为人生一大悲剧。女儿嫁到邻村,尚且上轿大哭,以至形成风俗。《红楼梦》中探春远嫁,就标明一个“悲”字。何况昭君要嫁到匈奴,而且永无归期呢?所以古人一提昭君出塞,首先想到的就是远嫁之悲,思乡之苦,恋亲之情,而很少去追究其中的政治意义。

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积淀,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思乡之作特别发达,而且都染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现代心理学证明,人的记忆有一种选择性。童年时代所建立的以天真无邪为特点的故乡之情和亲属群体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更多地保存在大脑皮层中,使故乡回忆变得越来越美好。当人们离乡背亲,处境不佳,孤寂绕心之时,思乡之情便会油然而生。这便是所谓“离群托诗以怨”的深层动因。如果要借助古人来抒发的话,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王昭君。这种思乡之作往往带有作者鲜明的人生体验。因而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羁旅行役,在几乎所有经历过思乡之情的人群中,它都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

安土重迁思想表现出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和凝聚力,成为维系民族与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的感情纽带,强化了人们的爱国意识。同时,思乡固有的哀愁素质强化着民族忧患意识,它还具有特别宽厚的包容力,因而这类作品也极易流传后世。从消极方面说,它表现出个性独立意识较差,使人们习惯于随顺社会伦理规范,并常常附带产生出盲目的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民族的开拓精神和追寻视野。这两个方面在昭君题材作品中都有明显体现。

从社会政治学角度看,昭君的悲剧形象是封建社会中诸多现实问题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想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昭君悲剧形象的产生和长期流传,乃是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每个时代的作者必然要受到当时社会状况、思想文化风尚的影响,受自身政治立场、道德水平、文化素养、审美趣味的制约,甚至作者处境遭遇、心绪状态的变

化,都会使他们面对同一题材写出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品。因此,当这些作者把自己对昭君的理解物化为文学艺术作品时,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主题和形象。

例如,在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是男子的附属品,甚至成为统治者的玩物或礼物,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往往强烈地影响到有些作者,他们把对广大妇女的同情倾注到昭君身上,从而形成昭君的悲剧形象。中国古典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宫怨主题,也总是把昭君作为最常见的例证。

又如,在封建社会中,无数人才受到压抑、摧残、嫉妒、谗害,不得重用,文人总是感到怀才不遇。这种社会现实和思想感情反映到昭君题材创作上,再结合古典文学中以美人喻君子,以男女喻君臣的深厚传统,于是昭君又成了美质才高却备受压抑的典型形象。

再如,封建社会政治黑暗,贿赂公行,谗佞当道,更有庸碌不明的昏君,黑白不分、妍媸不辨,制造了不少冤案。这种现实反映到作者头脑中,昭君故事(特别是虚构的毛延寿丑图等情节)又成为批判昏君佞臣的好素材,昭君自然被塑造成黑暗政治的牺牲品。

更为普遍的是,每当民族矛盾尖锐,国家命运艰难的时候,昭君又被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代表来讴歌。考察塑造昭君悲剧形象的作品,中晚唐、宋元、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初年数量较多,而且主题也比较一致,这正说明在政治动荡、国家危亡、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昭君是最容易被赋予悲剧形象的。

在历代昭君题材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是只从昭君一生经历中选取一点或几点,偏出旁骛的作品,作者只顾抒写自己内心所思所感,离开史实所包含的意义十分遥远。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很早就有这种传统,春秋战国的“赋诗言志”就是“断章取义”的,后代的咏史、怀古、咏怀之作,几乎形成一种风气。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社会现实问题远比历史本身具有吸引力。像上面所举的

游子思乡、高才多妒、红颜薄命、宫廷黑暗、大臣无能、帝王昏庸、民族气节等问题,对当时的作者来说显然要比昭君本身更重要,也更为一般人所关心。对这些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文学艺术家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印象特别深刻。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借昭君故事在这些问题上大加发挥,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样写的好处,不但可以避开当时的政治迫害,而且能加深作品的历史感,因而大量昭君题材作品的主题就被吸引到另外一些方面去了,不但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意义。这是昭君悲剧形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民族学角度看,昭君的悲剧形象曲折反映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民族矛盾上升、激化时期民族思想的表现。把昭君塑造为悲剧形象的作品,一般说都没有认识到昭君出塞对加强民族友好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和进步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时代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民族平等的社会现实,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观念。在民族关系史上,虽然其总的趋势是朝着民族友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归于融合,然而在阶级社会里,与阶级剥削密切相连的民族矛盾、民族歧视、民族仇恨乃至民族间的战争,还是司空见惯的。

数千年来,尽管我国各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但汉族人口一直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影响最大,因此容易滋生大民族主义倾向。此外,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以汉族王朝为正统的观念,加以历代统治阶级大多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各民族间出现了种种隔阂,所以中国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特别浓厚。在汉族王朝强大的时期,作家们往往以泱泱大国和华夏文明自居,歧视少数民族,认为昭君出塞是“下嫁”,是“吃苦”。

在汉族王朝衰弱,受到少数民族政权威胁压迫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民族存亡问题日益提上日程,民族意识、民族情绪便表现得更为强烈,这时昭君出塞更被视为民族的耻辱,甚至把她

比为被掳走的俘虏。在昭君悲剧形象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大民族主义思想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封建社会的现实造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的、历史的、民族的和认识的局限,像一堵堵无形的高墙,阻挡着作家们去表现民族友好的主题,相反,歧视和仇视少数民族的观点和词句倒是大量存在着,对此我们应当给予严肃的批判。

但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仇恨往往又和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纠缠在一起。从绝大多数昭君题材作品来看,大汉族主义思想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也没有成为主导方向,更不能说昭君题材作品是被“大汉族主义”这条“黑线”贯穿起来的。即使是那些最激烈地反对和亲的作品,也并不是完全为了宣扬大汉族主义,往往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表彰民族气节和民族自尊,反对屈辱卖国和丧失民族尊严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受前代史料和文学作品,特别是名家名作的影响,形成了读者千百年来的阅读心理定势,是昭君悲剧形象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昭君出塞之前,西汉的和亲大多带有屈辱的色彩。汉高祖刘邦白登被围后,不得不采用娄敬和亲之计,就带有被迫的性质。当刘邦想让亲生女儿到匈奴和亲时,吕后日夜哭泣,坚决不许。后来只好找犯罪除国的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前往,如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楚王刘戊之女解忧等。她们的和亲,明显带有替父辈赎罪的性质,当然是悲剧性的。他们在匈奴或乌孙,都是终日愁苦,以泪洗面。细君公主还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些信息传到汉朝,自然使人们产生和亲就是悲剧的印象。早期出现的那首《怨旷思惟歌》显然是受细君此诗的影响产生出来的。接受美学认为,文本作为传统的部分,是构成读者情景的首要要素,读者对文本的理解首先受到来自文本的内部条件的限制。这些史料和作品文本所提供的和亲屈辱的悲

剧形象,不断进入读者的情景,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阅读期待,似乎和亲一概都是屈辱,和亲者一概都是悲剧人物,昭君自然也不例外。尽管由于时代不同,接受者的思想有别,但这种前理解经过数千年的强化和积累,是很难改变的。

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塑造昭君悲剧形象的作者中,有许多作者是当时第一流的大诗人、大作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马致远……他们的作品影响特别大,流传特别广,已经成为后代公认的榜样。他们的权威性使许多人不敢打破框框,跳出写悲剧昭君的老路。特别是对于一向具有崇古、仿古、复古传统的古代文人来说,就更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前人。这些名家名作像强大的磁场吸引着读者,他们的观点也特别容易转化为对全社会的影响。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形成了一种心理积淀,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致有些人看到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的昭君,便不假思索地排斥;有的即使理论上承认,感情上也觉得难以接受。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刚刚发表时所引起的争论中,这种心理因素便有所反映。

同样,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任何接受者都不是被动的,都要受时代、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影响。阅读过程是个再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读者变革自身的过程,不断发现旧的释义的不妥当性,不断建立起新的释义,是接受美学提示的一条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我们不懈地努力,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原则下创造出更加完美的昭君形象,就一定会为新时代的读者和观众所接受。事实也是如此,自曹禺的《王昭君》之后,不少文学艺术家在这个方向上努力,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观众的认可。相信一个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的形象,一定会形成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阅读期待和心理积淀。

从审美心理学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悲剧观更容易导致作家把昭君塑造为悲剧典型。

悲剧向来是文学艺术中的骄子,它所唤起的同情、悲悯乃至崇敬的感情能够深刻地打动人心,强烈地刺激读者的感觉系统,并容易长期地留在

记忆中。所以悲剧一直是艺术家们乐此不疲的创作主题。

从中西方不同的民族传统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来看,中国古典悲剧观特别注意把“美”与“真”结合起来,用真实的人物和故事激发人们的悲剧感情。昭君出塞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她的经历中又确有悲剧因素,特别是她所经历的激烈内心冲突,她所面对的巨大社会压力,她所处环境的艰苦复杂,这些都为艺术家提供了驰骋想象、抒发感情的广阔天地,也容易激发起读者同情、哀怨、悲愤、浩叹、壮烈、崇敬等悲剧类型的感情。所以许多文艺家不约而同地把昭君题材处理成了悲剧。

与西方悲剧观强调“恐惧”感情与“净化”作用相比较,我国传统悲剧观更强调把“美”与“善”结合起来,重视悲剧的伦理道德教化作用,强调悲剧要唤起“崇高”的感情。而昭君正是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相统一的化身,是绝代佳人和爱国英雄的完美结合,她的勇于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也自然会强烈地唤起人们的崇敬感情,这也使作家们在塑造昭君形象时有意向悲剧倾斜。

三、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创造新的昭君形象

综上所述,历史上昭君悲剧形象的形成和流传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尽管过去时代的昭君作品普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局限,尽管悲剧昭君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我们也不应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因为古代作家往往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能全面地认识和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本质,他们更没有“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类的概念。同时,文学艺术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现实生活总是要顽强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是艺术规律所决定的。何况,文学艺术的基本价值又具有永恒的魅力,因此在对前人作品的态度上,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凡是反映了一定的

社会现实或如实描绘了一部分人的心路历程,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或教育作用,在艺术上又有某种成就和影响的作品,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董必武同志的《题昭君墓》诗云:“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人各据胸臆遣,舞文弄墨总徒劳。”诗作充分肯定了昭君的历史功绩,批评了旧时代昭君题材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昭君的悲剧形象违背了历史真实。他并不是对前人的作品一概否定,而是意在呼唤新的昭君形象出现。周恩来同志鼓励曹禺写昭君,其用意也在于此。新中国的建立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千百年来以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为基础的旧制度从根本上被推翻了,借昭君题材写红颜薄命、怀才不遇、朝政黑暗、昏君佞臣等主题都失去了现实意义。特别是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被消灭,平等、团结、友好、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并日益深入人心,再写悲剧的昭君就与我们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太不协调、太不相称了,而且在政治上还会产生某些消极作用。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些敏感的史学家、文学家,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观念和眼光审视历史,发现了王昭君悲剧形象和历史真实的背离;发现了昭君原来是一位难得的为民族友好做出贡献的女性;也发现了恢复昭君本来面目、塑造新的昭君形象对教育群众、增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团结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在新形势的要求下,以曹禺的话剧《王昭君》为起点,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塑造新的昭君形象的文学艺术作品,尽管人们议论纷纷,指出其中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我们相信,只要尊重历史,体现时代要求,遵循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更理想、更完美、更光辉、也更为群众所接受的昭君形象一定会出现。

作者马冀,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内蒙古大学教授。



山西境昭君出塞传说地名考释

刘溢海

昭君出塞,是发生在西汉汉元帝执政期间的一件影响重大,流传至今两千余年不衰的大事,用昭君研究专家、内蒙古大学马冀教授的话来讲,“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如此重大的事件,在《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等典籍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载述,然而,遗憾的是,各典籍中对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却没有载述,甚至对昭君死后的具体安葬地亦不记载。典籍虽不载,然而,在历代有关昭君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与文艺作品中,却有昭君出塞经山西境的雁门关、平城,在山西境内历史上的通塞中路(相当于今同蒲铁路线)沿线,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当年昭君出塞经过的地名遗迹,如阴地关、东胜店(琵琶老店)、武州塞、武州城(白羊城)、蹄窟岭、饮马泉、扇庄等。这些传说地名除阴地关在太原南的今灵石县境,其余均在雁门关外的雁北地区,犹以左云县境内最多,约有四五处。

当今学者对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主要有两种认识,一为走陕西境(即秦直道),一为走山西境(即走历史上的通塞中路)。笔者对此曾有《昭君出塞路线考》一文,持走山西境说。本文即就各类文学作品中昭君出塞地名以及山西境内昭君出塞传说地名进行一一梳理,并恳请专家学者指教。

一、蒲州

在由周濯街、郝存柱、姜子夫编著的《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一书中，第五十八章之“途中受阻”一节中写道：“出潼关，渡黄河，到蒲州，自此北上，历经河东的大邑。”在各类典籍中，“河东”是古地区名，一般指山西南部，在战国时曾置“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境）。这里的位置正好就是历史上通塞中路的必经之地。其中的蒲州位于黄河东岸，今永济市境内，历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地方。《辞海》载，相传禹舜时都此，称“蒲坂”，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置“蒲坂县”，北周置蒲州，治蒲坂，即今永济市西黄河东岸之蒲州镇。此地正当黄河转弯处，其南的风陵渡，隔河与陕西境的潼关相望，自古为沟通晋陕特别是河东与关中的交通要冲，晋陕之交通咽喉，历为军事重地。蒲州镇西的黄河渡口称蒲津渡，早在春秋时即在此作桥，称蒲津桥，此后历代相继在此以连舟作浮桥。因此地自春秋起即有桥，故西汉王昭君出塞由蒲州浮桥过黄河入晋，是情理中之事。

二、阴地关

由蒲州沿汾河谷地逆流而北上，便是沿途的“大邑”。其中重要的有：猗氏（今临猗境）、安邑（今夏县境）、左邑（今闻喜境）、临汾、平阳（今临汾境）、彘县（今霍州市）、界休（今介休境）、京陵（今平遥）、祁县、晋阳（今太原西南晋祠镇）。

在彘县与界休之间的汾河谷地有处狭窄隘口，称“阴地关”，位于今灵石县南部，今与霍州市接壤处。在此阴地关，有一块大石，石上有一女子手印，相传是“入蕃公主手迹”。在马冀先生的《昭君文化研究》中这样写道：“在内蒙古大青山南麓，至今有数十座昭君坟，出土了镌刻着和亲吉祥语的汉砖汉瓦。而且在今山西北部、中部地区，昭君出塞的有关传说也深入人心。据《山西通志》记载，马邑城附近的蹄窟岭，就是因明妃出塞经此，石上有马蹄痕而得名的。”再如太原附近的阴地关，有

相传为入蕃公主石上手迹。这“入蕃公主”一说是汉明妃，一说是唐崇徽公主。但唐代陶雍认为是昭君手迹，他有《阴地关见入蕃公主石上手迹》诗：“汉家公主昔和亲，石上今余手迹存。风雨千年侵不灭，分明纤指印苔痕。”这些马蹄痕和手迹，当然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人们把它附会到昭君身上，可见昭君在人们心中印象之深。

阴地关的具体位置在何处？《山西历史地名录》第45页[灵石县]条载：“阴地关，在灵石县西南五十里，唐太宗去霍邑时，曾驻于此。《旧唐书·昭宗纪》：大顺元年，李克用‘拒王师于阴地，三战三捷’，即此。因冷泉关在此北，故称阴地关为南关，今名南关。”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第372页载：“阴地关，即今山西省灵石县西南南关镇。《旧唐书·昭宗纪》：大顺元年（890），李克用遣大将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师于阴地关，三战三捷，即此。”查今《山西地图册》，南关镇位于汾河谷地东岸，同蒲铁路经此，并有站口。

三、雁门关

雁门关是山西北部极为重要的交通咽喉与军事战略要冲。《辞海》[雁门]条载：“山名。又名雁门塞。在山西代县西北。古以两山对峙，雁度其间得名。又，关名。唐置。又名西陉关。故址在今山西雁门关西雁门山上。长城要口之一。山西省南北交通要冲。东、西峻峭，中路盘旋崎岖。唐于山顶置关。”

在《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一书的第737页载：“唢呐声此起彼伏，从昭君住宿的行宫，一直到雁门关口，到处有人在吹唢呐，道路两侧人山人海，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头喊：‘汉匈两国，永为一家！’那头喊：‘单于和亲，千秋万岁！’”

这是描写汉朝的送亲队伍在雁门关经过为昭君临时搭建的行宫时，当地老百姓夹道欢迎昭君出塞和亲的热烈场面。

在历代各类关于昭君出塞的文学作品中，提

到昭君经过雁门关的很多,如:

唐·无名氏《王昭君变文》(说唱):“单于:忆昔辞銮殿,相将出雁门。”

明·无名氏《和戎记》(戏曲)第二十九折《点绛唇》:“雁门关上望长城,纵有巫山十二难寻觅。”

清·雪樵主人撰小说《双凤奇缘》(一名《昭君传》)第五十回:“出雁门昭君自恨,思故乡王龙吟诗”;“昭君哭别汉王皇后及国丈国母,一路马上悲啼,步步回头,延捱至雁门关……”

当代耍孩儿剧,山西大同市耍孩儿剧团《琵琶声声》(2007年演出本)之《剧情简介》:“……为化解汉匈两族数百年的积怨,王昭君应征出塞和亲,行至雁门关时,突然关隘烽火点燃,号角震天……”

因笔者非雁门关当地(代县)人,限于条件,未能到当地考察并收集民间传说故事,特别是昭君出塞经雁门关的传说故事。但我相信,当地应该有昭君出塞传说的故事。

据山西大学老教授靳生禾先生与太原师范学院的谢鸿喜教授1992年亲自对雁门关的实地考察,发现了更早的雁门关古址——“铁裹门”,为人工开凿之山口,其开凿年代应为春秋战国间,自此以后,雁门关便成为中原与北方匈奴等民族交战、交往的交通咽喉,战略要地。靳生禾先生在考证昭君出塞路线时说,我国先秦汉时代,中原王朝与北方的传统交通干线有东、中、西三路,其中的东、中路都经过雁门关。不仅周穆王大西北旅行(即战国赵人撰的《穆天子传》中之周穆王)时经过雁门关,赵武灵王北征,经过雁门关,王昭君出塞更应经过雁门关。

四、平城与琵琶老店

平城,是汉与北魏时大同之名称。在当地,关于昭君出塞的传说很多,比如晋北传统耍孩儿戏其腔调源于昭君出塞路经平城弹奏的琵琶调和昭君弹唱的“咳咳声”;当地女子冬天披的斗篷与风帽;当地老妇人腰间带的“曹兜兜”(针线包)源于

昭君带的荷包等等。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昭君在平城住过的东胜店,后改名为琵琶老店。

琵琶老店的传说版本很多,情节也有差别,但最为传统的说法是,当年昭君出塞时,皇家队伍马匹车辆浩浩荡荡北上,当到达平城县城时,因当时的平城只是一个普通小城,想找个像样的大客店很难,最后只好在大西街一家叫“东胜客棧”的店中将昭君安排住宿。此东胜店主姓韩,在大西街,此地处于繁华地段。平城县令及地方官员迎接皇家队伍进城后,经再三选择,认为就数这东胜店还比较像样。当日入住后,夜里昭君因思念故乡,便拿出琵琶弹奏。次日上路时,昭君让随行宫女从行装箱中挑出一把上好琵琶赠与店主以作留念。韩掌柜将琵琶视为珍物,挂于墙上,并将店改名为“琵琶老店”。后来,历经数百年,虽房舍多次重建,唯店名不改。到唐代懿宗(李漼)咸通年间(860—874),节度使段文楚特请当时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写了“琵琶老店”四个大字制成一块横匾挂于客店大门上方。该店一直至解放初仍存在,地址在大同城中的大西街路南49号院(原馄饨馆隔壁)。后街道改造,店被拆除,而那块“琵琶老店”的木匾一直保存在大同市博物馆(下寺巷中)。

五、武州塞与武州山

“武州塞”这一地名至少在先秦战国时已有。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匈奴列传》、晋代干宝著《搜神传》、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旧唐书·地理志·朔州》等古代典籍中均有“武州塞”的载述。今人解野草(本文作者刘溢海)与山阴县的徐德富都有关于武州塞的考证专文。大体上讲,早年的武州塞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即以今山西左云县为中心,东至大同云冈武州山,南至朔州北部的洪涛山,西至右玉西山,西北至杀虎口山,北至左云与内蒙古凉城交界的摩天岭及其东部延伸马头山,这四围中间的广大山间盆地、山谷隘口、险塞,总称“武州塞”。其后,概念渐缩小,指大同云冈石窟东部山口至左云县

城之间约百十里的山谷地带。如《辞海》第 810 页之[武州塞]条注云：“古要塞名。在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一带。……著名的云冈石窟即筑在此塞的东端。”

相传当年昭君一行的皇家送亲队伍离开平城东胜店后沿武州塞西行，本应下一站是住武州城（今左云县城东五里古城，即有名的白羊城），但因正值早春天寒日短，从大同城到武州城（白羊城）近一百二十里之路程，车马一日行程难以到达，只好分作两日行，其间的武州塞中无县城与大村庄，无奈只好在山谷间搭毡帐住宿。

在《大同市南郊区志》的第十九编之[方言·谚语·传说]中有一则《昭君出塞过武周》的传说故事：

“王昭君，字嫱，南郡秭归（今湖北）人。她自幼聪颖过人，七岁习文，十岁时已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汉元帝时入宫，后于竟宁元年（前 33 年）为了民族和睦，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封为阏氏。”

“据说，她远嫁匈奴出塞时，途经武周山已临近边关，又人困马乏，就地山间茅屋休息一日。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昭君怀抱她心爱的琵琶，彻夜弹奏不息。弹奏声时而如野马奔腾咆哮，声嘶力竭，时而如瀑布流水婉转绵长。字字情，声声泪，只为报国去，还望早日归，都倾注在这琵琶声中。”

武周山一带百姓闻声，纷纷赶来将昭君所住茅屋围住，围者愈集愈多，人们和着昭君的琵琶声唱了起来，直到天亮。昭君从武周山启程时，送行者数以百计，不知多少人为她的巾帼气节所感动落泪。昭君怀着对故国的深情眷恋，洒泪离开武周山出塞而去。

上文中的“武周山”即“武州山”，因北魏时曾在塞中置“武周县”（今左云县城东四十里旧高山村）将“武州”讹为“武周”。

六、武州城（白羊城）

从战国赵武灵王始在武州塞城（军事堡垒，位于今左云县西南五十里小京庄乡东古城河谷地）

起，秦在此置左云历史上第一个县治——武州县城（见《汉书·地理志》）。西汉初仍沿秦制，置武州县于此。但其后经过二三百年的风雨侵袭，武州城最终残破不堪，遂于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即昭君出塞那年，将武州县治由小京庄的东古城迁到今左云县城东五里的古城（明代重筑白羊城）。

这就是说，在左云境内有两座武州城：一为战国秦汉武州城（在东古城）；一为西汉后期之武州城（此城始筑于春秋时期，为白羊部落筑，称白羊城）。

在《左云县志》（清光绪本）之《地理志》载：“东古城，俗传汉明妃处此。”其实是县志的编者混淆了两座武州城，把昭君经过的白羊城（后武州城迁此）当成了前武州城（东古城）。

由民国左云邑人高鼎臣编纂的《左云县乡土志》在其《沿革考》一章中写道：“前汉，武州县：汉高祖六年壬子，天下大定，郡县完成。以赵之武州塞置武州县（今左云县），属雁门郡（郡治在今右玉县），《汉书·地理志》谓：‘武州属雁门郡，即赵之武州塞也。’以中武州塞城为县城（故址在今左云县西南六十里东城古村），名曰武州城。……又汉元帝后宫王昭君出塞时，栖迟于武州县城（今蹄窟岭有遗址）。后以城毁难守，于竟宁元年徙建县城于白羊城之故址（今左云县城东五里古城村）。崔浩（北魏大臣）曰：‘平城（大同）自西百余里有武州城，即此地也。’”

关于昭君出塞住宿白羊城，左云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据说，当年昭君出塞时，汉朝的送亲队伍和呼韩邪单于的迎亲队伍、护卫队伍，其马车、毡车数百辆，马匹骑士等组成了上万人马的庞大队伍，前后延及数十里长。每到一宿营地时尽量住民房，民房住不下时就就地搭帐篷。汉朝的送亲队伍搭布行军帐，匈奴的迎亲队伍搭毡包（蒙古包）。那日，这支庞大的送亲与迎亲队伍由平城出发西行，经武州塞后到达白羊城。然此时的白羊城已是破城一座，只有少量居民。于是队伍便就地搭帐住宿。武州县令前一天就接到先头部队通知说昭君

要经过白羊城,县令提前做好许多熟饭菜,又找多辆车从东古城(当时的武州县治)赶到白羊城来迎接昭君。昭君见武州县令从五六十里外赶来送饭菜,很是感动,随口说了句:“既然武州县城偏远,何不把县治迁到这交通大道处呢!”谁知昭君只是随便一句话,武州县令却牢牢将此话记在心中。队伍过后,他就将县城偏远并残破,连同昭君说的话写成奏折上报元帝,请求迁治。很快,朝廷就批准了武州县迁治,于是于当年秋将县治由东古城迁到白羊城,并着手重筑城垣。于是《左云县乡土志》及《山西通志》中便有了那句“竟宁元年武州县城迁治白羊城”的载述。关于昭君出塞住宿白羊城的传说,在右玉县王德功编著的《杀虎口》一书中亦有载述:“昭君辞别汉元帝及送别人群,呼韩邪单于一行在汉宫卫队的簇拥下出潼关、走雁门,直向塞外奔去。有一天早晨从白羊城出发,当走到卧羊山时,往前一看,只见前边群山叠嶂……”

根据此传说,左云籍画家,山西报社李江鸿先生于2010年特别绘制《昭君出塞》连环画一组,其中有昭君出塞住白羊城一幅。后左云县委、县政府出资将此组连环画精制成2011年挂历,成为昭君题材挂历之杰作。

七、蹄窟岭

蹄窟岭是山西境内昭君出塞地名传说中被载入志书最多的一处,在《山西通志》、《左云县志》、《云中郡志》、《朔平府志》等典籍中都能找到昭君出塞经蹄窟岭的传说故事载述。就像内蒙古草原上有数十座昭君坟一样,在山西境内笔者所收集到的蹄窟岭地名至少有三处:

①朔州蹄窟岭

内蒙古大学马冀教授在他的《昭君文化研究》第106页写道:“据《山西通志》记载,马邑城附近的蹄窟岭,就是因明妃出塞经此,石上有马蹄痕而得名的。”

②右玉蹄窟岭

在右玉县王德功先生编著的《杀虎口》一书的

《昭君泪洒蹄窟岭》一节中写道:“昭君辞别汉元帝及送别人群,呼韩邪单于一行在汉宫卫队的簇拥下出潼关、走雁门。直向塞北奔去。有一天早上,从白羊城出发,当走到卧羊山时,往前一看,只见前边群山叠嶂,长城蜿蜒,前来送行的汉宫卫队就要告别回去了,便上前说:“前边再走一程出了杀虎口就是匈奴地面,我们就此返回长安,请夫人走好!”昭君回首望望雁门关内汉室江山,向前望望关外情景,不禁吟唱了起来:“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昭君歌声委婉悠扬,使送行的马队放缓了脚步,都静了下来听这动人的歌声,后来在这青石上留下了马蹄踏下的窟印。”

③左云蹄窟岭

在三处蹄窟岭中,被多种典籍载述并有具体地址的是左云的蹄窟岭。

《山西通志》载:“中陵在右玉者,东北抵盘石岭,与左云界蹄窟岭接。……高山岭上有三峰,相传昭君出塞道经此。”

《左云县志》(清光绪本)卷二之《地理志》条载:“蹄窟岭,俗传啼哭,讹也。明妃何处不啼哭?盖因出塞,道经此岭。其石上有马蹄窟,至今痕迹宛然。”

《朔平府志》(清)在左云县条下载:“蹄窟岭,在县西北十里。”

《云中郡志》(清)在其卷一方輿志的山川篇载:“啼哭岭,在左卫(即今左云——引者注)西北三五十里。”

此外,在高鼎臣的《左云县乡土志》、民国日伪时左云县公署编的《左云县要览》等书中亦有类似的载述,不再一一摘引。

对于上述诸书记载的左云蹄窟岭具体位置,尽管有所差别,但大体位置是相同的,即在左云县城西北山上。在左云县西北有座与右玉县东山相连的山,叫“五路山”,山上原有大小村庄二十多个,都归陈家窑乡,在本世纪初,由县政府统一移民下山后,原村庄与乡撤销不存。笔者童年时曾在山上陈家窑村(乡政府驻地)生活过。该村南约二三里处有一条东西向的山梁,当地群众叫“马蹄

梁”。据称,梁上有块大石头,石上有四个清楚的马蹄印深坑。当地老乡甚至能生动地讲出当年昭君出塞的传说故事。他们说,当年昭君骑马走到此地时,因为再往西走,一出杀虎口就是胡地了,昭君就骑马在山顶上停下来向南眺望汉朝的云天和家乡,因停留时间太久,那马便在石上踏下了深深的印痕。陈家窑南山的马蹄梁,就是志书中的“蹄窟岭”,内容与位置都对上了号,只不过是书上与民间叫法不同罢了。那块马蹄印石笔者当年只是孩童,未能亲见。2008年,笔者参与了左云县三屯乡文物调查小组,乘车上五路山调查,特请当年陈家窑村叫刘湓的老人(70岁)当向导。老人来到陈家窑东南、焦家窑(两村均废,有遗址)西南的那条山梁上时说,此处就是马蹄梁,那块马蹄石在解放初还在山上,后来因修陈家窑至三屯的公路被推到山下不见了。

八、饮马泉

饮马泉是五路山上一处有着动人传说故事的地方,相传此泉系当年昭君出塞时一匹马用前蹄从山上跑(音 pá,动词)出的一泓清泉,后来,清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返回时曾在此饮过马。其具体位置在原陈家窑村东五六里处的一个半山腰中,2008年8月,笔者参加三屯乡文物调查组上五路山时,向导特别带我们看了那潭有着动人传说的美丽的饮马泉。该泉位于一条南北向山梁的东侧半山腰,泉北约一里处有个与泉同名的废村,村因泉而得名。该泉直径约丈许,呈不规则形,四周有几块大石围拱,水清澈甘甜,深约两三尺,四周被灌木与齐腰深的野草野花环绕,花草丛中蜂蝶飞舞,十分美丽。此泉西南四五里就是蹄窟岭。相传当年昭君出塞时,大批人马由红沙岩口攀上山顶时因正值早春,山顶上被冰雪覆盖,又没有村子可取水喝。就在这时,有匹马竖起前蹄用力跑地,竟跑出一孔流淌的清泉使大队人马有了水喝。美丽的清泉加上动人的传说故事,使得饮水泉成为五路山上的一处美丽的景点。

九、红沙岩口

红沙岩口,是左云五路山上人工开凿的一处特别重要的有着东西交通咽喉作用的山口,因其地所在山崖全为蜂窝状红色古代火山熔岩,故称“红沙岩口”。此山口是雁门关北由中原通向杀虎口乃至北方草原的最为重要的山顶塞口。此山口西北方六七十华里就是杀虎口,其东南方经武州塞(狭义的武州塞,即今云冈石窟所在的峡谷)去大同仅为一百余里。

其具体位置在五路山东北部,距山顶明长城仅五六华里。由山东麓的前铺村(属三屯乡)开始,顺着西北方山坡向山上行,沿途一道大沟直通山顶,沟中清泉潺潺,在沟北侧的山路上,断断续续地用大石块垒砌的路道出现在眼前,从路基遗迹看,相当古老,且大部分地方可并列通过两辆马车。由沟底的前铺村到山顶红沙岩口,约五六华里,中间要经过两个分别被称为“前窑子”与“二窑子”的小山村废址,其中人工开凿痕迹明显的山口,经实测为:口长70里,底宽10米,垂直高度20米,顶宽60米。如此之工程,在古代只有铁镐、铁锹的条件下,要把火山熔岩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其费时费力与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攀上山顶后,口南一里处有座小峰,海拔为2013.5米,为左云最高峰。此峰名叫“古道山”,山名印证了此山口通道的古老。此古道山西南行六七里就是饮马泉与蹄窟岭,由蹄窟岭(马蹄梁)北麓沟底沿河谷西北行,有盘山岭、欧家村等直达右玉老城(汉代善无城,雁门郡治),再西北行即至杀虎口出塞外到北方草原。由古道山西北方栽下沟底,一道大沟中流淌着一条马营河,河谷中有破虎堡等十几个小村,然后由西北方直达杀虎口,这是由红砂岩口至杀虎口的两条分叉交通要道,其南路经右玉老城,北路不经右玉老城直达杀虎口。2008年秋,山西大学著名历史地理专家76岁的靳生禾教授在亲临红沙岩口实地考察后写了一篇题为《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的论文。在该文中,靳老由雁门关推

及红沙岩口,并认为红沙岩口的最早开凿年代应在春秋时期,其大规模动工大概为北魏迁都平城后,为联系与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而为。其山间石砌路基亦可能系北魏所筑。靳老认为,不仅周代《穆天子传》中的周穆王大西北之行由此山口经过,其后的赵武灵王北征,秦始皇出巡死在半道(河北省广宗县沙丘宫)之后,归咸阳走的是此道,汉代卫青北征乃至王昭君出塞都应该走此道。特别是五路山上红沙岩口周边的蹄窟岭、饮马泉、亮马台等与昭君有关的传说地名,更加证实了昭君出塞经红砂岩口的可能性。

十、扇庄

扇庄是左云五路山昭君传说故事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处传说地名。相传当年昭君从红砂岩口经过时,车辇上放的一把檀香木宫扇不慎遗落在山道上。后来,此扇被一个樵夫拾得。那樵夫从未说,大概那其中的一个就是当年的扇庄。

笔者念小学时在三屯乡宁鲁堡村居住。宁鲁堡在前铺村东南约四五里,本人曾去过前铺村,并听到与昭君有关的扇庄、马蹄梁、饮马泉等动人的传说故事。2006年,本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问世时,首先想到的是用扇庄的传说故事做书名,于是便将那部作品集定名为《扇庄遗风录》。

十一、亮马台

由五路山顶马蹄梁(蹄窟岭)顺山梁西行约四

五里的山顶上,有座馍状的小山丘(或系人工所筑),此小丘似汉墓亦似烽火台。此台北望,沟中是已废的陈窑村,台南之山沟中有那胡马的步子慢了下来。那胡马本来善奔跑,此时许是归心之切,才奔跑起来。两位护马骑士牵着马缰绳,昭君平稳地骑在马上,一路西行沿着西北方的马路坡向河谷而去。至于那个土台何时而筑不得而知,当地也有人叫它将台,但更多的人都叫它亮马台,台周围山顶平坦,或许这里本身就是一处广阔的山顶赛马场。

十二、马路坡

且说那匹胡马被昭君骑上后,许是北归心切,竟奔跑起来,后经两位护马大臣拽住缰绳才放慢了脚步。可岂知在草原上奔跑惯了的胡马却不善于走山道,当从那道长坡上往谷底走时,那马不小心前蹄踩空,险些跌倒,直把两个护卫大臣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们果断决定不能再让昭君娘娘骑马下山,还是换肩舆吧。肩舆是一种两人抬的简单的类似于轿的乘具,适合于较窄的山路上行走。昭君坐上肩舆后,沿着那条长坡下到河谷地,然后沿着河谷(河叫欧家村河)经盘石岭、欧家村(两村均在右玉境)一路西北而去,经善无城(雁门郡治,今右玉老城),出杀虎口向着胡地而去,最终到达单于龙庭。如今,在那长坡的转弯处有块较宽的地方,据说就是昭君当年换肩舆的地方。后来,那道长坡就叫做马路坡。

作者刘溢海,男,汉族,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员。

影像·读图

王昭君纪念馆
湖北省兴山县人民政府于
1981年在昭君村建





昭君故事传说研究述评

■ 赵可新

王昭君于公元前 52 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宝坪村，今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其父王襄老来得女，视为掌上明珠。王昭君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昭君的绝世才貌，顺着香溪水传遍南郡，传至京城。

公元前 36 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王昭君为南郡首选，后为掖庭待诏。王昭君进宫后，因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些破绽，便无缘面君。公元前 33 年，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对汉称臣，感恩汉朝对他的帮助，并请求和亲，“自言愿婚汉氏以自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尽召后宫妃嫔，王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诏。呼韩邪临辞大会，昭君丰容靓饰，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人，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昭君死后，她的儿子、女儿、女婿、侄儿、外孙、曾孙三代十余人，奔走于汉匈友好事业，使汉匈两族长达半个多世纪和睦友好。化战争为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化血流遍地为鲜花遍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证实了汉匈政治联姻的决策是正确的，代表了民心的向背，时代的先进，历史的文明。血浓于水，依靠这种剪不断的血缘伦理关系，增强了汉匈两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两族人民在“大家庭”

中,找到了情感的寄托,达到了社会真正的和平、和睦、和谐。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流传甚广,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演变、丰富和再创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条颇具意味的文学创作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关昭君的历史记载、瑰丽神奇的故事传说、灿若星河的文学作品等,共同构成了辉煌璀璨的昭君文化。其中,昭君故事传说是昭君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对昭君故事传说的研究却是给力不足,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昭君故事传说的相关材料散碎,难以收集。有的散落在史书中,有的可在戏曲、散文、小说、鼓词中,见到一鳞半爪,不成体系。更多的则是蕴藏在民间老百姓的口头当中,老百姓是昭君形象传播的流动活广告,换一句话说,昭君和平友好形象的丰碑是活在老百姓的心中。昭君故事传说是昭君文化中的珍宝。它的根植于汉匈民族文化的土壤当中,对于汉匈民族的思想感情,生存状态,有着极其丰富的表现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强的艺术魅力,这些作品拥有永久的生命力,因为它糅进了人民的期盼与理想,人民存在于故事传说当中,与昭君共同创造着时代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淀千年之久的昭君文化,将会创造出难以估量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价值。

基于此,这就需要我们抓紧时间、花大力气去采风挖掘,搜集整理。目前,能找到讲述昭君故事健在的民间老艺人,也是不容易的。研究人员要有紧迫感,要对昭君故事传说做抢救性的搜集工作,人力、财力、物力缺一不可,要有周密的规划,并付诸行动才能见成效。

其二,昭君故事传说的书籍总数较少。目前面世的有:吴一虹、吴碧云主编《昭君传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郭自宝、许代乾编著的《昭君故事诗歌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吴道周编著的《昭君故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濯街、郝存柱、姜子夫著的《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可永雪、余国钦编纂的《历代昭君

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邹志斌、蔡长明主编的《昭君文化丛书·传说卷》,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刘勇编著的《昭君故里地名传说故事》,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有的文集是二合一,有的文集是八合一,有诗、词、散曲、说唱、戏曲、小说、散文、故事传说,虽然比较全面,方便人们从各方面了解、研究王昭君,但相比较而言,故事传说占的分量不重。比起昭君的诗词、小说、戏剧、绘画等方面的研究,昭君故事传说的研究专集、论文,寥若星辰,不够丰厚,成果较少。

其三,昭君故事传说属于民间文学,有些人轻视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认为是“下里巴人”。不如研究诗词、散文、戏曲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政治、经济,更为“阳春白雪”,光鲜亮丽。实际上,流传千年之久的故事传说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个民族成熟与文明的重要表征;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从历史上探究,昭君之事的广为流传,是经历了由史到民间故事传说,再到文人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譬如《诗经》中的“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流传了几千年,生命力旺盛,这些民歌是周代社会各个方面的真实反映,可以说是权威性的史料,早已被史学家们广泛利用。再如我国古代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它和其他诗歌的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民间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它们有不少的新颖故事,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再者,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自谓他的创作,无论是《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还是其他作品,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都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

同理,昭君故事传说的挖掘研究,不仅能够弥

补丰富历史记载的不足,还可以老百姓的视角,了解昭君的方方面面,挖掘其本质特征,更真实全面地诠释昭君形象,佐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昭君故事传说是文人创作的根基,不论谁,离开了根基,离开了泥土,则会迷茫,缺乏底气,缺乏永久的生命力。挖掘研究昭君故事传说,使其成为体系,是个根基事业,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让这颗宝珠熠熠发光,让昭君、昭君文化更好地走向国门,走向世界,产生更大的文化、经济效益,这是昭君文化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就昭君故事传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探究,旨在分析归纳其内容主旨、艺术特色、作用价值,以求昭君故事传说,更大程度地引起关注,扩大影响,发挥其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一、故事传说的内容主旨

昭君出塞早已成为历史的佳话,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纪念、赞颂这位和亲奇女子、和亲使者。在昭君故里,在昭君葬地,留下许多瑰丽神奇的故事传说,涉及的内容广泛,既包括昭君的出生、成长、选秀、入宫;也包括昭君回乡省亲、出塞和亲、辅助单于等,向人们展示着和亲大使昭君光照人间的形象,彰显着古代人的审美品位,体现着古代人的价值追求。这些故事传说像粒粒宝珠一样洒落在民间的热土中,像精神食粮养育着汉匈两族人民;像悠长的香溪水与黑河水一样,融合着汉匈两族人民的情意;像纱帽山与大青山一样靖宁着汉匈两族人民的家园。昭君故事传说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昭君的出生。

“望月楼”的传说,讲述了昭君是其母梦到明月投怀而降生的。西汉年间,成千上万的夫妇向观音菩萨求拜的是要生男儿,要传宗接代,而王襄夫妇祈祷要生女儿,观音菩萨被感动了,奏明玉帝,请天庭夺定。玉帝遣派玉虚仙子在八月十五月圆之日,下凡投胎。《汉宫秋》第一折也描写道:“月光入怀,复坠于地,后来生下妾身。”传说与戏剧相互

印证,揭示了昭君出生的与众不同:

一是,王襄夫妇祈祷观音菩萨生女不生男,这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表明了王襄夫妇思想观念的与众不同,更看重的是女儿。

二是,王襄夫妇中年得子,明月投怀,胎梦非凡,与众不同,是个好兆头。

三是,王襄夫妇梦中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乡亲们把王家的迎水楼台叫做“望月楼”,每到八月十五,人们自发相约来望月楼赏月,希望自家也能降生天女。改变了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反映了人们对昭君的喜爱,表现出汉民族的自豪感。

第二类,昭君的美丽聪慧。

据本邑传说:“昭君天生丽质,声音娇柔婉转,如凤管鸾笙一般,她肌肤像豆花一样,又白又嫩,坐至席上,散发着天然的幽香。”古语说得好,地灵人杰。宝坪村的青山秀水,孕育出冰清玉洁的美昭君,成为中国的四大古典美女之一。

王昭君不仅美丽而且天资聪慧,诗琴书画,无有不会。她八九岁时,“门庭教读”的私塾先生吟出:“莺啼绿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日明。”然后皱眉捻须接不下去了,昭君见了,提笔一勾,把当中的几个字,调换位置,不变一字,成就了一首绝妙的回文诗:“莺啼绿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日明。明日晓晴春弄柳,晴春弄柳绿啼莺。”

“希荒垭”的故事中,昭君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用明矾水在黄表纸上写字,智斗奸诈的鲁员外,让心有恶念的鲁员外认为是土地公公显灵,不得不答应租地一事。昭君为美丽的西花争得了三年不交租的土地,让西花姑娘得以在宝坪村安家立户。“妃台晓日”的故事中,展现的是昭君心灵手巧,坚持不懈的意志。昭君思考、观察、琢磨30天,完成了神仙婆婆交给的任务,绣出了人间没有的飞禽,“凤凰展翅”惊动了天地,感应了山水,使宝坪村越来越美。“妃台”也成了宝坪的八景之冠。昭君的美丽,昭君的才智,不仅为乡亲们办了许多好事,而且也是她日后出塞和亲成壮举,胆量智慧的积淀。

第三类,昭君的出生地。

关于昭君的出生地,历史上在宋以后,才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宋《枚花集》称:“昭君村在归州兴山县。”《吴船录》称:“属邑兴山县,王媪生焉。今有昭君台,香溪尚存。”《太平寰宇记》说:“昭君村,在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这几部书是宋人考察全国名胜古迹的专著,说法基本相同。晋代以后,为避司马昭讳,改“昭君村”为“明妃村”。民国年间立为“妃台乡”,而当地百姓都习惯叫它“宝坪村”,今为高阳镇宝坪村。

传说中“宝坪”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宝坪是个荒无人烟的穷地方,周幽王曾在这里筑有一个三十多丈高的报警烟火台,后来被捣毁,只留下个土墩,人们便称其“烟墩坪”。

据传,昭君经常在望月楼上读书作画,弹琴歌舞,刺绣梳妆。当她看到人们为了生活去山上开垦荒地,夜晚,她听到被滚石砸伤,跌下岩石人的喊叫声时,心痛的昭君想有一盏天灯,为百姓照明,为百姓造福。心诚则灵,昭君祈祷了七天七夜,最后长出了油桐树,树杈上长满了像灯盏一样的小窝窝,放上灯草就能点燃,而且风吹不灭,雨淋不息,人们叫它神灯。后来,油桐树被嫉恨的财主砍掉了,财主也被树压死了,但非常神奇,在被树压断的苞谷地上又长出了新苗。人们高兴地说:“神灯化宝地,一年收三季。”因为这是块宝地,所以人们就将烟墩平改为了宝坪。美丽的传说,让我们感受到了昭君的爱心,昭君的坚持,昭君的智慧,昭君是给宝宝坪带来幸福的福星,福星高照,化灾难为吉祥。

谈说昭君的出生地,离不开“香溪”。《清史稿·地理志》说得比较详实,“兴山”条记载:“城南香溪,一名县前河,建阳、南阳两河入之,合白沙、九冲河,至城南,始为香溪……又西南入归州。”

传说的香溪有三种说法:一是,香溪河原来的本名叫“木箱溪”,相传宝坪村原本没有溪河,是被乌龙将满山的水都吞进肚子里了。后来神农大仙,挑来了装有树种、树苗、铁锄、铁锨的木箱子,人们通过劳动把宝坪变成了粮丰林茂、源远流长的秀山宝地。昭君经常给乡农讲神农大仙的故事,鼓励

人们自觉种树保水,日子过得很滋润。这惹毛了大财主鲁员外,他要修一座深宅大院,需要人工、材料。昭君领着人们明拖暗抗,大财主十分嫉恨昭君,施计谋害昭君,昭君与之斗智斗勇,利用自己掌握的气象知识,又托神农大仙的神力巧换了木箱,打败了财主。木箱里的树种、树苗等宝物,给宝宝坪带来了福音,从此宝坪村的百姓,就将村前这条无名小溪,定为木箱溪。二是,因为昭君常在溪中洗衣,遗下的胭脂使溪水永世变香,人们就叫它“香溪”。三是,昭君出塞和亲,洒泪告别父老乡亲时,将浸透了泪水的香帕在溪水中洗涤,溪水尽香,便更名为香溪。香溪河名字的变化,香溪的地望财富,香溪的人文精神,都与昭君息息相关,昭君的爱与美,智慧与才情,造就了香溪的无限魅力。

第四类,昭君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

昭君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故事传说非常丰厚,数不胜数。“楠木井”的故事中,昭君勇斗黄龙,拖来楠木镇井,为民办了好事。“娘娘井”的故事中,昭君坚持凿井数天,感动天宫,仙女下凡,抛彩衣,化彩虹,变流水,灌庄稼,使宝坪村春意盎然,绿柳成阴。“昭君渡”的传说中,昭君智斩大莽,为民除害,镇莽的琵琶成了乡亲们的渡船,后人为纪念昭君,把这个渡口称为“昭君渡”。“桃花鱼”的传说,讲述了昭君帮助桃花渡难关的种种,桃花死后变为小鱼追随昭君,之后,群鱼吃了昭君洒向河中的桃花,变成了红色,成了现在的桃花鱼。“珍珠潭”讲了昭君智降恶龙的故事,为了乡亲们生命财产安全,她把呼韩邪的定情物夜明珠投入深潭,宝珠的强光,杀死了恶龙,就出了小儿和牲畜。这样的故事传说数不胜数,在昭君故里到处流传。故事传说中,昭君是正义、力量、理想的化身,是抗击恶势力的英雄。英雄的气概既磅礴,又充满了爱心与纯真。社会的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古代人民只想到了创造万物,征服自然,征服恶势力,至于实现目的的条件、手段他们较少想到,往往通过想象,借助神力、法力,通过他们热爱的人物实现目标,昭君就是人民心目中扶危济困、除

暴安良的英雄。

第五类,昭君的省亲、和亲。

昭君的省亲、和亲是故事传说的主旋律。“免朝”、“香溪免朝”讲的都是昭君省亲之后回长安时,父老为她送行,七百里三峡江水被昭君为国为民的高尚品德感动了,为昭君一状行色,向昭君朝拜的故事。面对乡亲们的祝愿,潮水的奔涌,昭君没有忘却和亲的使命,不愿因自己的思乡恋土“耽搁两族的大事”。“香溪免朝”中,昭君三拜宝坪村,三拜屈原先师,回拜奔涌的浪潮,说道:“免朝!免朝!”潮水即时而退。传说从此,三峡两边的溪河口都有潮水,唯独香溪河口就再没潮水了。“免朝”传到今。“三熟地”讲的是昭君在梦中变成金色的大雁,在众神的帮助下,给乡亲们带来早熟的种子,为宝坪村创造了三季三熟的宝地。“百日还乡”讲述了昭君为故乡送来了匈奴的早熟苞谷种子,表达了百姓渴望丰收的愿望,以及希望与匈奴族进行农业生产交流的心愿。

“昭君桥”讲的是昭君与呼韩邪单于为百姓在黑河水上搭桥,方便了汉匈人民沟通交流。昭君死后,单于与汉皇帝,听信谗言,再动干戈,桥则坍塌。桥的建立与坍塌,体现的都是“和合”的精神,冥府之中,昭君保护着两族人民的友好。“大仙洞”讲的是昭君为塞北百姓治病的故事,百姓称昭君为天仙下凡,妙手回春。有的还称她大仙姑娘、大仙奶奶。昭君死后,人们前往昭君坟朝拜取土治病,死后的昭君也是有求必应,最后修建了大仙洞,香火不断。“石人湾”、“昭君庙”、“昭君仙子与鸳鸯石”讲的都是昭君死后又行善于人间,搭救、帮助穷人的动人故事。可见昭君的恩情像黑河水、香溪水一样深厚,昭君的魅力像大青山、纱帽山一样绵长无边。昭君故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事一物,都与昭君的美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昭君葬地的蓝天白云、青山黑水、美酒良马,都与昭君有着连绵不断的缘分。无论是故里还是塞北,昭君故事传说中都蕴含着情,蕴含着爱,体现着和,有着神奇的灵性,有着浓郁的芳香,让人着迷,让人想象,让人深思。

二、内容主旨比较分析

古代吟咏昭君诗词的内容主旨,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赞颂昭君出塞和亲。有最早西汉焦延寿的诗为证:“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萃之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萃之益)这二首诗主旨所体现的“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人民的心愿。

二是,凄凉悲怨,怜其远嫁。约东汉末,有托名为昭君自作的《怨旷思惟歌》,此诗载于《琴操》,诗中突出了昭君囚禁宫廷之苦和对父母乡国的思念。诗中“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颀颀。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抒发了昭君因失去自由和远嫁绝域而感受到的彷徨和悲伤。具有浓郁的悲剧情调。这一基调,深远地影响着后代诗人,成为后代许多诗人咏唱昭君出塞的主题、主调。诗中塑造了一个怜其远嫁,悲切、哀婉,泪别汉阙的昭君形象。

三是,反对昭君出塞和亲。晋代石崇的诗反映了这一主旨,其中“父子间凌辱,对之惭且惊”,“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写昭君求死不得,苟且偷生,“匣中玉”,“粪上英”,更是对昭君的侮辱,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违背了昭君自愿请行的事实。

四是,谴责皇帝昏聩糊涂。唐代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还有白居易的《昭君怨》,“见疏从道迷途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召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这二首诗的主旨是谴责皇帝的昏聩糊涂,寡恩无情,只相信画工的图像,不识昭君的真面目。

五是,赞颂昭君爱情的美好。宋代王安石《明妃曲》中写道:“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诗主题的开掘,大胆惊人,冲破传统的观念意识,把人与人的相知看得高于一切,赞美肯定了昭君、单于爱情的美好。元代张翥《昭君怨》中写

道：“对对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却胜汉宫人，闭长门。”此诗刻画了宏大喜庆的场面，如诗如画，爱情美好甜美，这是长门汉宫人无法比拟的。这首诗一扫昭君悲怨的形象，让人眼前一亮。

六是，颂扬昭君和亲的价值。明代赵介的《题昭君图》写道：“玉筋啼红别汉京，天骄含笑拟长城。傍人莫讶腰肢瘦，犹胜嫫姚千万兵。”此诗彰显了昭君出塞和亲的价值，一个柔弱女子的功劳，胜过“嫫姚千万兵”。昭君像长城一样，给汉匈人民带来牢固的安宁幸福。还有高璧的《昭君曲》：“奉诏事和亲，从容出禁宸。缘知平国难，犹胜奉君身。”赞许昭君平定国难，胜过侍奉君王一人，功比卫、霍。从历史的角度肯定昭君的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赞颂昭君主动请行，不做宫中一舞人的，以及谩骂画工毛延寿奸诈为主旨的诗词，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相比较，昭君故事传说的内容主旨集中鲜明，平实质朴，积极：

其一，彰显了和合的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睦，族与族的融洽。昭君美丽、质朴、智慧、勇敢、重情、正义的品质，成为故事传说中的主题、主旋律。汉匈两族人民对昭君的喜悦、爱戴、敬仰的情怀是故事传说的感情主线。在两族人民的心目中，美丽的昭君是一面和亲成功的旗帜，昭示着时代的潮流与进步。与诗、词、戏剧相反，故事传说中，绝没有反对和亲，怜其远嫁，谴责皇帝无能，谩骂画工奸诈的主题，也没有文人笔下过度的悲怨，没有借昭君之事，宣泄自己不平的主观意志。

昭君故事传说中，人们按照心目中的期盼、理想，赋予昭君智慧、力量、神力、法力，塑造了为人民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理想化的魅力昭君形象。故事传说中的主题与昭君形象的塑造，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刘勰提出的文学创作中的“奇与正”、“华与实”的关系，没有因追求奇而失正，也没有因华丽而失实。“正”与“实”是故事传说的根基，没有它则没有昭君故事传说。

其二，昭君故事传说除了展示人民期盼汉匈两族友好亲善，生活安康，天下太平，和谐美好，和

平共处的主旨之外，它的文外之意，还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这也是故事传说主旨中的“味”中之味，是我们应该深入品味的地方。

三、故事传说的艺术特色

第一人称讲述。昭君故事传说的讲述方式为第一人称。以邹志斌、蔡长明主编的《昭君传说卷》为范例，全书的讲述人有73位，讲了54个故事，有的故事是几个人完成的。使用第一人称讲述的好处是：

一是，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讲述“我”知道的故事，就如同面对面地诉说，设个悬念，引人入胜，可以把控读者的感情，跟着“我”的感觉走，让读者从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譬如“在很久很久以前，宝坪有个美丽的传说……”是什么样的传说，让“我”慢慢道来，读者则会顺着“我”讲的故事一路“听”下去。

二是，给读者的感觉真实，读者可以进行再创作。随着“我”的讲述，读者能够产生如见其人，如听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譬如在“昭君渡”的传说中，昭君智斗恶蟒，“在白沙河边，恶蟒正在兴风作浪，昭君弹起琵琶，恶蟒抬头一听，渐渐没了劲儿，接着昭君又摘下竹叶撒到河中，变成万支利箭直射恶蟒，恶蟒招架不住，沉到河底去了”。昭君智斗恶蟒的场面，文字虽粗略，但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昭君弹琵琶的声音，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及以往的经验，进行无限的联想与再创作。有灵性有张力的琵琶声音可急可缓，可强可弱，可高可低，恶蟒听了疼得腾空、入海，最终没了劲儿。撒下的竹叶，瞬间变利箭，密密匝匝布满白沙河的周边，直射恶蟒，恶蟒身中利箭，扭曲腾跃，水裹着蟒，蟒缠着水，河水激起百丈高的浪花，场面恢弘。所有这些，任凭读者的思绪随着故事的情节，驰骋想象，真可谓“心游万仞”，“视通万里”，“思接千载”。

三是，故事传说口语化，读者能够感受到讲述

者的口气,容易受到感染、打动。譬如“站穿石”的故事传说中,昭君捡到被顾家老爸抛弃的五女儿,回到家对母亲说:“妈!这么好的娃娃被丢了,怪可怜的。”当母亲不同意收养的时候,昭君又说:“妈!这么一点的娃娃,也是一条性命,您老有困难,我起早摸晚,多做点事把她喂活才是啊!”这一席话,朴实有情,深深打动了读者,昭君姑娘说话的口气,焦急的神情,跃然纸上,让人感受到昭君姑娘执著的爱心、热心、同情心。

现实与浪漫相结合。昭君故事传说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昭君的出生、昭君的出生地、昭君的选秀、昭君的出塞和亲、昭君墓都不是空悬来风,都是以历史事实、兴山县志、当地名胜古迹为根据的,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在口头创作中,不断融进了创作者的审美情感,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与愿望,通过想象、幻想、夸张、通感、拟人等手法,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意愿,丰富了昭君的美好形象,昭君成了人们心中期盼的无所不能、神奇的女子、英雄人物。昭君佩戴的宝珠、使用的手帕、弹拨的琵琶、喂养的白鸽、救助的白鹤、流下的眼泪、昭君墓的土、昭君洞中的金马驹等等,这些意象都是故事传说的切入点,都充满灵性,有情有义,变化莫测,芳香四溢,瑰丽神奇,都有感人的力量,抒发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涂抹着斑斓的浪漫主义色彩。

譬如“彩石溪”的故事,讲了昭君省亲返回长安的时候,香溪两岸的百姓都来为昭君送行,人们哭泣的泪水,汇成河水,冲击了东海龙王的水晶宫。老龙王和龙子龙孙们受了感动,都纷纷潸然泪下,各色龙的泪水,落入水中,变成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成了现今的“彩石溪”。龙王送行,眼泪变彩石,感天动地,从此香溪风平浪静。昭君出塞,能让人龙对话,天人合一,情感传递,浪漫至极,人们心中的愿望、真诚,成就了传说的美丽动人。

再如“锦囊”的故事传说,讲述了昭君省亲返回塞外之后,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久旱不雨,

牲畜饿死。在飞沙走石中,刮起一股邪风,说是昭君带来的灾害。在困惑难解的时候,昭君真诚的眼泪,变成了小溪,化悲为喜,她从锦囊中,拿出神剪,剪出了活蹦乱跳的牛羊,又拿出了融合着香溪人民情谊的五谷种子,撒到地上,顷刻之间,塞外的土地上就长出了庄稼。最后阴山变绿了,黑水变青了,大漠变美了。昭君的真心、诚心,打动了天地,一切都变了,把理想期望的变成了现实美景,应了昭君父母的话:“这如意囊袋里装的全是汉家的心意。”心意战胜了自然灾害,也印证了历史的真实,昭君带来汉朝的种子、农业技术,给大漠带来了福音,真心换来了匈奴族人民的信任与爱戴。昭君不愧为宁胡阏氏,匈奴族人民坦诚地把战胜自然灾害的希望,嘱托给昭君阏氏,把她看成是实现理想生活的象征,认为昭君能够给匈奴人民带来幸福安宁。同时也反映了在生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表现了对自然敬畏、无能为力的心态,以及希望战胜自然的期盼。这种时空颠倒,上天入地,人神合一,变化多端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正好适应、满足了人们改变现实的需求与期盼。

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昭君故事传说,与诗词、散文、戏剧、小说相比,她不晦涩难懂,不像各种文体必须遵守创作的“清规戒律”。诗有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律诗绝句、自由诗等,讲究诗意、诗境。词有词牌,填词有规矩有讲究。散文讲究形散神不散,言辞富丽;讲究文眼、警句。戏剧讲究情节、冲突、语言;讲究唱念做打。小说讲究起承转合;讲究环境、人物、情节。而昭君故事传说,因为是口口传承,所以口语化,跟唠嗑一样,即兴而讲,从心而出,绝无刻意为之,通俗易懂,不用咬文嚼字,之乎者也;又因是故事传说体,那必定有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有的故事险而有变,有的故事奇而有致。譬如昭君战黄龙、斗恶蟒的场面,腾云驾雾,雷鸣电闪,千变万化,令人遐想无边。人们送昭君的场景,河水澎湃,朝拜昭君,昭君说:“免朝!免朝!”河水听之,乖乖而退,神奇而美妙,让人难以忘怀。昭君故事传说的艺术特色、写作手法,经过千年的

“淘洗”、“锤炼”，对后世文人仍有学习借鉴的地方。

四、故事传说的价值

历史价值。昭君故事传说，是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研究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是学者们历来重视的。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记载只有六百多字，这就需要我们花力气，不仅研究诗词、散文、戏剧、小说的价值，探讨与昭君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还应该研究故事传说的特殊价值，因为昭君是平民家的女儿，其父辈以及她在入宫之前的生活，历史上没有多少记载，但在民间文学的故事传说中，有最真实、最全面的反映，原汁原味的故事传说能反映昭君的真面目，一些故事传说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已超过历史的记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民间文学是文人创作的生命源泉。我们研究远古时代的历史，几乎全部依靠口头文学材料，通过神话的“折光”，来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譬如：从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中，知道了中国古代大范围发生洪水的事实；从黄帝擒蚩尤的神话故事中，了解到古代氏族社会部族之间的相互斗争；从伏羲兄妹结婚的神话故事中，可以推测远古时期婚姻制度的某些特点。正如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的那样：“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研究昭君故事传说，有它的历史价值，可以填补、丰富历史记载的不足，进一步挖掘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提炼精华，弘扬昭君文化精神，为大中华再做好事。

欣赏价值。昭君故事传说，纯真朴实，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创作最可贵的手法之一，就是崇尚自然本色

美，一切都从讲述者的心底自然流出，文采看似粗俗，实则字里行间饱含深情，讲的就是昭君的真善美，昭君的大智大勇，昭君的和合献身精神，这种朴素的“天籁”之美，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它的美在于：

其一，不需要锤炼，原生态形式。就像苏轼说的“冲口而出”，“纵手而成”。恰如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其二，平实自然，不需要“膏唇拭舌，描眉画眼”。粉饰太多，故作高深。

其三，以情感人，情感审美是昭君故事传说的一大亮点，也是欣赏的焦点。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无情的东西，词采华丽也没味道，让人生厌。钟嵘《诗品》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钟嵘看来作品“有滋味”才有看头，有欣赏的价值。从刘勰和钟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有情、有滋味是作品美的极致。

昭君故事传说中的每一篇都有情、有滋味，有让人心窝、眼窝潮热的地方。昭君扶危济困，以自己的知识、智慧、胆识惠及两族人民，所搭救、扶助的人数不清：“珍珠潭”中的小儿、“站穿石”中的简姑、“希荒垭”中的西花、“桃花女”中的桃花、“金龙含珠”中的孙娃子和爷爷、“宝坪的由来”中的乡亲们、“锦囊”中的大漠人民等等。一桩桩一件件都蕴含着昭君的情感，都体现着昭君对父母、对乡亲、对汉朝、对单于、对匈奴人民的浓浓的情与爱。《文心雕龙·情采篇》指出：情是“质”，采是“文”，情采结合，文质相符，文章才能达到极致。昭君故事传说，打动读者，流传千年之久的真谛、本质，就是“情”，以朴实的情感连接着汉匈两族人民。

昭君不仅对人有情有爱，对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美好的事物也都充满了热爱：“妃台晓日”中的金凤凰、“马龙潭”中的小白马、“望月楼”中的月亮、“琵琶桥”中的琵琶、“鸽子树”中的小白鸽、“桃花鱼”中的桃花鱼等等。这些意象都有灵性，是昭君思想、情感的寄托与体现，也是我们审美的要处。

再拿眼泪来说，昭君故事传说中，有不少写眼泪的地方：龙王的眼泪、百姓的眼泪、昭君的眼

泪、昭君父母的眼泪、讲述者的眼泪、读者的眼泪等等,无论是悲泪、喜泪,还是感动之泪都是一个情感的体现,这也是故事传说好看的地方,有滋味的地方,给人以情感审美的愉悦。

昭君故事传说真善美的原汁原味,就是以情为主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打动、支配着人们的情感。昭君文化,“关乎人文,以化天下。”对人的熏陶和滋养,像春风化雨一样,所到之处,春意盎然,满眼绿色。

不仅如此,通过口口相传的昭君故事传说,也为历代文人的诗词、散文、戏曲、小说等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素材、题材。昭君故事传说是个宝库,面对开放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

昭君故事传说也将会踏着时代的脉搏,不断吸纳新鲜的内容,以事实为基础,创造出符合人民心愿的新的故事传说,使其内涵和外延,更加深厚、丰富多彩,赢得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众,创造更大的文化与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昭君故事传说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抓紧时间,做好规划,付诸行动,挖掘精华,弘扬昭君精神,让昭君、昭君文化更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效益,使和合的精神光照人间。这是热爱昭君、研究昭君文化人竭尽全力完成的事业。

作者赵可新,女,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内蒙古写作学会副会长。

王昭君传说地缘小考

蔡长明

无论是社会人、自然人都有亲缘关系。论及昭君的亲缘关系,首先得提到姓氏问题。兴山人口十八万之众,据《兴山百家姓寻根》(郝明知、韩兴浒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提供的资料,王姓共计17162人,在全县236个姓氏中,名列榜首。

昭君村(宝坪)王姓颇多,他们说王昭君出生在宝坪,并自称与王昭君家族有关。王作章老人竟然称自己是昭君家族的七十二代孙,拿出王氏“排行谱系”展示。“谱系”非王氏族谱,单张片纸,亦不可信。此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说王昭君出生地不在宝坪,是在兴山南阳镇的百羊寨七连坪。持“七连坪”说理由有二:其一,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兴山县志》载:“汉王媼邑之七连坪人。”此志书一卷,手抄本。清同治四年(1865年)木刻版《兴山县志》亦载:“七连坪明妃生处。”其二,有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拔贡贾治(兴山人)咏《七连坪吊明妃》的诗作为证:

真到明妃生长处,
乱峰高下彩云间。
可怜憔悴边关月,
长照香溪洗翠鬟。

除以上文字记载,亦有民间传说。王君汉,民间艺人,家住七连坪,现年(2006年)85岁。读六年私塾,一生务农,能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

古书,会唱丧鼓、打薨草锣鼓。据他讲:秦汉时期,兵荒马乱,王家逃难到兴山。进山公公王金鼎的夫人殷氏老祖,生了昭君、王科、王学三个孩子。王金鼎做小生意被人暗杀。殷氏养不活,就把王昭君过继给么爹王金怀抚养。王金怀迁居高阳镇宝坪村,逐步发展起来。七连坪、宝坪的王姓原属一个宗族的分支。七连坪的后坪老屋场就是王昭君的出生地。殷氏死后葬在老虎垭,墓室周围有火砖砌墙,民国时每年开清明会到墓前祭祖。王昭君在七连坪住了七年,然后才到宝坪,所以七连坪又叫“七年坪”和“七龄坪”。

王氏族谱文革时烧毁,墓室也无从考据,唯有七连坪倒有一说:即清顺治初(1664年),官兵大举围剿李来亨农民军,那里曾驻扎过军队,故称“七连坪”。

《兴山百家姓寻根》上记述:“现居南阳镇百羊寨(七连坪)、高阳镇宝坪的王姓,祖籍江西南昌朱市巷,明朝万历末年,由王殷氏带领进兴山,落籍百羊寨。”王殷氏的曾孙王焕所修的《王氏族谱》上载:王氏有四子,两兄弟分居到宝坪,两兄弟留居百羊寨,后人又散居七连坪。现传十六代,字辈谱为:应以大文光,本君作育先,忠必能辅国,世代兆祥天,修正斯为英,立志在成全,敬宗伦常礼,发达耀庭前。以上著述与王作章、王君汉二位老人的口传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兴山的王姓散居十多处,祖籍出自河南确山、江西南昌朱市巷、山西太原及湖北荆州、监利等地,大多是明末清初落脚兴山,最早的一支是高阳镇小礼溪王姓,于明代正统年间(约1440年)到兴山落籍。七连坪、宝坪的王姓,来兴山的时间是明万历末年(1573年),比小礼溪的王姓来兴山更晚。王昭君生于约公元前五十二年,与七连坪王殷氏来兴山落脚的时间相差一千五百多年。那么把七连坪、宝坪说成王昭君的出生地,除了《兴山县志》上“汉王媼邑之七连坪”及“七连坪明妃生处”的两句话外,再无其他实据可考,实难让人信服。

“王姓是兴山的第一大姓,自古以来兴山就有王姓居住,西汉王媼(昭君)就出生在兴山。”(《兴

山百家姓寻根》第31页)王昭君兴山人无疑,那么她的具体出生地到底在哪儿呢?

首先看史书记载:

《宋史·地理志》载:“宋开宝元年(968年),移县城于昭君院,端拱二年(989年)又徙香溪北岸。”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有记:“兴山县,王媼生焉,今有昭君台,香溪尚存,城南二里有昭君庙。”《一统志·宜昌府·祠庙》云:“王昭君祠,在兴山县南昭君村,祀汉王媼。”

《清一统志》载:“昭君村在兴山县南,有昭君院,又有昭君台,县南一里妃台山即其地也。”

《兴山县志·典礼志》中说昭君祠在“城南一里,汉建,久废”。

吴翰章是清穆宗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余雅榜举人,家住兴山响滩,对昭君的出生地应十分清楚,所著的《双溪杂记》中云:“邑人建奎阁于县南妃台山上,土中掘得一碑,大字四文曰‘昭君故里’。小字漫灭,惟‘宋’字可辨识,盖宋代物也。……咸丰七年,奎阁毁,碑亦不存。光绪十年秋七月,知县黄世崇重立石于奎阁故址,仍题曰‘昭君故里’。”

又据1997年版《兴山县志》记:“据陈云桥口述:他看过《陈氏族谱》载有:原籍江西,明弘治三年(1490年),陈姓买下昭君院部分产业,改名陈家湾。”

北宋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元人编修的《宋史·地理志》以及《方輿纪胜》等“正史”,对昭君的出生地均有明确记载,不再一一赘述。从上面列举的史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县西、宝坪”字样的记载。

其次,从有关昭君的遗迹看。

流传千古的昭君台至今仍“立于奎阁故址”——妃台山上。登台俯瞰,高阳镇鳞次栉比的楼房、商店尽收眼底。如带的香溪款款而来,流经高阳镇,湍急的河水给峭壁一挡,轰然如雷,一阵翻银滚雪过后,忽而往南一折:碧水洄漩,连环两岸,这便是兴山有名的“洄水沱”。传说王昭君进宫的花船打这里经过,洄水悠悠漩着,不肯放行。宋徽

宗时,邑人免谷珍考取状元,乘船南下,到了洄水沱,船儿照例洄漩潭中,打洄水里划不出来。源此,“洄水沱”就成了兴山人念家的象征。的确如此,兴山人无论走到天南海北,总会像洄水沱的洄水那样,对家乡怀有深深的、难以割舍的眷眷之情。

河水经洄水沱出来,水势温柔,清波浅荡,缓缓南流不出三十丈,就到了妃台山的脚下——兴山八景之一的“珍珠潭”了。

老一辈人传,说当年王昭君在潭边洗手,不慎遗珠潭中;潭水清澈,朝辉掩映,生五色祥光。清人易之瑶咏《珍珠潭》一首:

澄澈在中央,
潭水夜有光。
明妃留胜迹,
此地涤新妆。
月色三秋白,
缓流万古香。

珍珠潭岸边有个绣鞋洞。传说昭君离开家乡的那天,上船不小心让河水打湿了鞋子。待昭君换了鞋,湿鞋放入洞里,这个洞从此就叫“绣鞋洞”。后来人们望儿子,就去向洞里丢石子。石子打进洞里,算运气,可将洞里的许多小巧绣花鞋,悄悄取一双出来,等生了儿子还愿时,再绣一双放到洞里,蛮灵验,传得很神。绣鞋洞跟前立有四通一米多高的石碑,上书“珠潭秋月”、“遗珠留香”等大字。石碑因修建兴(山)香(溪)公路,毁于1958年。

打绣鞋洞上陈家湾,路口有上马台、下马礅。当地人讲,人们要去陈家湾祭拜昭君娘娘,文官到此要下轿,武官到此要下马,步行而至,以示心诚。昭君祠约毁于上世纪初,遗址尚存,陈家湾的人如今把那块地方叫“庙圈子”。祠堂里供奉着昭君的雕像同牌位,人们信奉昭君是观世音转世,远近的百姓都来敬奉。这当中有求子的,有求财免灾的,有求亲人平安清静的,有求和气生财的,有求风调雨顺的,还有许愿还愿的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祠堂里香火鼎盛,抽签卜课,宣扬《道德经》、《圆觉经》的诵唱声不绝于耳。

昭君娘娘有求必应,蛮灵验,就连祠堂门前的

一溜柚子树,也被人们奉为一棵棵神树。这柚树结的柚子很特别,形状像一个一个的葫芦,剥开看,里头的柚肉呈肉红色,吃起来又香又甜,人们叫它胭脂柚。传说昭君进宫临行,村姑桃花送来几个柚子,让昭君在路上解渴。昭君接过柚子,一激动,一颗带有脂粉的泪珠滴到柚子皮上,即刻,这柚子香气四溢,就连里头的柚肉也变成了胭脂颜色。许多前来敬香的善男信女,不求别的,单求一个胭脂柚回家,让姊妹们分吃,往后,姑娘们的面皮就长得同胭脂一样嫩红好看了。

这里单说一个昭君显圣治贪官的故事。

说的是兴山刚立县不久,便来了个姓邱的知县,大家都叫他邱老爷。邱老爷一到任上,就同饿牢里放出来的老豹子,恨不得一口就吃出个胖子来。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不择手段,连昭君祠的香火钱也从未放过。

每逢佳节倍思亲,那天八月十五,是人们奉香敬神的大吉日,乡人念昭君,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赶来。祠堂内外,人来人往,香烟缭绕,好一番热闹景象。邱老爷瞅准这个机会,带了一行人到昭君祠刮钱。一下马,看到眼前的情形,不禁联想到自己门可罗雀的衙门,两下里对照,心里很不是滋味,暗中骂道:“贱民,放着活菩萨不敬,敬死菩萨,真正的贱民!”

邱老爷刮了些香钱不算,还要把人们敬神的香油带些回家。祠里执事实在看不过眼儿,便愤愤然说:“你就不怕报应?”

邱老爷摆出一副大气度,哈哈笑道:“报应,什么报应?常言道,官出于民,民出于土。我堂堂县令本该得到子民的供奉,眼下待我亲自来取,更是理所应当。”

执事说:“既出此言,敢抽它一签?”

邱老爷摇头:“我不信佛。”这时一些跟随在旁边附和,让邱老爷试一试,只当好玩。

邱老爷磨不过,犹疑一下,顺手抽了一签,仔细一看,签上写道:

神劝知县大老爷
多做善事少作孽

你今若是不相信
出门就把脚来跌

老爷看过签语,很想发火,但又怕失面子,丢掉香签,仰天打着哈哈往门外走去。说来也是凑巧,真是现世现报,邱老爷前脚刚一拿出门槛,只一崴,脚脖子扭伤了。

伤筋动骨一百日,邱老爷养好伤,再次来到昭君祠,喊来执事嚷着抽签,看到底是真灵验还是假灵验。说罢抽签在手,签上写着:

神劝知县大老爷
当官为民多修德
鱼肉百姓若不改
脚好又把腿子折

邱老爷这下顾不得面子,香签一甩,气鼓鼓地往回走。待他骑马未稳,那马像受了惊骇,前蹄立起,接着往后一蹶,把邱老爷抛下马背,当时就把腿子摔折了。

邱老爷脾气倔强,终是不服气,腿伤未及痊愈,又带着一行人前往昭君祠抽签。签上写着:

神劝知县大老爷
事不过三须警觉
多行不义必自毙
麦子粑粑吃不得

邱老爷看着签语,自然是不肯相信,回到县衙,专等新麦上市。

转眼端阳节气到来,邱老爷命差役到市上买来小麦,连夜磨面,蒸麦子粑粑。第二天,热腾腾的粑粑端上桌子,邱老爷取一个粑粑在手,笑道:“上次抽签,说麦子粑粑吃不得,怎么吃不得?我偏偏吃给大家看。”说完正欲张口,一只黄蜂飞来,照嘴螫了一“箭”。疼得邱老爷放下粑粑喊救命。差役把邱老爷抬往昭君祠,请求昭君娘娘宽恕,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这时空中哗喇作响,降下一片祥云,云头上立着一个人,此人貌似观世音,又貌似昭君娘娘。金光耀眼,渐渐来到地面,霎时变得雾气腾腾,不见其人,却闻其声:

专心致佛脱九尘,百磨千难认得真。
金光明寺风雨至,感伤刑惨苍天思。

医亲手目将来割,从古至今独善心。
救苦救难度苍生,要学南海观世音。

仙语过后,雾去人空。这时的邱老爷想说话也说不出来了,改邪归正也来不及了,蜂毒肿痛,封喉而死。

最后从风水学角度分析。

当地老人讲述:妃台山通巴蜀之气,绵延千里,出有根,来有势。香溪傍山而走,山脉伴香溪而行,迤迳至高阳镇,溪水折东往南;妃台山匍匐而下,前伏后扬,呈马鞍形,如潜龙饮水,直抵珍珠潭。临溪凸生一峰,名“狮子包”。狮子包与马鞍形——三峰相峙,中间如元宝卧底,陈家湾就坐落在元宝之中。村后有妃台山所倚,村前有狮子包做案,就同一只琵琶搁在妃台山上(山上有个小地名叫琵琶凹)。听风水先生说,此处是出美人的地方。

大自然是个巧夺天工的艺术大师,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昭君台的对面,平视而去,约一公里处,有个地名叫鲁家坡。山形地貌与陈家湾大同小异,像个灯盏窝,那里也曾出现过一个人——鲁金定。

请看《双凤奇缘》的一段描述:

说罢,(孙龙、赵保)二人出了馆驿,不敢怠慢,四处细访。访到第三日,打听出越州南乡有一个大财主,姓鲁,村名就叫鲁家庄(坡),庄内这位有钱的鲁员外,娶妻赵氏。家中豪富,广有金银,只可恨膝下无子,单生一女(名鲁金定),年方二九,十分伶俐聪明,虽貌减昭君,却也体态风流。孙、赵二人访着此女,心中大喜,急急找到鲁家庄要去掉包。

上述虽为小说家言,倒也正好被小说家言中:兴山确实有个鲁家庄(坡),与陈家湾隔河相望。鲁姓人丁至今还有三百多口。鲁员外这个人物大家并不陌生,在《王昭君传说》中曾多次出现。看起来似乎是巧合,细细揣测,小说家依据当地风物原型,描摹生活倒也未必不是。

兴山地处鄂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大人稀的自然环境,使兴山在历史上常常成为兵家争夺的地方。频仍的兵燹蹂躏,带给人们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早在三国时期,兴山属进川入楚的交通孔

道,遭兵戈之害自不待言。1634年,李自成所部攻破兴山,杀明知县刘定国。自1651年始,李来亨以兴山为据点,联合夔东十三家抗清,斗争长达十三年。1798年,“白莲教”义军驻扎兴山抗清,先后达5年之久。1857年,红巾军高二先(兴山人喜欢称“红毛贼”)所部入兴山开展抗清活动……匪患连年,逼得兴山人四处逃难。据清康熙年间所修《县志》中记载:“当时人口十仅存三,土著不满千人。”适时正是李来亨盘踞兴山县境。造成了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迁徙。

沧海桑田,星移物换。王昭君是汉家姑娘,其家族属当地土著人,有兴山第一大姓——17162人作证。如前面所述:“陈姓买下昭君院部分产业,改名陈家湾。”猜情度理,改名以前,陈家湾是否就是王家湾呢?

无论变化多大,万事不离其宗,按史书记载:“县南一里”、“妃台山上”、“昭君台下”、“下临清溪”……所指位置正好就是陈家湾。“加之近年内经过实地调查,文物工作者在妃台山南麓陆续发现了六朝以来的许多断砖残瓦,足见此地确有过古代建筑。”(引自谢源远《昭君故里考略》)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王昭君的出生地应在今高阳镇陈家湾。

王昭君既然出生在陈家湾,高阳镇西七里的宝坪又如何成了“昭君村”呢?可永雪、余国钦《有关昭君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是这样阐述的:“昭君村在明代改为陈家湾,这大概是因为后世王姓生齿不繁,陈姓人丁兴旺,成了村中的主体姓氏的缘故。”接下写道:“(昭君村定在宝坪)是上世纪兴山县领导经过调查研究而定的,不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跟着便举出四条理由:“其一,历史文献。宋邵搏《闻见后录》记载曰:‘昭君故宅为绿竹村。

绿阴蔽日,箭竹插天。宅前是青黛的香溪水,宅后是墨绿的纱帽山。’这与今日宝坪所在地域方位完全相符。”其二,旧址遗址都在宝坪。如楠木井、望月楼、昭君宅等。其三,故事传说。兴山地区有关昭君的传说几乎都是与宝坪为坐标而编织成的。其四,昭君进宫出塞以后,已从“良家子”步入宦宦之家,子侄繁盛,分支迁居宝坪。(引自《昭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会刊》,呼市昭君文化研究会,2007年8月,第203、204页)

开发旅游,建设文化娱乐园,发展地方经济无可厚非。但从史学角度出发,我们应取慎重态度,特别是像王昭君这样的历史人物。作为我们是昭君故里的一分子,感谢内蒙古的可、余二教授,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严肃的,明确指出:“并非两个昭君村,只是昭君村的扩大。”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细读谢源远《王昭君生籍地望辨析》一文。谢教授一生治学严谨,有关王昭君的出生地,依据历史,结论下得果断,不拖泥带水。针对两个昭君村的出现,文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借助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精辟见解来作答。1961年他在内蒙古考察时,听说大青山南麓除象征性的昭君墓地青冢以外,还有十几个昭君墓。翦老认为‘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今天,我们可以同样认为,兴山县境内之所以有两个昭君村,反映了兴山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为增进民族友谊起过积极作用的和亲使者怀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出生在自己的家乡。”(《昭君文化高层论坛会刊》,呼市昭君文化研究会,2007年8月,第130页)

作者蔡长明,男,汉族,湖北省兴山县文联
副主席。



关于匈奴文化

■ 沈昌伟

匈奴,是第一个建立游牧政权的民族;匈奴文化,以北方草原文化为主体,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精髓,兼容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奠基者。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三大古老文明的源头,而匈奴文化是我国古代草原文化的奠基者。所以,匈奴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

匈奴民族是世界的民族,匈奴文化是世界的文化。匈奴民族的构成是多元的,既有蒙古人种,也有中亚人种,是由多部族组合而成的;匈奴文化融合了蒙古高原草原、森林诸多部落的文化,也吸收了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东西方两种文化的长期交融发展,形成了匈奴文化的世界性。

一、全民皆兵英勇无敌

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者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地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

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羊奶。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

二、海纳百川化敌为友

草原帝国都是散发着原始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和南方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崇尚的是朴素和粗犷，反感的是繁文缛节。在这里你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领导者一起醉卧草丛，抵足而眠。草原民族厌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只要他相信你是真心归诚，他肯定会以诚相待。对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军事酋长领导阶段的匈奴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诚心接纳归顺者，对匈奴的发展有很大帮助。燕人中行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中行说本来是汉朝内宫的一名宦官。文帝时汉匈“和亲”，嫁宗室女给匈奴新君老上单于，命他随行。中行说不愿去，后被逼不过，只好前往。但临行时丢下一句狠话：“一定要让我去，汉朝可要有大祸患了。”汉廷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说说到做到，到了匈奴马上投降。中行说来自汉朝内宫，了解诸多汉廷机密，老上单于大喜，予以重用。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燕王卢绾投降后被封为东胡卢王，陈良做了贲都侯，卫律受封丁零王，李陵做了右校王，等等，每一个都是“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较之在汉朝职小官卑，稍不注意就可能丢官罢职，甚至祸连家族的境遇是天壤之别。受此恩惠，岂能不倾全力报答？

广泛吸收异族人才不仅是匈奴帝国强盛时的国策，即便在其没落低潮时也是如此，这也是他们能在后来重新崛起，称霸欧洲的条件之一。像“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下的三位心腹国务秘书，没一个是匈奴人：康斯坦丁是希腊人；埃德克是出生于匈奴部落里的哥特人；奥雷斯出身不详，可他的老婆可以肯定是西罗马帝国的名门望族。

三、尊崇英雄不甘屈服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汉将李陵投降匈奴后，一直虚与委蛇，不卖真力气。另一位降将李绪则认真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误以为是李陵在帮助匈奴，于是杀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机会杀死了李绪。按理说，李绪有功，李陵杀他应该受到惩罚，可匈奴偏偏不这么看。李绪是英雄，杀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于是，李陵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加官晋爵，封为右校王，还娶了单于的女儿。

由于这种特别的英雄观，使草原民族从匈奴开始即为血腥的征服和杀戮赋予了一层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按照匈奴的习俗，在作战中斩敌首级一颗赏酒一卮，所得财物尽归其所有，俘虏的妇女老幼收为其奴隶。杀敌越多，财物奴隶越多越受尊敬。于是，匈奴人以痛饮和嗜杀为人生之乐，作战时个个争先，唯恐落后。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他们的经济，是物质需要；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是精神需要。而两者又都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于是，率领他们把这种残酷的掠夺杀戮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本民族带到荣耀的顶峰的冒顿、阿提拉……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英雄中的英雄。

草原文化的先天不足，使他们过分地依赖英雄的存在。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四、民主自治淳朴善良

匈奴人究竟来自何方？目前，商代的鬼方、周代的玁狁，基本被学术界认定是匈奴的祖先。春秋时的戎狄是否是前者的直接延续还有争议。游牧民族天生有很强的流动性，非要给他找一个直系祖先似乎并不现实，把匈奴认定为由上古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似乎是一个虽然偷懒但肯定合理的结论。

牧民是淳朴、善良的化身。草原上不可能有旅馆，别人的毡房就是游客的家。对待远来的客人，他们会拿出美酒、奶酪供其享用，并提供住处。当然客人不能住得太久，因为牧民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像哈萨克人称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继续款待；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第四天再不走，就只好驱逐出去了。

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则挤奶，捅马乳，制作乳酪，剪羊毛织线，制衣服等。妇女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打仗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往往具有相当的地位。

“三权分立”的统治架构：

冒顿单于建立起他庞大的草原帝国后，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游牧生活艰苦，匈奴的人口很有限。在征服了众多外族部众后，怎样统治他们呢？聪明的大单于创造出一种“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他把整个帝国一分为三，自己统治帝国中心区域；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辖；帝国西部交由右贤王管理。三王各自建立王庭（首都或首府），大单于的王庭最初在杭爱山附近，后来为躲避汉朝打击，北撤到现在的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地区。除重大军事行动需要在单于的统一指挥下行动外，一般事务和小规模军事活动左、右贤王可以自行处理，无需向单于请示汇报。

匈奴以左为尊，所以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单于，左贤王一般是单于的候补人选，因此常常由单于瞩目的儿子担任。在贤王以下，分别设有谷蠡王、大将等职务，分别隶属左右贤王。

匈奴的统治结构看起来比较简单，左右各部“自治”的色彩很浓，集权的味道很淡，但是适合了匈奴不很发达的游牧经济水准，所以一直延续到1世纪匈奴衰落。即便在其西迁后仍有很大遗存。

五、以农辅牧尊商重工

造物主是公平的，在气候恶劣的蒙古高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使游牧民族可以更早地掌握冶铁技术，更早地获得锋利的武器，来和大自然搏斗，草原民族有着博大的胸怀，从来不拒绝外来的技术和知识，于是，农业和商业有了天然的生存土壤。和叫喊了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汉民族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

作为游牧民族，畜牧业自然是其经济形态中的主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为匈奴人的牧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加以有效看管，牛马羊群就可以大量繁殖。畜群既是他们的财富，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食畜肉，衣皮革，被毡裘”。牛羊的乳汁及其制成的干奶酪是他们必备的食品。

马是匈奴人最好的朋友，在匈奴人的词汇中，关于马的词汇最多，像骊、馱、騊、騊，等等。骡子的出现，说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杂交技术。在汉匈战争中经常有数以十万计的牲畜被掳走，说明他们的牧业成果是巨大的。

每年秋天马肥畜壮的时候，单于都会在蹏林举行大会，检验这一年来各部落畜牧的成果。在帝国的各行业中，畜牧业是唯一需要定期检查统计的，足见牧业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不过匈奴人逐水草而放牧的游牧经济毕竟是粗放的，不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活动。所以，一旦遇到风灾雨雪，严寒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经济萎缩，人民饥饿困毙，濒于绝境。这时，狩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

来了。

蒙古高原野兽种类繁多，既有可供食用的黄羊、野鹿，也有危害牧业生产的狼群、狐狸。所以，匈奴人的狩猎既有补充食物、手工业原料不足的目的，也有保护牧业生产的考虑。匈奴的狩猎一般集体进行，各部首领经常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围猎活动。在狩猎的同时进行练兵。他们打猎的常用方法是合围，然后乱箭齐发，竭泽而渔，一个不留。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到战场上，让汉人吃了大亏。

后来匈奴社会里还出现了诸如“射雕者”这样专门的猎户。

刚刚跨过文明门槛的匈奴人有农业，似乎很少有人能理解。其实不仅有，规模还很大。与定居民族不同的是，匈奴的农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随着游牧地的变化，隔几年换一个地方。蒙古高原土壤肥力较差，土层较薄，隔几年休耕，客观上正好符合生态需要。大青山一带土壤较为肥沃，是他们首选的农业地带，常种的谷物主要有小米、高粱、糜子等耐旱作物。

在占据了西域后，匈奴右贤王还曾派出人马到天山北麓的车师国屯田。车师国土地肥沃，汉朝政府在打通西域后也在这里驻兵屯田。匈奴和汉朝为了争夺在这里的屯田权力曾展开反复的争夺，说明匈奴人对农业非常重视。

生产出粮食就要贮藏。匈奴人发明了两种贮藏方法。一是“治楼”，即盖高楼，发挥其凉爽干燥又没有鼠害的优势；一是挖“大窖”。挖窖比盖楼技术复杂得多，既要保证不受地下水侵袭，确保干燥，又要防止其塌陷。估计蒙古高原良好的直立土层帮了匈奴人很大的忙。

正如适应游牧生活要有穹庐一样，适应农耕生活必然要有村落和城郭出现。头曼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是匈奴最有名的城池。它们大多点缀在适宜农耕的阴山山脉附近。从考古挖掘来看，匈奴人的城池和汉地的差不多。城中建筑物多为土木结构，屋脊也用瓦当覆盖。地下有下水管道，城周有围墙。墙外有数道壕沟。居民一般住在城外。

在匈奴的农业中少不了汉人的影子。战国、秦

汉时代，“夷夏”的区分观念并不浓烈，经常有汉人因为不满内地统治逃往草原，匈奴的不时南下，也使边境上的汉人被大量掳掠而去。这些北去的汉族人肯定会把他们掌握的农耕、筑城技术带给匈奴。他们是草原与中原联系的纽带，也是汉匈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

弓箭让罗马人在第一时间领略了匈奴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毛皮制衣工、金施工、木匠、木雕工、象牙雕工、皮革制件工、补锅匠、陶工、车辆制造匠，等等，不一而足。

匈奴人最擅长的是冶炼、制造铁器。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蕴藏了大量的富铁矿石，为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至晚从公元前7世纪起，匈奴人已经开始冶铁并用其制造铁斧、铁刀一类生产工具。由于铁制工具更坚硬、更有韧性，很快被用于生产兵器。著名的“径路刀”即是铁制匕首。三棱箭镞更是让敌人魂飞魄散。

匈奴人兴起的河套地区曾经诞生过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说明他们冶炼青铜器的历史更为久远。后来由于兵器多用铁制，青铜器基本被用于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锅、铜铃、炊具，等等。

草原民族受地理环境限制，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天生就需要商业的辅助。他们和周边民族，和中原内地都有商贸往来。用于交换的主要是马匹牛羊。

由于商业对他们至关重要，汉朝政府经常以禁止边境贸易作为手段来要挟匈奴。匈奴也在同汉朝的“和亲”谈判中每次都要附带上开“关市”一条。

由于性格粗犷，不善于在商场上勾心斗角，经商的一般是外族人。因此，匈奴民众对商人向来很尊重，和汉人的“重农抑商”截然相反。西汉大行令王恢派侠客聂壹以商人身份往来于汉匈之间刺探情报，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边境小吏泄漏了消息，匈奴大单于差点就被这个假冒的商人骗到30万汉军的包围圈中。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就像三朵鲜花盛开在匈奴的大地上。商业则像绿叶陪衬其间。匈奴的经济大厦就是靠着三花一叶,雄起于塞北高原。

六、萨满信仰情感依托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曾经普遍存在于草原民族当中。草原民族信奉萨满教,有其深刻的原因。对千奇百怪、变化万端自然现象的不理解,既依赖它,又对它感到恐惧,认为是某种超人力的神灵在掌握这一切,于是拜倒在它的脚下。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人们就会把与自身生辰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自然现象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恩格斯曾说:“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样,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便在人们的生活中应运而生。

在萨满世界里,“萨满”——巫师是中心环节。萨满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而深通诸灵界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具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萨满的基本素质。在选拔萨满时,这种能力就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

萨满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萨满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在治病方面,萨满采取的主要不是医术,而是巫术。萨满在治病时,以跳神的方式为主,也辅助动用水、火、木器、金属器等作法的巫术手段。如萨满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立即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这就是一种所谓以神灵驱病魔的巫医技巧。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然后施以萨满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

用火烧掉替身。

匈奴的萨满,在中文史籍中称“胡巫”,一般是女性。除了替单于沟通上天、祖先之外,匈奴的巫师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当然,这些巫师并非只会装神弄鬼,他们也能治病救人。其巫术很多就是灵感来自自然的原始的临床医学。苏武出使,被动卷入一场政变,引刀自杀。巫医紧急治疗,在地上挖了个坑,燃起温火,把苏武放在上面,用脚踩他的后背,直到踩出血。苏武原本已经气绝,在巫医的治疗下果然又苏醒了过来。

在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单于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单于的阏氏则代表后土——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自己的发祥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不幸的是,此地后来又被汉将霍去病夺取,来祭祀用的“祭天金人”也被掳去。按照《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也不敢怠慢,把他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派专人烧香礼拜。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据东部的左贤王地位仅次于单于。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东)开。大概是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非常喜欢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自然的崇拜自然衍生出对鬼神的恐惧。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们一般会将其归之于鬼神作怪,敬而远之。比如苏武被扣留后,单于断绝了他的饮食,关在地窖里。正好天下大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单于以为有神保护,连

忙释放,并迁徙到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安置。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他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马上发兵痛击乌桓。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更多的关于匈奴人精神生活的信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信仰的是原始的图腾崇拜的进化物,以崇拜偶像为特点。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是中原政权消弭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的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

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因为黄教号召教民除留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外,其他儿子都要出家为僧。出家僧人当然不能娶妻生子。

幸运的是,在匈奴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政府也还没有完全剔除百家诸子的影响,儒学的正统地位还在树立和巩固过程当中。自己的精神还没有完全统一武装起来,自然无法去控制别人的精神世界。匈奴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所以,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究竟是福是祸,后人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其信仰没有受到外来冲击,才保证了匈奴人借以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

作者沈昌伟,男,汉族,呼和浩特市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战国至西汉初叶时期的 民族关系初探

李志阳

一、从匈奴起源说起

关于匈奴起源地,一致认为是起源于阴山及河套地区。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历史上的西周初期,居住在阴山以及河套一带的猗狁、荤粥

等部落,受到新建立的周王朝的威逼与打击,这些部落被迫向北迁移,定居于漠北,并与原居住在漠北的各部落结合,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逐渐融合成古代的匈奴族。又经过五百多年的繁养生息,到公元前4世纪,基本成为了蒙古高原上最大的霸

主。公元前3世纪,即战国时期,匈奴主要在蒙古高原游牧,随着游牧范围逐渐扩大,战国末期匈奴人开始西迁,他们到达了中国古代的西域,联合乌孙打败了月氏,降服了西域的二十余国,称霸西域,成就了从蒙古高原到中亚地区的“匈奴王国”。从土地面积看,强盛时期的匈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沿长城与燕赵以致秦汉相邻,并一度控制鄂尔多斯和河套一带;西以阿尔泰山为界,北达贝加尔湖周边,建立了史上空前辽阔马背上的“百蛮大国”,其版图相当于今天的数个中国土地面积之和。

二、时燃时熄的边关烽火

从地理环境和游牧民族生存特点分析,古代游牧民族生活在北方草原以及崇山峻岭、戈壁流沙之中。古代的寒冷气候、艰苦的生活环境,又加上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无郊,无力从事家园以及文明建设,生存环境之艰难,那可想而知了,游牧人为图谋生存,获取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草原灾害多,生活必需品一旦破坏并无法自给,游牧人就会处于险恶环境,所以他们必须设法调整生存空间,导致他们劫抢四邻,同邻近部落发起战争,也就成为游牧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从这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看,游牧民族注定是一生从戎,马背上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匈奴族是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但对周王朝基本构不成绝对的威胁,所以这段时期,草原上除匈奴、东胡外,并未出现叱咤风云的霸主,这也给匈奴人的崛起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战国时期,匈奴人逐渐走向强盛,开始叩塞,拉开了匈奴与中原南北民族的战争序幕。我们按历史顺序分析一下几次民族间的战争与战事。

1. 赵武灵王——“骑射胡服捍北疆”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相对辽阔,以邯郸为郡,地处古代中国的北部,在当时相对强大,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北接匈奴,而匈奴叩塞,首先要发生冲突的当然是赵国,当时赵国不但要从战国七雄中

立足,还要在北方排除匈奴干扰,所以历史上选择了并造就了一代威武帝王——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将长城修到阴山之巅,标志着匈奴与中原的原始分割线形成。更可贵的是,赵武灵王以中原王朝身份,顶着传统世俗压力向少数民族学习,即学习匈奴人的“胡服骑射”。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生前所著《内蒙访古》一文中,对赵武灵王有着积极的高度评价。

2. 秦始皇——“亡我者胡也”

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古代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王朝,也揭开了短命秦王朝的序幕,秦始皇统一中原,其内心最大的忧患是北方的匈奴族,自己曾预言说“亡我者胡也”。当时匈奴已利用战国末期纷争的局面,控制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进而踏上了进入中原的跳板。秦始皇于是遣蒙恬大将,率30万精兵强将组成的大军北击匈奴。一代忠肝义胆的名将,面对匈奴人骑士特点,在草原战场上采用改进的武器装备,简单说就是将弓箭手装备在前面有屏障的战车中,有效地遏制对手马背上的快速特点,当靠近对手时,万箭齐发,仅此一项改进,再结合多种军事手段,蒙恬将军连战连捷,一举拿下河套地区,继而将匈奴逐出了鄂尔多斯高原,将秦燕赵长城首尾相连并加以增补,将长城延伸到阴山北麓,形成壮观庞大的万里长城。根据运输供给困难的局面,又修建了从秦都咸阳至九原郡的大通道,即秦直道,从而带来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历史局面。

3. 白登之围——骄横汉王朝的羞辱

历史车轮告别了秦的时代,继而是楚汉相争。西楚年间,刘邦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经过坎坷的经历和浴血奋战,终于战胜了西楚霸王项羽,继而登上西汉王朝的宝座。就是这一位西汉王朝先驱的皇帝,面对匈奴的来侵,未对形势做彻底正确分析,贸然北击匈奴,不可一世的高祖刘邦却深陷匈奴人的包围圈,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生命危在旦夕。此时刘邦部下谋士陈平采用“金玉”政策,即重金贿赂单于阏氏,说服单于退兵,高祖

刘邦幸免于难。此时高祖刘邦才真正体验到匈奴人的实力,于是对匈奴政策改变,即采用和亲的方式以换取安邦的国策,从而带来西汉初期屈辱的和亲路。

4. 武帝伐匈——对“文景之治”的挥霍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群雄逐鹿,彼此征战消耗国力之际,匈奴人却在此时期发展壮大,至秦汉之际,匈奴人发展到鼎盛之际,所以有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慨叹,可以说高祖刘邦采用了和亲方式,实现了暂时的安邦之策,其实质是缓兵之计,以柔弱女子为代价换取短暂的边境安宁。高祖之后,文帝、景帝年间的“文景之治”,积累了大量财富,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待刘彻登基,即汉武帝,他看到国力财力成熟,于是发动了犹如秦朝时期的对匈政策,即大规模打击匈奴,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窦宪等抗匈名将。其实质是汉武帝对“文景之治”的财富挥霍,西汉抗击匈奴达二十二载,带来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即匈奴损失大半而汉室国力消耗殆尽。

三、民族融合的主旋律

从西周时期到西汉的漫长里,中原王朝与北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可以说是战事连连,边境的烽火与安宁交替伴随了历史时空。从历史文

献与传说看,对战争的记录和流传较多,对和平的记述较少。纵观西汉初年之前的历史,虽然民族战争伴随了大部分时段,但民族间的学习渗透仍是历史主旋律。从以上民族间战争分析,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这是一个积极的民族间学习的信号,仅此一举成就了一个王国的基业。

民族间的交往,在历史中从未停止过,游牧民族的战争和生活需要大量铁,所以冶铁技术在当时草原上是相当先进的,但炼铜技术,中原的殷商时期就掌握了炼铜术,所以北方游牧民族铜的需要是靠中原人以贸易形式供给的。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原与西域以及中亚、欧洲的商业之路、文化之路。只是养蚕术如何传到西域和欧洲的?在中国古代王朝,丝绸源源不断运往中亚与欧洲,同时传播着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但当时王朝对养蚕术的控制如同控制盐铁一样严格,传播丝绸绝不会传播养蚕术的,但养蚕术还是传到欧洲,如何传播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有学者将传播养蚕术锁定为两个人,即王昭君或文成公主,通过和亲和平使者身份,将养蚕术传到西域,继而传到中亚和欧洲,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可见封建王朝虽有铁桶般的控制,但依然还是控制不住民族交往与文化传播。

作者李志阳,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敬仲中学教师。

影像·读图



“青冢”石牌坊

位于呼和浩特昭君墓园区,1997年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建



昭君出塞与白羊城中的地位

■ 刘志尧

昭君出塞是两千年前汉匈两国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昭君经武州塞出塞路宿白羊城是有据可证的历史事实。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朔平府志》[右玉县]条载找到根据：“东古城，在县东南五十里，相传汉王昭君栖迟之迹。”东古城即汉代的武州城，是武州塞的中心。《山西通志》又载：“战国时，赵之武州塞也，汉为武州县，属雁门郡。”“汉元帝竟宁元年，因城毁坏，徙白羊城。”请注意，此竟宁元年，正好就是昭君出塞的年代。竟宁元年武州县徙白羊城后，白羊城即改称武州城。“武州川水出县西南山下，二源翼导，俱发一山，东北流，合成一川。北流经武州县故城西，王莽之桓州也。”如果从现在地图核对，所谓的武州城，若经西口古道，即在右玉城东南方向五十里，就是白羊城。

白羊城在历史上的存在，史载清楚。清光绪年间《左云县志》载：“左云，古白羊地，春秋而后北狄杂居。”《明史·地理志》亦说：“山西都指挥使司，本大同都卫，洪武四年(1371)置，治白羊城。”另外，从左云地界出土的明代武德将军张忠墓的墓志铭亦有涉及白羊城的铭文：“成化五年仲冬十九日甲时终，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宜人与将军合窆(音扁)白羊城西大柳树之源。”

白羊城，位于今左云县城东4公里的古城村北，十里河(《水经注》中称武州川水)南岸，为春秋时期北狄白羊部落修筑，是雁北最早修筑的古城之一，为

当时北狄白羊部落首领居住地和御敌指挥中心。

历史上左云的地界,洪涛山脉雄踞东南,武州川水横贯东西。武州川水的西北面是阴山余脉,以阴山为界,形成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自然交界之地。也许正是因为左云地理位置特殊,春秋时便在此修筑了白羊城。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不仅在此地置武州塞,而且又把此地当做武州塞的中心修筑了武州城(东古城)。如果走出武州塞再爬上阴山山脉,便是漠北或更远的大漠。所以说,昭君出塞栖迟白羊城是出塞的最后一站。

据传,昭君出塞和亲送亲队伍人马很多,又有呼韩邪单于迎亲队伍相伴而行,场面热闹而宏大,既显汉室的尊严大气,又表明呼韩邪单于迎亲仪式的隆重。当和亲队伍在早春来到白羊城后,当地官员和百姓举城欢迎,热闹非凡。然而就是城小了些,不能住宿这么多的和亲队伍,于是送亲侯王龙便决定搭毡帐过夜,毡帐搭满城内外。当时的白羊城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城墙已剥落废圯,城内街巷破旧不堪,最后还是昭君娘娘发了话,引起汉元帝的重视,重修了白羊城。

白羊城虽然修筑于春秋时期,但并未留下哪位部落首领的大名,而王昭君只因和亲出塞路宿白羊城,便最早留下她的尊贵称谓。同时,一曲昭君出塞词也使白羊城披上了时代的光彩。自此,白羊城虽小,但被历代皇室重视而当做历史纪念地保护利用,尤其北边多民族与汉族在此地的融合统一,有着民族团结非常象征性的教育意义。白羊城的荣耀无疑因王昭君的芳名而提高了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历史地位。

一、白羊城的历史军事地位

白羊城在昭君出塞之前,一直属于边城,既是抗击北边民族入侵的指挥中心和物资供应站,又是封疆大吏和众多将领守边的居所。然而,自从昭君和亲出塞后,便改变了这座城的历史性质,它成了和平的基地、和亲的纪念地、民族团结的象征地。一代代的朝廷对其加固修缮以便警示教育后

人,使得白羊城一次次地焕发出青春,并一直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后来,又经过北魏、唐、辽、金、元等时期,白羊城更成了国家的腹地,很少遭受战争的破坏。相比之下,修筑于战国时期的平城(大同)却没有白羊城幸运,似乎不被重视修缮保护,在白羊城面前相形见绌。到了明初,朱元璋对宣府和大同方向的边防建设十分重视,但平城废圯,而白羊城仍完好无缺。虽然大同镇被当成九边重镇,但军事指挥机构却设在白羊城,守边明朝大将也多住在这里。洪武四年(1371)正月,在白羊城置大同都卫,洪武八年(1375)十月又将大同都卫改称山西行都司,曾管辖26个卫所,所管辖地界北至今乌兰察布市中旗和商都,南至雁门关,东西横跨黄河与燕山之间。直到洪武二十六年,大同城修好后,才将山西行都司徒治大同。由此可见,所谓朝廷对白羊城的重视,是因王昭君曾住宿过的缘故,因而才有了它的军事地位。一度时期成为明朝北疆的军事与政治指挥中心。

二、白羊城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

自秦汉起,匈奴、氏、羌、东胡、乌桓、鲜卑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交错杂居,相互交往。与此同时,大量汉族也被迫或自愿进入大漠南北,直接变成那里的少数民族成员与之杂居。这些少数民族由杂居到相互吸收,后经隋唐长期交流通婚积淀,经济、文化、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同当地民族融合在一起,它们绝大多数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生活大杂居、小聚居的塞外各民族、在新的形势下不断进行着新的民族融合的跋涉。最终形成了“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今天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然而,在北方民族融合中,我们不能忽视王昭君的影响作用。

王昭君是和平使者,是被胡汉两族共同尊崇敬奉的和平女神。昭君和亲出塞,使边境安宁了半个多世纪。王昭君这个最完美的民族巾帼英雄,其实就是民族融合的典范和榜样形象。也许正是有

王昭君的身体力行，中国北边民族便常常向汉族伸出橄榄枝。我们可以想象，有许多名噪一时的北方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如东胡、匈奴、乌孙不存在了，乌桓、鲜卑、柔然、契丹不存在了，还有楼烦、突厥、吐谷浑等多数北方民族也不存在了。那么这些民族哪儿去了？应该说他们大部分都融合在汉族里了，也有的融合在了蒙古族或其他民族中。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不能说因一个昭君起了作用，但王昭君起码有和合垂范的榜样力量。而在北方民族与汉族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在这里，作为边塞的白羊城，成了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民族团结的历史剧目。北方民族认识了王昭君也就认识了白羊城，他们亲近了白羊城也就更尊崇王昭君。王昭君的人格魅力也就是民族融合团结的象征性力量。

三、白羊城在商贸流通中的地位

自古以来，胡汉交界地一直进行着边界贸易活动，西汉与匈奴和亲后，即通关市，这种关市后来唐朝称“绢马互市”，宋金元时期称“榷场贸易”，明朝称“茶马互市”等，这种在历史上对长城内外、内地与边疆、汉族与蒙族、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一直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胡汉贸易使得双方各求所需，互通有无。在此，白羊城作为边城，在边塞商贸流通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交易场所和媒介作用。

王昭君栖迟白羊城并经武州塞出塞，使得白羊城有了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人们向往和平，向往白羊城，白羊城便成了频繁贸易、众多物资交流的场所。

所谓白羊城边塞商贸流通与交易，代表农耕文明的汉族所需的是马、牛、羊和毛皮，而代表草原文明的游牧民族则需要茶叶、布匹、铁锅、针线和生活用具等。这种以物资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边贸活动便在边塞白羊城繁荣昌盛起来，从而使这里的胡汉人民变得富裕幸福，友谊加深。一旦汉民

族遭遇荒旱，年境不佳，草原就是汉民族兄弟奔赴求生之地。不过，草原民族竟也宽怀接纳，情同手足。有了这种交往习惯，后来的走西口就是这么形成的。汉族走西口也好，走大圈圃也好，从不认为那里会有生命威胁，反而觉得那里有好兄弟、好朋友，那里是求生的希望之地。在胡汉民族漫长的边贸交流过程中，白羊城不仅起着交流平台的作用，而且也起着边关塞口的作用，出入境都得由这里签证。

四、白羊城在传统民俗中的地位

在白羊城一带，谁都会知道，这里的人们有着自身的善良、诚挚、友谊、忠厚、勇敢、直率，这是当地传统民族的精华所在，但这种传统民俗不能不受昭君人格的影响。

当王昭君出塞和亲队伍还未来到白羊城之前，城里已传来王昭君和亲队伍住宿白羊城的消息。连年遭遇战争苦难的边城人民听后无不兴奋激动，家家户户腾房扫院备饭，准备迎接和亲队伍的到来。当王昭君和亲人马进入白羊城后，王昭君美丽动人仪态大方的形象与呼韩邪单于满足自信笑逐颜开的风度，再加上和亲队伍的华贵气势，深深打动了白羊城男女老少。这种欢庆的场面使白羊城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看到了胡汉和好民族团结的美好前景。个个无不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同时，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和亲队伍也被百姓欢乐的气氛所感染，他们对白羊城毕恭毕敬，以礼相待。激动之余王昭君还亲自走到百姓中间抚慰老弱病残，对此，白羊城百姓更为感激涕零，热泪盈眶。这种壮观的和亲场面给白羊城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在后来的时间里，口耳相传，一代影响着一代。再说边塞百姓的成分，本来就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北方各族的融合，来自大江南北的守边将士。这些成分复杂的人群杂居生活在一起，只能以亲切的态度、友善的面孔、质朴大方的性格、互帮互助的风格和睦相处，再加上王昭君高尚人格魅力的不断影响，便形成了边塞独特的传统

民俗风情。

五、白羊城的政治文化地位

一座城郭就是文化的容器。白羊城因王昭君的唱响而得以扬名,因王昭君的美丽而有了美誉;王昭君也因白羊城的深沉厚重而留下了昭君出塞的美丽乐章和千古绝唱。

历史上,白羊大地大多时间处于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胡汉民族和解和平便是政治,而这种具有和谐政治的角色便由白羊城扮演,从而使白羊城有了它的政治尊严。从这一角度上说,我们把白羊城看成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名副其实的。

白羊城自修筑起来后,多以战争冲突为军事目的,而唯独王昭君住宿后,便有了以和亲为内容的政治目的,这便是白羊城崇高的地位,这种崇高

的地位完全是由王昭君高尚品格引领促成。

当历史推进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白羊城虽遭千年风雨剥蚀已经有些苍老,但从那残垣断壁浓烈的信息符号中,传递透露出来的历史文化却令人惊羨。

左云地处长城一线,蕴藏着丰厚的边塞文化,而昭君文化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昭君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是中华民族最完美的女性代表,她被尊称为胡汉两族人民的“和平女神”。白羊城作为文化的容器,能容进昭君文化是这座城的骄傲,也是今日左云的骄傲。昭君文化是美丽动人伟大而光彩的文化,左云有昭君文化着色而显异彩纷呈。昭君文化是左云最具魅力、最有生命力的特色文化,因而唱响昭君就唱响了左云,传承了昭君文化便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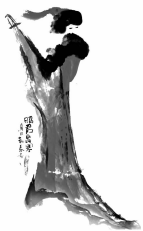
作者刘志尧,男,汉族,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左云文史》主编。

影像·读图



列女传图——昭君琵琶 明·九英

仇英列女传图四幅,依次为昭君琵琶、飞燕娇舞、西施戏瓢、薛涛戏笏



传记

Zhuan Ji

我与昭君

■ 乌日勒春香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后汉书》

这是正史里不足六百字的唯一记载，言简意赅地叙述了王昭君名垂千古、华光四射，集中国传统美德与民族团结精神于一身的高风亮节。她把自己的青春、才华、理想与身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胡汉两族的和平友好，为民族团结的大业谱写了一曲哀怨委婉、可歌可泣、惊天动地而又源远流长的壮丽诗篇！我的事业、我的理想、我的命运和我的追求也因主演大型歌舞剧《塞上昭君》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施花中冠，娇美属貂蝉。落雁昭君好，羞花杨玉环。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便是古代四大美女之誉。

从我记事那年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我会和她们的名字和名誉联系在一起。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典型的草原大漠中的一棵连凄风苦雨都懒得拂掠的小草。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出生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否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吸吮过母亲的乳汁。在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与我相伴的是一只乖巧温顺的奶山羊。饿了，我会走到它的身旁，渴了，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每当它看到我的时候，总是老老实实在地躺在草丛里，任我抚摸着它那圆鼓鼓的乳头，让我尽情地吸吮着小溪般的乳汁。当我吃饱了，喝足了，经常是躺在奶山羊的肚皮上甜甜地睡着了。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中，奶山羊就是我的亲人，是我的母亲，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长大一些了，一头奶牛又成为了我的伴侣和亲人。春风总是悄悄地来临，轻轻地拂走了厚厚的冰雪，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簇簇嫩绿的草丛。奶牛在我的吆喝与拍打下轻轻地摇动着尾巴，沿着潺

潺流淌的小河慢慢地踱着步子，仔细地寻找着令它心满意足的口粮。等它吃饱喝足了，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的时候，也就是我让甘甜的牛乳滋润干渴的喉咙和填充饥饿胃肠的幸福时刻。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第一个告诉的就是这头有些相依为命的奶牛，有什么不好活的事儿我也首先跑到它的身旁悄悄地诉说着。而此时的它总是静静地立在那里，眯缝着慈祥的眼睛聆听着我的喃喃自语……

我经常的梦想是走出大草原，瞅一瞅外面的世界哪个地方比草原更好。我最大的愿望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和风的吹拂下奔跑歌唱。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否精彩，每天准时挤着牛奶喝下去，个头渐渐地长高了，很快就可以跟着大人去放羊了。我也不清楚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只知道放养的羊群必须乖乖地听我的指挥，否则它们的命运只能由我来随心所欲地安排。

我刚一出生下来就寄养在大伯的家里，两位老人和两个堂兄对我很娇惯，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任性豪放的性格，七八岁的时候就敢一个人在草原上放羊。我喜欢大草原的春天和夏天，我更热爱大草原的秋天。天是那么的蓝，我的眼神儿想捕捉到一朵淡淡的白云都那么艰难。草又是那样的深，在一阵阵裹挟着丝丝凉意的秋风拂动下翻滚涌动着一望无际的浪花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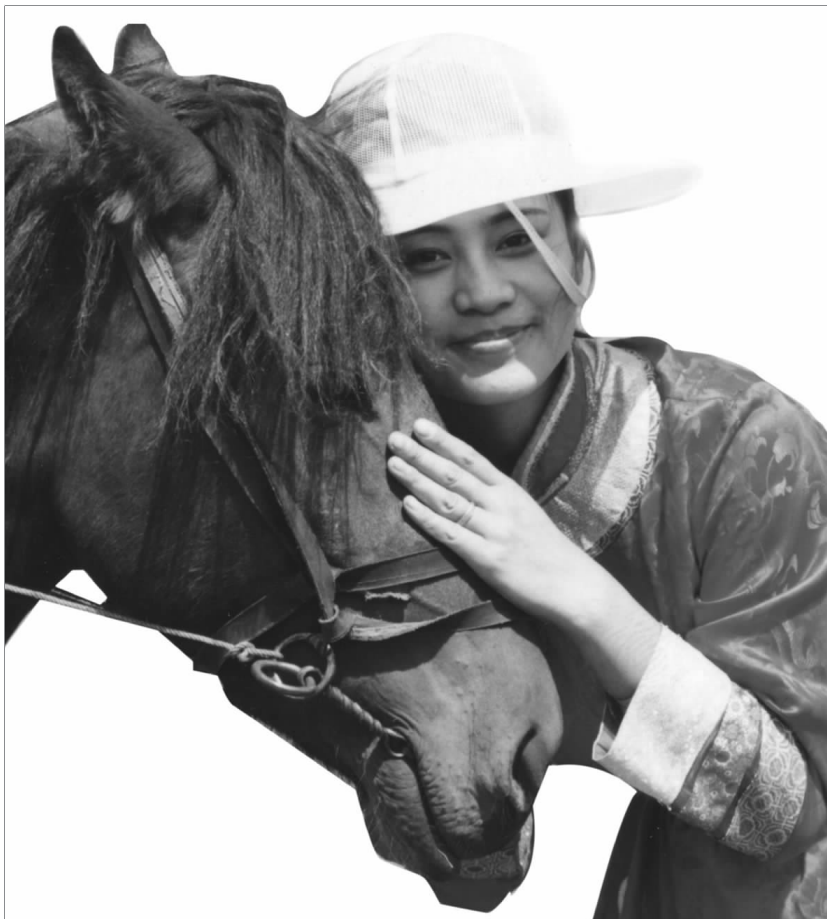
和草原上的大多数女孩儿一样，我非常喜欢夹杂在草丛里面的各色各样的花儿。无论它们在骄阳的烘烤下还是在夕阳的爱抚下总是那样的漂亮和美丽，散发着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等等奇光异彩。我时常为它们感到兴奋和激动，又无奈地为它们感到伤心和悲哀。当萧瑟的寒风无情地把它们碾碎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碎了……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既不怕鬼，也不怕狼。不但经常用麻绳套野兔子，还敢用猎枪打黄羊。如果哪一个堂兄欺负我了，我就提着木棒子追着打，非逼他向我求饶不可。有一次领头的公羊欺负我年小瘦弱，在黄昏的回家路上想着法子逃脱我的管

束,非要领着羊群往河边儿走,气得我两只小手一下子握住公羊长在两条腿之间的玩意儿,猛然把它提溜起来扔进了河里,从此它再也不敢和我捣乱了。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想唱歌,想跳舞,想要在比蒙古包还要大的舞台上发出狼一般的嚎叫,进行羊一般的蹦跳,展示马一般的腾飞,作鹰一样的盘旋!这种含苞待放的欲望,这种青春萌动的欲望,这种恨不得信马由缰风驰电掣追星摘月的欲望,驱使着我把草原作为舞台,把蓝天作为幕景,把羊群作为观众,在和风细雨的伴奏下,在凄凄芳草的簇拥中尽情地歌唱,忘我地奔跑,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自由自在的空间……

不知什么原因,相比同龄的女孩儿我成熟得比较晚。但是我非常喜欢学习,喜欢坐在简陋的教室里认真地听老师讲课,每天都及时地做完作业,然后在放羊之余读一些我喜欢的各种读物,尤其是喜欢读一些人物传记。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活得都比我有出息,也比我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同学们都可以围坐在爸爸和妈妈的身旁有说有笑,而我却在大伯和大妈怜悯与爱抚的目光下默默地喝着奶茶。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狼的嚎叫,深沉、粗犷、悠扬、苍凉而又历经沧桑。然而命运偏偏要我发出鸟一般的鸣叫和圆润的让人们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到处去搜寻的嗓音。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被当年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化局艺术科长的白文其老师、艺术学校的杨明增和温万老师在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大草原东胜地区选中了。

初选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压力,几位老师又非常和蔼可亲,我很轻松地就过了第一关。可是在最后审定的时候我却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突然涌上了心头,比我突然在草原上遇到了狼群还可怕。尽管那个时候我还属于不谙世事的时期,但是懵懵懂懂之中还是清楚我要想顺利地过去最后一关

起码要和三位审评老师当中的一位熟悉。据我所知,在最后审评的几个学生里,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多多少少和老师们都有一些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还是太单纯、太幼稚,在最后关头扁桃体突然发炎,肿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我走进考场见到几位老师的时候几乎已经完全绝望了。

有人当场就提出我根本就不符合条件,不能录取,但是却遭到了三位老师的坚决反对。白文其和杨明增老师甚至拍着胸脯为我担保:初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她的条件很好,我们敢保证将来她一定会错不了!

命运的青睞让我走进了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的大门,开始了

我全新的艺术生涯。我觉得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怜悯、眷顾和厚爱，绝不能失去这个也许会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练功房。练完了舞蹈班的课程我就接着练戏曲班的课程，大跳、旋转、飞脚旋子、前滚后翻等形体动作练完了，练累了，我就练习唱歌，弹琴。我知道，艺不压人，只要把该学的东西学到手了，早晚都会用得上。每到周末，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相拥回家了，我就一个人留在学校里练功，打扫卫生。把宿舍打扫完了，我就打扫教室。教室清理干净了，我就把练功房和教学楼的走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我已经习惯了寂寞，习惯了孤独，习惯了默默地做着我所喜欢做的事情。

艺术学校严格规定，在校学生不许谈恋爱，否则就要被开除学籍。我把这条规定作为法典，甚至可以说是圣旨，决不和任何男同学来往，甚至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有时候看到个别同学因为恋爱被迫离开了学校，我真的深深地为他们感到惋惜。

就在我十九岁那年，突然听说了一个人的名字：王昭君。在一个说不出是朝霞满天还是风和日丽的上午，那么多人呼啦啦地走进了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的大门，说是要寻找一个主演王昭君的女演员。毫无疑问，这个人与我无关，我不仅不认识她，而且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我继续压我的腿，亮我的嗓子，时不时擦一擦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保护措施的极具蒙古人特色的让人看起来还算是不太讨厌的脸蛋儿。

那天早晨我喝了一大饭盒大米粥，肚子里感觉到有一些撑得慌，又有一丝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居然想起了家乡那头与我相伴多年的奶牛，若有所思地瞧着窗外绿油油的树丛，回想着小时候冷了就伏在奶牛的肚皮上取暖，热了，就躲在它的肚皮下面乘凉。无论是渴了还是饿了，我随时都可以拿一个小木碗轻轻地挤压着牛奶。每到这种时候，可爱的奶牛总是眯缝着眼睛慈祥地看着我把满满的一小木碗鲜奶灌进肚子里，我也总是要抓几把草料放在它的嘴边儿。一直到我要上学了，也不知

道世界上除了牛羊和奶茶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大米的食物。

在我刚满八岁的时候，一年也顾不上看我几回的父亲来到了大伯家，说是我的老家在山西，要带我回去，我坚决不答应。在我的心里，鄂尔多斯的大草原就是我的家，大伯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亲人除了大伯一家四口之外，还有奶牛、羊群和那条经常跟着我去放羊抓兔子的大黄狗。

在大伯和大妈的再三劝说下，我终于还是含着热泪跟着父亲回到了山西一座县城郊区的奶奶家，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大米粥。记得那天晚上我吃完饭躺下以后，隔壁屋子里的大人们吵得很厉害。由于他们说的都是当地的方言，我竖着耳朵听了半天，一句话也没有听懂。有一天，和我有一些熟悉起来的姐姐瞪着天真的大眼睛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你不是我们家的人，你是蒙古人，大人们都为你吵了好几年了。快滚吧……

一股热血猛然涌到我的头顶，还不等姐姐说完，我便抓起身边的一件东西狠狠地向她打去。在姐姐的哭喊声中，我顺手抓起放在灶台上的几根红薯和一小捆胡萝卜冲出了屋门。

深秋的山西郊区，天是灰蒙蒙的天，地是泥泞的地，连狗看上去也好像草原的羊羔子一样，见到人远远地就躲到了一边儿。我一路流着眼泪，一路打听道路。直到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找到火车站，孤零零地站在荒郊野地里号啕大哭起来。

我没有喊妈妈，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也没有喊爸爸，他经常让我忘记长得是什么样子了。虽然我有一些害怕，但是并没有感到恐惧。我是在想大草原了，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要回到那里去，我必须回到那里去！

想到这里，我用衣袖使劲儿地擦干了眼泪，四处搜寻着可以栖身的地方。望着惨淡的月光，我依稀看到远处有一个看园子的小窝棚。我顺着凸凹不平的田埂走过去一看，这是一个用谷草搭建的窝棚，里面黑糊糊地看不清楚有什么东西。我不敢钻进去睡觉，就在窝棚的外面扒拉了一个草窝蜷缩在了里面。从衣兜里摸出一根儿胡萝卜在衣襟

上擦了擦,慢慢地咀嚼着,心里就像被兔子抓了一样地难过。

我又开始想念大草原、想念大伯的家了,想奶牛,想羊群,想大黄狗,想在大草原上自由地奔跑、任意地呼喊,伴随着天上翱翔的雄鹰起舞,遥望着奔腾的马群歌唱。

也许是太累了,我一会儿就睡着了,做了一连串的梦。先是梦见我在骑马,是一匹枣红色的蒙古小矮马。我手里握着的居然是放羊的鞭子,不停地挥舞着跑进了草原深处,看到了一座好大好大的蒙古包。我赶紧跳下马来,拾了一筐干牛粪填进了蒙古包的灶坑里,又烧上了一大壶奶茶。不一会儿的工夫,大铜壶就发出了“吱吱”的鸣叫声,我刚拿过一只木碗想往里面倒奶茶,一条土黄色的草原狼突然蹿了出来,吓得我急忙扔掉了木碗哭喊起来……

我被吓醒了,揉了揉眼睛爬起来一看,月牙儿孤零零地挂在天边儿闪烁着清冷的银光,很像我经常用来切牛羊肉的蒙古刀。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兜,掏出一根儿生地瓜来,一边啃着一边往大路上走去。

也许是就要回到大草原的原因,我的心情慢慢地好了起来,在不断的询问中很快就找到了火车站,随着人群进了候车大厅,自知身无分文,一边寻找着检票口,一边琢磨着混进火车站台的办法。

突然间,我看到有一家穿着蒙古族服装的大人带着几个孩子在检票口排队检票,我赶紧钻进他们的中间,半蹲着跟随他们通过了检票口,飞快地跑上了火车,在硬座车厢里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当火车一声长鸣,慢慢地驶出车站的时候,我对着灰蒙蒙的天空暗暗地发誓:今后我宁肯被野

狼吃掉,也绝不再离开内蒙古大草原了!

二

也许是因为我的勤学苦练,也许是因为我的声音天赋更好一些,学校把我从戏剧班调到了舞蹈班、声乐班,我的身影也随之进入了大型歌舞剧《塞上昭君》编导人员的视线。

这是一个浩大的文化艺术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当有关领导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惊喜。剧中的一号人物王昭君在全国范围内一共筛选出五个扮演者,我是排在第四位。但是我对剧中的主人公王昭君却颇感兴趣。王昭君的家境和我略有些相似。她出生在南郡秭归县宝坪村,今天的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她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几亩薄田,偶尔帮人拉纤或者是干一些杂活儿赚点儿小钱养家糊口,倒也是逍遥自在,怡然自得。

她的名字叫王嫱,字昭君,小名儿皓月。父亲王穰老年得女,视其为掌上明珠。再加上哥哥对她的百般呵护,小皓月虽然是出身为农家素女,却也是衣食无忧,修成一副大家闺秀风范。肯定不会是像我小时候那样,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瘦弱不堪的,模样不说,还生就了一副倔强的脾气和桀骜不驯的性格。

汉元帝元年,皇帝举国海选美女,南郡地方政府首推王昭君。那一年她才十六岁,却已经是闻名遐迩、美貌惊艳的窈窕淑女了。

我被选入王昭君剧组之后依然故我,每天刻苦练功,先形体,后嗓音,再语言。五个昭君候选演



员,前四个条件都比我优越。对于能否选得上主演我并不抱有什么奢望,心想趁机多学习点东西那才是正路。再加之我对传奇人物的传记本来就感兴趣,所以当别人都在逛街或者是闲聊的时候,我经常是一个人专注地阅读着王昭君的有关历史资料和传说故事。

公元前36年仲春,王昭君没有像她的老乡屈原那样饮恨投江,而是在伤心中带有一丝好奇与憧憬,登上了龙凤官船,顺香溪,入长江,逆汉水,过秦岭,煎熬了三个多月,总算是于当年的夏天抵达首都长安,被安排在掖庭待诏。

歌舞剧《塞上昭君》很快就进入了排练阶段。五个昭君每人排演一场。我突然发现这哪里是在拍戏,简直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无情厮杀。各路角色台上台下幕前幕后各显其才各展其能,看得我是心惊肉跳却又觉得有些好玩儿。

汉元帝考查美人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通过专门画师所画的头像一一进行选择。当年宫内的主笔画师名字叫做毛延寿。此人其貌不扬,女色他不敢沾,钱财他绝对敢要。凡是进入宫内的秀女哪个不想尽早被元帝召见宠幸?只要是家庭条件好一些的都想办法贿赂毛延寿。家庭条件不好的也求亲靠友地东挪西借进行打点。毛延寿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我得到了你的好处,还是尽力为你画得好一些。至于最终是否被皇帝召见,那就要看每一个人的造化了。

王昭君虽然是一个南方人,荆山楚水却铸就了她一副草原人的性格:我本来就长得美貌绝伦,凭什么要给你送礼?就不送!毛延寿也不含糊:你不是牛吗?我就给你来个画风点痣,长毫轻掠一点黑,王昭君丧夫相便跃然纸上。汉元帝略瞟一眼便扔到一旁,这一扔就把王昭君扔进后宫长达五年之久。

《塞上昭君》剧组排练快一年了,该剧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文化局局长云才小、副局长杜遼几乎把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投放在剧组里,请了许多在国内外颇有名气的专家学者进行考证和指导。五位候选演员走马灯似的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来审查的各路官员,给我的感觉是比当年选王

昭君进宫还要难上几分,可是究竟哪一位演员作为一号主演仍未最后定论。

那时候,别说是王昭君的扮演者了,就连小王子的扮演者也选择了三位。主要演职人员都有一些着急了,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找领导,想方设法拉拢剧组的主要成员,而只有我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以外,只是一门心思地练功。我当时想得很简单,也很现实:我是一名艺术学校的学生,在这里有吃的有喝的不说,还有那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各路老师,一定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基本功扎实、表演水平出众的好学生。

除了苦练基本功以外,我和其他的演员一样读资料,背台词,熟悉剧中人物,理解剧情的发展,掌握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等基本要素和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演员对剧中人物的理解程度和表现方式也都展示了出来,事情已经初露端倪:众人的目光渐渐地集中到了我和另一位来自于高等学府的演员身上。

我依然故我,我行我素。绝不向任何领导靠拢,也不向哪一个创编人员献媚。有一天中午刚刚排练完毕,我正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执行导演偷偷地溜了进来连个招呼都不打,扑上来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我猛然把他甩开,愤怒地盯着他那张丑恶嘴脸,毫不犹豫地抡起胳膊使劲儿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转身冲了出去……

三

公元前33年,北方的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为了结束多年的战乱对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自然高兴不已,不仅马上应允,而且命后宫挑选出五名宫女来供单于进行选择。

消息传到后宫之后,幽禁已久的宫女们个个欢呼雀跃,兴奋不已,纷纷请求出官。可是当听说要嫁到遥远的北方大漠时,一个个又互相推诿,尽力逃避。只有王昭君慨然应允,主动请缨,落落大方地提出愿意嫁给单于,以修两族永久之谊。



当时我们排演《塞上昭君》歌舞剧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口号：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献礼，迎接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

由于离要求的时间还有一年半，所以各级政府部门与相关组织均加快了工作速度。一号人物昭君的主要扮演者的竞争也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与其他几位演员相比，我在某些单项方面都有一些差距。但从舞蹈动作、戏剧功底、演员扮相、综合表演程式等整合态势来看，我的条件明显地优于其他人。

一天中午，在舞台的通道上与那位挨了我一记耳光的执行导演狭路相逢了。他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告诉你！想跟我作对？我叫你寸步难行！我蔑视地瞧着他那张丑恶的嘴脸回敬道：尊敬的老师，我只是艺术学校的一个学生，在不在你们团待着还不一定。即便是我留在你们团了，这里也不是你的天下，你更不可能一手遮天！说罢我便扬长而去。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潜规则，也不惧怕让不让我担当主演什么的。草原上生、草原上长的女孩儿连狼都不放在眼里，还在乎你一个流氓导演？

当年的王昭君明知道塞外山高水险，路途遥远，但是她为了民族的大业，为了边陲的永久和平，在汉元帝的主持下与年迈的单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尽管当汉元帝看到美貌绝伦的王昭君时曾为之心动，起过悔婚的念头，但是为了和谐与平安的大事，最后他还是放弃了私念，履约为王昭君送行。

长风浩荡万里行，一路悲歌一路情。昭君出塞名千古，我辈何计怕欺凌？

对于执行导演的猖狂挑衅我忍辱负重，一个人默默地把这些埋藏在心里。我把全部的精力与心思用在认真排练、苦学基本功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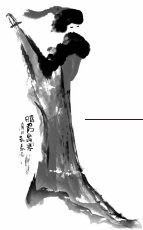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演练，王昭君的主演基本确定在我和另外一名演员身上。以执行导演为主要力量的一派坚决反对我登台，甚至连排练和在主要场合露脸的机会都不给我。以文化局云才小和杜远为首的少数派力挺我做主演。就在两派力量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当时主管文化的巴图副市长指着我一锤定音：就是她了，小昭君，主演王昭君！

带着许多的问号和设想，我经常翻阅着手里有限的相关资料。有一天我排练结束回到宿舍一看，所有的资料都不见了。紧接着，我的艺校老师王秀英为了我节省时间，个人出钱给我买的名牌飞鸽自行车也不翼而飞了。

在排练的关键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不该发生的事情令我们剧组的主要负责人震怒了。他首先组织召开了全剧组所有人员参加的会议并明确指出：她就是我们各路专家和各级领导认定的小昭君，要全力以赴地保护和保证她的排练与演出。任何人敢对她有任何阻挠与捣乱行为我坚决拿他是问！

同时，有关领导为我调整了宿舍，安排了于红老师对我进行专门辅导，又把我派到武汉歌舞剧院进行专业训练。

作者乌日勒春香，女，蒙古族，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国际经典书画院内蒙古分院院长、中国太山书画院院长、昭君书画院院长。



诗歌

Zi Ge

昭君颂

克冰

锦绣河山烽烟频起边骚动，
南征北讨生灵涂炭草木腥，
千里疆场金戈铁马谁平定？
千娇百媚和亲自请龙颜惊！
施粉黛，着裘裙，
泪洒琵琶离掖庭，
不恨汉王长相弃，
但愿单于有真情，
诚相待，结同心，
胡汉一家乐融融。

黄沙漫漫荒草茫茫迷路径，
暮空低垂残阳如血孤雁鸣，
前程遥遥山重水复投何处？
翠袖红颜安邦拯民胜英雄！
扶银鞍，踏金镫，
回望长安出长城，
不惧风寒袭玉骨，
只为天下共靖宁。
青冢在，魂永存，
神州尽唱昭君颂。

【作者克冰，男，汉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观电视剧《王昭君》

刘立

一

一人化雨火熄燃，奉献边关静睦还。
落雁花容笼鸟禁，冷宫苦味蜡石煎。
画媵凰丽囚途尽，闪靛原苍展翅斓。
贿赂决绝失帝宠，天成英女万年传。

二

笃行远嫁自由生，勇弃虚名智慧赢。
争宠娇容发暗箭，离宫秀女奔明程。
宁抛皇厦痴心梦，甘献荒原赤胆情。
青冢何因多数座，和平热盼信鸽恒。

【作者刘立，女，汉族，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干部。】

昭君村怀古(诗三首)

项小琼

一

汉家安危一肩挑，
村野生长女英豪。
娥眉凜然画工怨，
芳姿珍重帝魂销。
琴台冰弦音尚绕，
溪镜倒影面犹娇。

古宅胜迹千秋在，
岚山画廊映碧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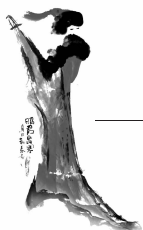
二

白玉雕像亭亭立，
苑林紫竹竿竿幽。
香妃已随流水去，
玉颜永驻梳妆楼。

三

越罢凌溪琵琶桥，
浣纱石畔忆风标。
娇小倾城忧天下，
甘泉至今香尚飘。

【作者项晓琼，女，汉族，湖北省兴山县昭君镇香溪社区残协协理员。】



散文

San Wen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闲话昭君出塞

■ 万奇

前不久，友人王占荣先生告知，昭君文化研究会创办的新刊《昭君文化》由他任主编，约我为该刊的创刊号写一篇有关昭君的稿子，长短不限，二月下旬交稿。写不写？笔者颇为踌躇。研究昭君的文章、著作实在太多了，而我对昭君颇为生疏，没有下过案头的功夫，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不写，又觉得对不起友人的盛情雅意。王占荣先生是我区资深的出版家和著名的爱书人。他待人诚恳、热心，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编辑修养，对我的帮助是不能用一个简单“谢”字了得。于是援牍操觚，写了这篇难登大雅之堂的闲话文字，或许见笑于各位看官了。

昭君：名乎？字乎

按班固《汉书》的说法，昭君姓王，名嫱（牆），昭君是她的字。范晔《后汉书》则持相反的看法：“昭君字嫱。”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赞同祁和辉《王昭君名氏异说》一文的主张。祁和辉认为，昭君除了姓王可以肯定

外，其他的所谓名和字只是标明某种特征以明身份的符号。昭君初入宫中，并无封号，仅“待诏掖庭”。《汉书》第一次称王昭君为“王樯”，可能是与其被选入宫的某种特征有关。《玉篇》曰：“船樯，帆柱也。本作樯。”“樯”可以引申为帆船。即昭君是一位乘船而来的王姓姑娘。《汉书》后又称她为“王牆”，樯与牆同音假借。《汉书》这种前后用字不一的情况，说明这两个字都不是昭君的真实名字，而只是一个记音符号。《后汉书》则把“王樯”、“王牆”均改为“王嬙”。嬙，是古代宫廷的女官名。范晔或许认为，昭君赐嫁单于，当已具官中女官的资格，故改“樯”、“牆”为“嬙”。后因昭君是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又取其女性特征，便逐渐淘汰了“王樯”、“王牆”的称呼，代之以“王嬙”。

祁和辉又指出，昭君之称很有可能是封号而非字号。《汉书》和《后汉书》记载的矛盾就表明了这一点。当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婿时，汉皇理应以后官未受封号的处女加封号为赐，如已受封为汉官女官，从名分上说已属于汉皇的妻属，在外交上是不宜赐给匈奴单于为妻的。为表示对和亲的重视，又必须使和亲官女有一定身份。在昭君出塞之前，汉元帝必须选择适当的封号给予封赠。昭君不是皇室支系，不能封为公主，于是就只能根据她具有“光明汉官”的美丽和代表汉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赐封她为“昭君”了。

先秦有封号曰“君”，如孟尝君、春申君。后又以“君”号封赠妇人。西汉本有赐封女子为“君”的惯例。如汉武帝封其同母异姓大姊为“修成君”便是一例。《说文》谓：“昭，日明也。”“昭君”即有汉皇光照匈奴的意味。她不仅有惊人的美貌，而且负有替汉皇传播光明、和番宁胡的重大使命。“昭君”与“宁胡”都是政治含义丰富的称号，是双方君王对“和番”能取得良好政治结果的祝愿。汉元帝还因此事改元为“竟宁”，同样透露了这一愿望。

又有论者指出，《汉书》九次讲到昭君，有两处称“王樯（牆）”，都是在汉官时；有七处称“昭君”，皆在出塞后。笔者以为，这或许可从另一面证明昭君是封号。

由此可见，昭君除姓王可以确定外，她的真实名、字均属不详，且难以考证。后世习称“昭君”很可能是因其政治封号而非名、字。

此外，晋人为避“文帝讳”（司马昭），改昭君为“明君”；又因昭君系匈奴单于之妃，故敬称她为“明妃”。

昭君的体貌：丰容靓饰，光明汉宫

据史书载，昭君是以“良家子”的身份入选汉宫的。汉代的“良家子”是“指有一定资产，不在商贾、医、巫、百工之列，没有家族犯罪史，能遵循伦理道德，品行端正的人家。”（宋艳萍《汉代“良家子”考》）汉代选秀的时间一般是在八月，“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的良家女子，只要“姿色端丽”，“合法相者”，即可选入后宫。至于能否被宠幸，那要看皇帝的喜好。昭君能被选入后宫，显然符合汉代选秀的条件，而且貌美惊人：“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后世把昭君与西施、貂蝉、杨贵妃并称我国古代四大美女。由此催生了“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的成语。

“闭月”指貂蝉。貂蝉，并州九原人，是三国时汉献帝的大臣司徒王允的歌妓。那时董卓专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王允不悦。貂蝉为替主人分忧，在后花园拜月。忽然一阵轻风吹过，浮云遮住皓月。此景正好为王允看见，事后逢人便说，貂蝉和明月比美，月亮比不过，就躲在云彩后面了。从此，貂蝉就被称为“闭月”。

“羞花”指杨贵妃。杨贵妃，名玉环，字太真，蒲州永乐人。天宝四年（745）入宫，深得唐玄宗宠幸，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刚入宫时，十分思念家乡。一日，她与众官女游园赏花，看到满园盛开的鲜花，不胜感慨，叹自己在宫内青春虚度，不知何时出头。无意中她碰到了含羞草，含羞草花瓣收缩，叶子也卷起来。众官女都说，杨玉环的美貌令花草自惭形愧，羞得抬不起头来。“羞花”之名由是而来。

“沉鱼”指西施。西施，又称西子，原名施夷光，

春秋越国人。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为复国，卧薪尝胆，献西施于吴王夫差。西施不辱使命，迷惑吴王，使之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终于助越王兴越灭吴。其实西施本是浣纱女，一次在河边浣纱，河水映照她俏丽的身影，使之更加妩媚动人。鱼儿被她的身影深深吸引，忘记了游水，渐渐沉入了河底。西施的“沉鱼”之称便在附近流传开来。

“落雁”指昭君。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自言愿为汉婿，汉元帝以昭君赐单于。在去漠北的路上，坐在马背上的昭君，心绪难以平复，手执琵琶，弹起了悲凉凄婉之曲。南飞的北雁听到琴声，看见了“丰容靓饰”的昭君，竟然忘了摆动翅膀，落在地上。于是昭君就有了“落雁”的美称。至匈奴后，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

上述四个美丽的传说故事，表明了民间对美的热爱和追求。而史书对昭君的体貌则语焉不详。如果参照汉代选秀“姿色端丽”的标准，大致可以勾勒出昭君的体貌特征：面容端庄、丰丽，肤色白皙，身材颀长，具有庄重、柔婉之美。

昭君和亲：是赐，还是自请

和亲，又称“和蕃”，是指中原皇帝将自己或宗室的女儿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给地位较低的“番邦”君主，以示两国友好，是一种政治婚姻。

汉初国力弱，匈奴强，汉高帝不得已用和亲之策，以换来边境的安宁。据《史记》载，“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高帝采纳刘敬的对策，便有了第一次和亲。原本是遣长公主（鲁元公主），因吕后“日夜泣”，只好“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之后“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这是汉朝的第二次和亲。而昭君和亲与汉初和亲有很大的不同。此时汉朝国力强，匈奴发生内讧，国力渐衰。呼韩邪单于在与郅支单于中争斗失败，被迫出走。公元前51年，呼韩

邪南下投汉，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和平的关系。公元前36年，郅支单于为汉西域副校尉陈汤所杀。是时呼韩邪闻郅支已死，且喜且惧。喜的是政敌已亡，没有后患；惧的是汉朝强大，自身孤弱，担心会被消灭。这种局势促使呼韩邪进一步倒向汉朝。为了密切匈汉关系，保证自己政权的继续存在，呼韩邪亲赴汉都长安觐见汉元帝，并“自言婿汉氏以自亲”（师古曰：言欲取汉女，而身为汉家婿），汉元帝为了汉匈的友好关系和边境的安宁，消除呼韩邪的政治疑虑，便同意了他的要求，“以后官良家子……昭君赐单于”。不难看出，昭君和亲为汉元帝所“赐”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后汉书》说昭君和亲是她自请的结果，也不无道理：“入官后，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然就汉元帝、呼韩邪和昭君三者之间的关系看，是时汉朝国力强盛，汉元帝处于强势地位；呼韩邪因其国势趋弱而有求于汉，处于次强势地位；昭君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处于弱势地位。也就是说，昭君和亲是为当时汉匈统治者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不可能以昭君个人意志为转移（不论昭君个人愿意，还是不愿意）。汉元帝把年号改为“竟宁”（汉代“竟”即“境”，意谓“边境安宁”），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都说明汉匈之间的关系高于昭君的个人意愿。后来呼韩邪单于死后的情况似乎也表明这一点：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汉成帝不允，“令从胡俗，遂复为单于阏氏焉”。可见，不是昭君想出塞就能出塞，想归汉就能归汉的。

从呼韩邪归附汉朝到昭君出塞，此后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太平盛世。昭君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匈和平友好关系。包头市召湾出土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的瓦当，呼和浩特市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的鸳鸯砖，均可见证昭君和亲的影响。昭君到匈奴后，给塞外带来中原文明，洒下了和平的种子，深受爱戴。那么多昭君故事流传至今，说明昭君“和平使者”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有些研究者过度强调“昭君自请和亲”，有意或无意夸大了昭君个人的作用，没有做到“了解之同情”，对历史缺少应有的“温情与敬意”。他们混淆了昭君出塞的个人动机(meaning)与和亲事件本身的客观意义(significance)，甚至把昭君和亲看成是汉匈友好和平的唯一原因。这种看法似有违当时的历史状况。鲁迅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的观点如暮鼓晨钟，至今仍在耳边萦绕，值得昭君研究者深思。

历史研究有不同的模式，考史、论史、写史皆可。然最忌“以今律古”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这种“用史”既无助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又无助于解释现实。历史研究可以“想象古人的心灵活动”(科林伍德语)，但必要、可靠的证据是确定历史想象合理性的基础。

昭君的艺术形象书写： 哀怨？欢喜

昭君的艺术形象书写是以其历史形象为基础的。《后汉书》的“入宫后，数岁不得见御”给昭君形象涂抹了浓郁的“哀怨”色彩。

可永雪、余国钦编纂的《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收录、汇集历代有关昭君题材的诗、词、散曲、变文、戏曲、小说、散文、鼓词、民歌、乐曲以及故事传说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其中以“昭君怨”(含“明妃怨”)为题的诗就有九十四首，词有九首，乐曲有九首。据考，“昭君怨”是琴曲名，收入《琴操》作“怨旷思惟歌”。词牌“昭君怨”即取名本琴曲。看来，“昭君怨”已成为多数古代文人的共识。

西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塑造了一位“哀怨”的昭君形象：“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决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

五内，泣泪沾朱纓。……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昭君的“还悲远嫁人”的悲怨之声，叙之于纸。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有《画工弃市》一篇，解释昭君不得宠幸的原因。据此篇所述，汉元帝后宫佳丽甚多，不能一一亲见。便请画师画像，汉元帝按画像召幸。宫女便贿赂画师，多则十万，少则也不减五万。独昭君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单于入朝，想求汉朝美人做阏氏。汉元帝按图，以昭君行。临行召见，才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汉元帝悔之已晚。事后宫中所有的画师皆弃市，其中有善于画人像的毛延寿。从此，毛延寿频频出现在与昭君有关的作品中，成为昭君的又一怨。

唐代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以同情的笔调抒写了昭君之怨：“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值得注意的是，杜甫除了写昭君“一去”、“独留”的远嫁之怨，还写了昭君对汉元帝仅凭画图观人的失察之怨：“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在杜甫看来，昭君之怨是汉元帝造成的，而不是画工毛延寿。

宋代王安石《明妃曲》则发挥了杜甫的看法：“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昭君的风神情韵是画不出来的，毛延寿被杀是冤枉的。不但如此，王安石还提出了“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惊人新见。王安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超越汉胡族群的界限，以昭君“欢喜”代替了昭君“哀怨”，把咏昭君诗作提升到新层次和新境界。

元代马致远《汉宫秋》则以《王昭君变文》为基础，吸收笔记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有关素材，重新编织情节和塑造形象。《汉宫秋》的昭君不再是满怀哀怨的弱女子，而是深明大义、勇于担当的烈女：匈奴逼亲，昭君毅然决然离开汉官，出使匈奴，行至汉匈交界处，投江而亡。昭君的刚烈之举，令人感佩。

借古讽今一向是中国文人的写作传统。男性作者往往置换为作品中的女性，借表达对情郎的

思恋来暗示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写法,自屈原以下,绵延不绝。后世文人咏昭君亦然。他们不单单是怀古,更多的是借昭君来自况和抒发对当时时政的不满。或感叹怀才不遇,或指斥奸佞小人,或批评君王无能。那么多的作品渲染昭君的哀怨,正在于此。独有王安石另辟蹊径,写昭君之喜,显示了不凡的见识。

在笔者看来,昭君的艺术形象是矛盾、复杂的。她亦怨亦喜,悲欣交集。怨的是不得宠幸,远嫁思乡;喜的是单于知心,胡恩自深。昭君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郭沫若的话剧《王昭君》是沿着马致远《汉宫秋》的路子走下来的,刻意突出昭君的悲壮;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是遵周公所嘱,按照王安石《明妃曲》的调子写出来的,着力表现昭君的欢喜。两剧的昭君形象虽有悲喜不同,但都趋于扁平,似乎不够丰满。

毋庸置疑,昭君出塞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今在

塞外青城早已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昭君文化。一批分量较重的昭君文化成果纷至沓来:有“昭君文化丛书”(含《昭君文化研究》、《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昭君论文选》和《昭君图册》五册),有长篇小说《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共三卷),有《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集·评注》,有《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还有《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昭君文化研究正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拓展。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昭君早已随风飘逝,留下的只有斜阳里的青冢。昭君之称是名,是字,还是号?出塞是赐,还是自请,是哀怨,还是欢喜?种种论争,此时都显得不重要了。唯有昭君手执琵琶、身披一袭猩红斗篷的端丽汉家女形象深深印在笔者的心中,无法抹去。

作者万奇,男,汉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内蒙古写作学会会长。

昭君,流淌在香溪的永远记忆

吴绪久

长江三峡中有一条美丽的支流,名为香溪河。沿香溪河上行,不远处即是享誉天下的兴山县宝坪村了。那儿出了一位落雁般的美人王昭君。两千多年前,她就是从这里走出,走进了汉宫,然后嫁给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从此,汉朝和匈奴数十年相安而治,共生互荣。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和亲佳话。我们的董必武副主席曾写诗赞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

懣,舞文弄墨总徒劳。”现在,人们更是亲切地称王昭君为“东方和平天使”了。

王昭君虽然远离了她的家乡宝坪,但清澈的香溪却永远流淌着那份珍贵的记忆。现在,在宝坪的山上有一个汉式的院宅,那便是王昭君的故里。满山上橘树簇拥,春天盛开的橘花有如繁星点点,煞是爱人;秋天,橘黄橙绿,诱人心馋。院内,翠竹婆娑,蝉鸣鸟唱,似乎在歌咏王昭君那美丽的情

怀,那清纯的心灵。一走进院宅大门,一尊王昭君的汉白玉塑像便会让你驻足而立,凭栏而敬。那是内蒙古人民政府赠送给兴山县的,是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敬之情。那晶莹洁白的质地,那含颦微笑的秀眉,似乎在诉说着那难以忘却的故事,是在倾心聆听着安祥的溪水淌流,更是在憧憬着那一页页异常美好的明天。凡是游人来到这里,没有不在这儿合影的。我知道,大家爱慕的不仅仅是昭君姑娘的美丽,更是爱慕着她那超乎常人的情怀。

在昭君宅前,有一个去处,那是游人常常流连的地方。这就是昭君姑娘的梳妆台。一方石桌,四尊石凳;松柏送绿,杜鹃映红。清晨起来,薄雾轻纱,昭君姑娘便面对香溪,纤理云鬓。据说是观音仙子托梦给她,并送给她一面宝镜,嘱她在日月的光照中梳妆。于是,天地赋予她高洁的志向,自然赋予她秀美的身姿,父老乡亲育出她勤劳善良的品质……现在,莫说女人,就是大男人都会在这儿端坐几许,品味着昭君姑娘当年梳妆时的倩影,去触摸历史上那些最珍贵的岁月。前些日子,我曾陪来自大漠远方的几位学者造访,别说,都是些年过花甲的男人,来在这梳妆台处,也如焕发了童心般的喜悦,坐一坐石凳,摸一摸石桌,竟也高声颂起了杜甫的名句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也乘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长晓塞边生好绿,明妃万里送芳心。”

在香溪河,关于王昭君的传说是太多太多了。昭君院宅下有一座桥,名琵琶桥。而走过这桥,楠木井便呈现在你面前了。一棵高大的千年核桃树,掩映着一口石砌方井。那两人难以合抱的树说是昭君姑娘栽种的。1978年12月13日,郭沫若先生的夫人于立群来到这里,兴之所至,为楠木井题了名匾。那匾现竖于井旁。说来,这井也是太有故事了。前些年,我曾作过一些叙述:昭君姑娘小时候非常聪慧。当时宝坪村的人饮水非常困难,只有一口小井。这井水被一条小黄龙搅得浑浑浊浊的,洗不能洗,饮不能饮。昭君与众姐妹商议,要赶走黄龙。她们开始挖井,七七四十九天,开挖成了,黄龙

也真的走了。昭君姑娘还特地去深山,请人伐了一棵宝树——古楠木,横在井下锁住了这井的灵气。井水从此便清冽晶莹,用这水洗脸,洗得脸红润白皙,用这水洗菜,洗得菜碧绿青翠……少女昭君就被洗成了国色天香。

这些年,在王昭君的婆家地呼和浩特市也兴起了一股“昭君文化”热。王昭君已成为呼市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自然,在昭君的娘家地又岂有不热之理?在鄂西旅游文化圈的大规划之中,一个浩大的昭君文化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婆家和娘家来往也日益甚密。昭君文化节,昭君文化论坛一茬接着一茬的。前年,在娘家之地,在香溪河边,一个仿汉代建筑的旅游新镇扶摇而起了。这镇就叫昭君镇。一位来自内蒙古的老领导为昭君镇揭了牌,当那红纱缓缓落下,当那“昭君镇”三个字历历呈现时,他落下了热泪……我知道,那热泪中有情,那泪中有对未来的期盼。

就在那些天里,有两件事是叫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有一位我国的外交官,他是1961年就离开了香溪河,离开了这王昭君的故乡。现在他也是饱含虔诚之心重访“王昭君”的,离开这儿五十年来了,他对家乡仍是那么情重。虽然已是白发苍苍,但他仍旧说得那么情真意切:“作为一名外交官,我曾漫游俄罗斯大地,走过异国的许多名山大川,乌拉尔俘虏过我的心,伏尔加让我一见钟情,但这颗爱的心啊,始终紧贴在美丽的香溪河上。”这正是因为香溪河养育了最美丽的姑娘王昭君,养育了这位杰出的“东方和平天使”啊!

在昭君故里,我还会着几位来自祖国宝岛台湾苗栗县的客人。他们是专程来瞻仰昭君姑娘的。他们告诉我,他们家乡只供奉两位女性,一位是妈祖,另一位是王昭君了。这个中缘由我没有细打听,但他们的虔诚是让我折服的。这次他们来访,还专门送来了一尊金质的昭君塑像……

在昭君故里,能听到这感人肺腑的动容之言,能看到这拨人心弦的动魄一幕,又叫我怎能忘却?也许朋友们来到这里,比我听到的故事、看到的情景还要动人哩!

现在,三峡大坝耸立起来,高峡平湖呈现在世人面前,香溪河水位提升了,也变得更清澈、更美丽了,游船可以直达昭君镇,通达昭君院宅了。走在香溪河上,你将会更加感受到,流淌在香溪河里的水,那是对昭君姑娘的永远记忆,那更是对这位“东方和平天使”的永远赞歌!

香溪是因昭君姑娘而香的。现在香溪也因昭君姑娘而远走流长。昭君是属于香溪的,她也是属于三峡的,属于长江的,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

昭君,她也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

作者吴绪久,男,汉族,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在水一方有佳人

魏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一条玉带般清澈的河流,名为香溪河,蜿蜒于青山翠谷之间。你,昭君,亭亭玉立于古老的香溪河岸,一袭白衣,飘逸如仙。你的双眸,清澈明净如香溪河水;你的嘴角笑意盈盈,如三月里初绽的桃花;你的纤纤素手,萦绕着诗句的芬芳……我站在你的雕像前,满怀虔诚,以朝圣的心情面对你。我知道,读你,需要用心灵。就这样,注视你的双眸,渐渐走进那个两千多年前的故事中去……

你和早你三百年出生的屈原大夫同饮香溪河水长大,一溪芳香的河流喂养了你的婉柔与屈原的清雅。你徘徊在橘园,吟诵着“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吟诵着“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你从小吟诵着他的诗词成长,涤濯于清澈的水流里,蕴涵在明媚的青山中,怀拥着对家国满腔的爱恋。

公元前36年3月,一个桃花开遍香溪河两岸的日子,一道圣旨,16岁的你被选入宫中当秀女。你乘坐雕花龙舟顺香溪河而去,船头的你,泪眼

婆娑。这一别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家乡,再见父老。你的眼泪湿透了手帕,在河中轻濯手帕,连河水也沾染了你的愁绪与幽香,自此更名为香溪。河岸两边的桃花不忍你孤单前行,纷纷落入水中,化为桃花鱼,一路伴你远行。自此年年春来,桃花鱼便会逆流而上回到香溪河,等候你的归来。

公元前33年3月,一个芳草碧连天的日子,你自动请行出塞和亲,惊讶了众人。你用你柔弱的双肩担负起民族和平的重任,可是你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从此后,你将要过那种“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的生活,再也回不到养育你的家乡,再也见不到那蜿蜒流长的香溪。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你披着大红斗篷,猎猎风沙扬起斗篷,你在马上弹起了悠扬的琵琶。或许唯有天上大雁懂了你的哀思,落下在你身边抚慰你的忧愁,大漠黄沙悠悠,只留下“落雁”的千古佳话。

三年后,呼韩邪单于故去,按当时胡俗,父死,

子娶父后妻。按中原的儒家文化来说,这就是乱伦之道,天理不容。你想回到家乡,可是汉朝皇帝的一道“从胡俗”的命令,却将你牢牢困在了胡地,而和亲带来的和平不能成为昙花一现,于是你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宽广心胸接纳了这一宿命。

或许是与“三”这个数字有缘,在你三十三岁正值生命绚烂如夏花的时候,你离开了这个世界,安息在大草原深处。在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畔的青冢,经历两千多年漫长岁月,33米高的巨大土冢上,仍然是草木葱茏,奇花生香,游人朝拜如织。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有位佳人,在水之涘。”

昭君,你就是那位在水之涘的佳人。你风姿绰约伫立于古老的香溪河岸,你的目光宁静、优雅、淡定、从容。你的心中没有恨,没有怨,一种幸福的芬芳氤氲在心中。你的目光飞越千山万水,飞到了你生活过的大草原,那儿,有热爱你、敬仰你的草原子民,他们亲热地称呼你为“长江的女儿,草原的母亲,和平的使者”。

为了纪念昭君出塞,汉朝改国号为“竟宁”,匈奴

单于封你为“宁胡阏氏”。与你同时代的焦延寿赞扬你说:“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合结好,昭君是福。”近代邓拓曰:“塞外月圆花好,千里绿洲芳草。巾帼有英才,怨何来!”是啊,你不会有怨。记得前年参加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希拉穆仁草原游玩后上车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一位内蒙古小伙子跑上车和我热烈地握起手来,他激动地说:“感谢昭君娘娘家乡的亲人们,是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呀!昭君是福啊!”他激动地语无伦次地说着,“在你们来之前,今年草原上只下过两场雨。一定是昭君娘娘让你们带来的雨呀,昭君是福,昭君是福哦!”原来在草原人民的心中,你已不是普通的历史人物,而是庇护他们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的女神啊!昭君,你能成为人们心中的女神,成为他们的福星,何怨之有呢?你是人民之福,国家之福啊!

昭君,在水一方的佳人,我要溯洄从之,溯游从之,来到你的身旁。

作者魏平,女,汉族,湖北省兴山县职业中学教师。



《昭君和番》插图

影像·读图



风物志

一条文化的河流

■ 王进

一条河,仿佛一款玉带,发轫于始祖炎帝曾采药构架于兹的神农架,从昭君村蜿蜒而过,又经了屈原故里,汇入浩浩荡荡的长江。

这全长不过百余里的河流,便是有名的香溪河。说它有名,不仅因为它是曾经抚育过始祖神农、诗人屈原、美人王昭君的母亲河,同时,香溪河流域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文化走廊。

香溪河是神奇的。只说这名字,便是一道妙曼的风景,如梦如幻,给人无限的遐想。关于名称的来历,有许多神奇的传说。或曰,“昭君临水而居,恒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或曰,昭君出塞前曾在溪边洗脸梳妆,无意间将颈项上的珍珠遗落在溪流里,从此溪水含香;或曰,“香溪水味甚美,常清浊相间,作碧腻色,两岸多香草,故名香溪”;或曰,神农曾在这一带采药,不慎将装有草药的木箱落入河中,被河水冲走,人们为纪念神农采药医病的功德,便将这条溪流叫做“木箱溪”。当然,神农采药的故事已经过于久远,考证无凭,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昭君却是真真切切的,两岸芬芳的杜若兰芷也是真真切切的。那荡漾的碧波,氤氲的雾霭,翠绿的香草,没有理由不让人相信,那一溪玉液,原本就蕴涵着无尽的芬芳。涉足水中,一种温馨浪漫的感觉从脚底一直漫漶过心头,不觉间便洗去许多浮华和尘嚣。

香溪河是厚重的。这百余里的流域,曾经是古楚始封地,是孕育楚文化的摇篮。在香溪河南岸,即今古夫镇邓家坝,有古高阳城遗址,距今至少已逾3000年。“兴山县旧治高阳城。高阳城在兴山县西,楚旧城也。”(《旧唐书·地理志》)。“兴山县,吴置,属建平郡,有古夔子城,有昭君村。汉宫女王嫱,此乡人也……”(宋《輿地广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其《离骚》的篇首,便开宗明义,道出了自己的身世,表明自己系高阳帝的后代。“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尝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尝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拆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后也……”(《史记·楚世家》)。“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关于高阳帝,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因忙于国事,对他的么儿子昌意没多加管教。昌意胡作非为,好吃懒做,很不成器,黄帝一气之下,将他罚到四川境内的若水去牧羊,昌意在那里与懒婆成亲,生下了儿子高阳。高阳坠地不久,遇上天穿地流发大水,这苦命的孩子被山洪冲走,幸被一条好心的婆子龙救起。婆子龙给他喂鹿奶,灌鱼汤,背着他翻峨眉、过瞿塘,来到兴山县境内的仙侣山,高阳在婆子龙的哺育教养下,长大成人。他身躯高大,勇猛异常,斗群魔、驱虎豹,为民除害、造福,深得黎民爱戴,被推为“山大王”。仙侣山下有一块“二龙戏珠”(两条溪流在此汇合,绕着一个山包转,山包呈圆锥形,人称珠宝,又叫龙珠)的风水宝地,高阳便在这里造城池,建基业。从此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人们便将这里取名为丰邑坪,又称高阳城。

在香溪河入江口,有古夔子国,亦即楚之附属国,公元前634年为楚所灭。“周文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归州巴东县东南四里归故城,楚子熊绎之始国也。又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輿地志云秭归县东有丹阳城,周回八里,熊绎始封也。”(《括地志》)高阳城与夔子国,皆位于香溪河岸边,相距不过五六十里,且相互印证了历史上关于楚世家立国创业的记载。

“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地。”(《史记·孔子世家》)“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褴褛,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先楚以区区50里封地,勤劳耕作,励精图治,开疆拓土,经数代人努力,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春秋时期群侯争霸的超级大国,终发展为北抵黄河,东至江南,南达两广,地跨南方七省的千里版图,成为春秋战国列强里国土最为辽阔的国家。谁又能想到,这短短的香溪河流域,会是泱泱大楚的发祥之地呢!

香溪河是诗意的。楚君熊绎立国约七百余年后,从这里走出了中国诗歌鼻祖、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豪之一的屈原。屈原为楚国贵族,香溪河南岸7公里处的乐平里是其故里。历史上,曾有人质疑,在这穷乡僻壤,何以诞生了这等超重量级历史人物。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香溪河流域,本身就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摇篮,先楚贵族,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一代代楚君从这里起步,逐渐向长江中下游发展,直至问鼎中原,吞并百越,创下惊世的伟业。从这里,也传承出了“筮路褴褛,以启山林”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精神。香溪河是孕育诗歌的沃土。那两岸的香草,更是滋润楚辞不可或缺的元素。“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经统计,屈原仅在《离骚》中提到的香溪河畔植物,就多达六十余种。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高贵的精灵,赋予了屈原高洁的品性。近三百年后,沿着先贤的脚步,

又走出了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更让香溪河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衰的诗歌长廊。而香溪河畔至今仍然流传的世界独具特色的“兴山特性三度体系民歌”，被音乐界誉为“古楚音乐活化石”，它们完整地保留了古楚音乐体系，尚可用隋州曾侯乙墓编钟演奏，可谓世界奇迹。倾听香溪河日夜不息的涛声，似乎还能听到那已经久远的楚辞，和那抑扬顿挫的歌吟。

香溪河是美丽的。“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簿雨匀山黛，村容上晓妆。昭君浣沙处，溪水至今香。”香溪河从昭君村蜿蜒东去，仿佛明妃随手遗落的一条飘逸的丝带，又似一壶冰清玉洁的流觞，洗去了世俗的浮华，让这条短短的河

流，在历史长河中久久地高蹈。正是它，滋养了“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的绝世佳人王昭君。曾在此生活了 16 载的王昭君，也为香溪河留下了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昭君渡，珍珠潭，回水沱，离乡滩，小礼溪，大礼溪，还有那传说是昭君的眼泪化成、美丽绝伦的桃花鱼，无不是一首首千年吟诵的传奇。

香溪河既是厚重的，又是灵动的；既是刚毅的，又是温柔的；既是深沉的，又是清浅的。那是一条承载了太多文化禀赋的河流，也是一条永远也淌不过的历史的大河。

作者王进，男，汉族，湖北省兴山县文联副主席、昭君文化研究室主任。

影像·读图



昭君宅

坐落于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兴山县人民政府 1984 年建



“昭君请嫁”访谈录

■ 蒋方 吉晶晶

吉晶晶(以下简称“吉”):两千多年前,美丽的香溪河畔,诞生过两位千古流芳的人物,一位是诗人屈原,一位是美人昭君。可否请您说说昭君的故事?

蒋方(以下称“蒋”):王昭君是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汉元帝建昭元年,下诏征集天下美女补充后宫,王昭君因为出众的容貌,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掖庭待诏。所谓“掖庭待诏”,相当于是“备选嫔妃”,是一群特殊的宫女,随时准备接受皇帝的宠幸,从而获得嫔妃的名分。王昭君就是这样一个待诏的女子。

一、野史让毛延寿“背黑锅”

吉:提起“昭君出塞”,人们常会说起一段典故:因为昭君不肯向宫廷画师毛延寿行贿,才导致其画像被刻意丑化,并加了一粒“克夫痣”,无法得到皇帝的赏识……之后,才有了和亲的机缘。

蒋:据正史《汉书·南匈奴传》、《汉纪》、《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出塞是“自请行”,说明她“自愿出塞”,并未提到任何画工、画像的事情。

而毛延寿丑化昭君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晋的《西京杂记》,然后在诗词、传

奇、戏曲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描绘叙述,但在正史中却一直没有记载。在这部笔记小说集中,昭君是因为不甘行贿,被刻意画丑,致使元帝失察,而“被迫出塞”。比照之下,野史中的“被迫”说与正史中的“自愿”说两相矛盾。所以,这段传说很可能是虚构的,毛延寿成了“背黑锅”的人物。

二、宫女出塞的政治机缘

吉:汉朝历次派往和亲的都是公主身份,为何到了汉元帝,却是从自己的后宫中选人?

蒋:从汉高祖刘邦的“白登之围”开始,和亲就是一项解决匈奴问题的基本国策,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汉高祖为解决边境问题,亲率大军与匈奴开战,结果打不过,还被围在白登,差点丢了老命。实在没办法了,就与匈奴和谈,找个诸侯王的女儿,顶着公主的名义嫁过去。汉武帝时期,有两位“乌孙公主”,一个叫刘细君,一个叫刘解忧,都是没落王族的后人,先后嫁给了乌孙国王。这也是为了联合乌孙,夹击匈奴。

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到汉元帝的时候,匈奴已经是“大虚弱”,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多的时候,有五个单于在互相攻伐。后来,剩下了两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哥哥郅支单于。这时候,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地步,也就是依附汉朝的一方才能存活下来。呼韩邪单于就主动臣服了,不远万里来求亲。他与汉元帝年龄相仿,却“自请为婿”,汉元帝爽快地答应了这门政治婚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赏亲”。

吉:匈奴强大的时候,和亲的是皇家女儿;汉朝强大的时候,和亲的却是平民出身的宫女。是因为国力差异么?

蒋:从汉朝君臣方面来看,对和亲女子的选择极为慎重。汉高祖和汉武帝时代,打不过匈奴,就选派宗室贵族之女,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嫁过去,两国名义上是兄弟之邦,但单于成了皇帝的女婿,汉朝就在辈分上占了匈奴的“便宜”。等到汉元帝时

期,面对第一位主动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既然人家“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也就放低了姿态,不“占人便宜”,实实在在做起了兄弟之邦。正因为昭君这个“掖庭待诏”的身份,还不是皇帝的妃子,但从辈分上来说,又是皇帝的女人,所以她才有机会远嫁匈奴。对于平民出身的女子而言,这个和亲的机缘,本身也是千载一遇。

三、“自请行”透出昭君性格

吉:和亲是个苦差事,昭君为何与众不同,自请出塞呢?只是出于民族大义么?

蒋: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根据这段史料,有人认为,“积悲怨”是她自愿出塞的动机。

在我看来,昭君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的女子。她的“自请行”,显露出其“不甘”的个性。原本,从她被选送进宫的那天起,命运就不由自己掌握了。所以,当和亲成为她唯一改变命运的出路时,她牢牢抓住了机会。不管结果如何,她或许只是想着,一生中能为自己拿个主意,这就足够了。而她在临辞大会上“丰容靓饰”,精心打扮自己,也体现了她对此事的果敢与郑重。

吉:后宫历来是女子们争宠的战场。昭君待诏数年,或许早已看透了宫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蒋:的确,这也体现出昭君聪慧的一面。试想,一个良家女子,迫于封建权威,被选进“掖庭”,听候“见御”,纵使获得百般恩宠,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甚至贵为皇后、宠妃,往往也并没有好下场。更何况,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以“待诏”地位希冀君王临幸,自然是渺茫无期的。以昭君的性格来看,她久居深宫,深悉其中黑暗,不以受君王宠爱为荣,也不甘在这样的等待中终老白头。恰在这时,有了单于求亲的机会,使她有了正当、堂皇的理由,她的奋起自请出塞,是意料之中的选

择。

吉：昭君生长于鄂西一带，淳朴的山野生活是否陶冶了她的性情？

蒋：昭君的自愿和亲，显出她性格中野性、刚强的一面。她的家乡在秭归香溪，此地历来是“蛮夷”杂居之地，有许多少数民族，当地的民风民气对她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少，受刚勇倔强的民风习染较多，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等。更主要的，则是受同乡屈原遗风的影响。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反抗斗争的勇气，高尚峻洁的人格，都与昭君的性格行为有很多相通之处。

两千多年前，一位弱质女子，敢为自己的人生赌一把，相当不简单！她的奋身一跃，跳出了一个历史高度！放眼当下，有些人抱怨，没有机会选择命运，感到很无奈；有些人则纠结，面对选择的机会，却又感到困惑，总是瞻前顾后……不妨想想昭君吧，“不甘”的性格，也许能成为你人生的动力！

四、忍辱负重为民族造福

吉：到匈奴后，昭君的日子过得怎样？

蒋：昭君出塞这年，汉元帝下诏改元为“竟宁”，意思是给边境带来和平安宁。从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看，她在塞外和匈奴人相处得很融洽，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她十分认真地履行自己的政治使命，过着住穹庐、衣毡裘、食畜肉、饮酪浆的游牧生活，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伊屠知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吉：据说，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又嫁给了他的儿子，对任何一个汉家女子而言，这都是悖伦理的。

蒋：照西域游牧民族的风俗，“父死妻其小妻”——只要继位的不是亲生儿子，你就必须嫁给继子或者继孙。这是胡人的风俗制度，一旦和亲，就意味着可能会嫁很多次。这种羞辱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担的。所以，大部分和亲的公主们都抑郁而死。

昭君出塞两年半，呼韩邪单于就死了，其前妻之子雕陶莫皋继位，昭君只得入乡随俗，嫁给继子，还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不得不说，在稳固汉匈友好关系上，昭君的确是深明大义。

吉：或许在昭君最初自愿和亲时，她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并未想过太多的民族大义。可事实上，她的作为确实为边境带来了安宁。

蒋：昭君的历史功绩，不仅是她主动和亲，更主要的是她出塞之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边塞的烽烟熄灭了五十多年。当时，老百姓对她的跨族婚姻，是很欣赏、很赞同的。据考证，自昭君出塞不久，民间就产生了与她有关的文学作品和歌舞。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就赞扬昭君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合结好，昭君是福。”肯定昭君出塞是为了民族间“交合结好”，肯定昭君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出于偏远山村的王昭君，以她的独立精神和刚强性格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在后世都让人们惊叹的选择，成就了历史的因缘际会，带来了汉与匈奴在一个时期里的和平交往，而她本人，也成为了历代文人题咏的对象，被送进“中国四大美女”之列，事迹成为中国小说、戏曲的题材，在中国社会拥有许多喜爱她的“粉丝”。直到今天，谈起王昭君，我们都会怀着一份敬重之心。

作者蒋方，女，汉族，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



中国第一个研究昭君文化的 社会团体组织

■ 李世馨

1998年3月,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研究昭君文化的社团组织正式诞生。

一、背景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郊,有一座被誉为“青冢”的汉代遗迹。自唐·杜佑《通典》:“金河有长城,有金河上长城,紫河及象水……李陵台,王昭君墓。”记载以来,这座“晨如峰,午如钟,西如枞”的遗址,就一直被认为是公元前33年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的墓葬。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盛赞:“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自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与呼韩邪单于和亲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词、曲、戏剧、小说、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电视剧、歌剧、舞

剧、交响乐、邮票、工艺美术品等等,被连续不断,推陈出新地创作出来,每个时代的各种文学艺术体裁都有关于昭君的创作和演绎。在我编辑《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时的不完全统计,仅诗词就有1300多首。如此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跨越时空、不约而同地倾心、青睐昭君题材创作,这样的文化现象令人深思,正是社会科学应该研究的课题。

到了近代,我国开始出现关于昭君问题的研究论文,国外也开始有学者研究昭君及以昭君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并且发表了一些著作。另外,昭君开始以广告画或商标的形式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来。如1903年英美烟草公司的王昭君彩色香烟招贴广告画,日本元芳洋行的昭君出塞火柴商标,英国老巴夺公司的昭君出塞月份牌,美国德士古公司的昭君辞汉煤油广告画,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种文学艺术体裁的昭君题材作品更是层出不穷,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逐渐进入到文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出现了以昭君命名的商品、企业甚至社区。如昭君烟、昭君驼绒、昭君大酒店、昭君集团、昭君花园、昭君新村等。随着昭君逐步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昭君问题研究也更加拓宽领域,逐渐进入了美学、民族学、经济学、企业文化等领域。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昭君题材历久不衰的内在社会因素,以及与人类和谐发展之共性问题。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关于昭君问题、昭君现象的研究者、学者。如翦伯赞、林幹、可永雪、林丽珠、崔明德、王翠、吴郁芳、马冀等等。也出现了关于昭君题材的创作和评论者,如田汉、曹禺、郭沫若等。加之后来的爱好者、传播者的不断出现,一些企业家也开始以昭君文化构建自身的企业文化。

昭君渗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并成为产品名和企业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历代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学者对昭君的青睐,使昭君成为真善美的化身、道德的榜样。如此美好的品质、形象,让昭君成为形象代言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北京晨报》1999年10月底新华社记者汤记报道,河南省政协的专家和企业家到内蒙古考察,发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最早的涉外酒店叫“昭君大酒店”,最好的中音马头琴叫“昭君马头琴”,最早的药用黄酒叫“昭君黄酒”,开发区的集团叫“昭君集团”,受欢迎的香烟叫“昭君香烟”,火柴叫“昭君火柴”,还有昭君驼绒被、昭君新村样板住宅小区等等。深入研究后发现“昭君品牌热”背后是“昭君文化潮”,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有口皆碑,历两千年而不衰。该考察团的一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工商博士提出:要花1亿元买断昭君品牌,因品牌无形资产早已过亿而未果。

这些现象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社会科学界进行系统研究,需要经济理论界分析探索,加之企业界建设企业文化的需求,可为研究探索提供财力物力支持,因而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的学术基础、人才储备、经费支持就已经完备。

虽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呼和浩特,已经以草原第一歌《敕勒歌》闻名,以草原第一城“云中城”定位,以草原第一都“盛乐古都”荣耀,但从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的角度看,她是以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构成了最有说服力的人文环境和投资亮点。但是其中两千年前胡汉和亲、昭君出塞的代表人物王昭君、呼韩邪单于等,是令我们引以为豪的有贡献的人物。

虽然艺术作品和戏剧舞台上的王昭君,多为悲剧性格,与悲苦、哀怨连在一起,但史料《后汉书·南匈奴传》及包头、呼和浩特等地的文物考古成果都雄辩地证明,王昭君是自愿出塞、深明大义,与呼韩邪单于情投意合,是促进汉族与匈奴玉帛交欢、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她不但至今活在湖北故乡人心里,而且至今活在北方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心中。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1961年实地调查,仅在大青山下的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就有多座昭君墓,这些地区的各族群众都说王昭君长眠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同宗、同根、同乡、同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董必武副主席1963年谒昭君墓时作了这样的评价: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舞文弄墨总徒劳。”

昭君出塞,以天下为一家;自愿和亲,使天下为一家。昭君文化是“两个人”的文化、两个民族的文化、民族大家庭的文化、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它所提示的“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合则一家,分则两伤”,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深层原因。这种“和睦相处,和谐共进”就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文明对话的成功范例,代表了人心向背的历史选择,是中华文化的先进内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借鉴,代表了世界大同的前进方向。

昭君是呼和浩特最著名的历史名人之一,是呼和浩特文艺创作最活跃的流行题材,是呼和浩特最有价值的经典品牌。昭君作为特殊的形象大使,已成为呼和浩特各族人民“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历史见证和城市名片,是投资软环境良好的天然广告。昭君文化是呼和浩特历史文化名城、沿边开放城市的标志性文化载体,是呼和浩特的特色文化,也是呼和浩特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呼和浩特民族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催化剂。

因此呼和浩特市委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社会科动态,把昭君文化作为首府的特色文化,批准了“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的申请。

二、成立经过

1997年下半年,我先后代表呼和浩特市文物处、呼和浩特市文化局开始走访在呼和浩特市工作生活的各界专家学者,如林幹、可永雪、余国钦、马冀、陆思贤、邵清隆、王大方、印洗尘、郝诚之、范轶然等。他们都是文化、文物、博物、艺术、经济、电影电视制作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参与过昭君题材的创作和制作。通过这些专家学者联络相关领域学者,共同探讨成立昭君文化研究会的可行性、必要性。后在呼和浩特市文物处、呼和浩特市文化局的支持下,赴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兴山县(昭君家乡)联络当地文化部门商讨成立昭君文化研

究会事宜。

与此同时,内蒙古民族集团、内蒙古烟草专卖局(公司)等与昭君相关的企业,也在商讨成立昭君文化研究会事宜。他们找到了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外宣处郭兰柱同志,请求帮助协调。于是,1997年12月组建“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筹备处”成员有郭兰柱、董文琇(呼和浩特市文物处处长)、李世馨。并向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申请成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1998年3月3日,呼和浩特社科联批复同意成立。1998年3月26日召开“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选举中共呼和浩特市委郝存柱副书记为会长、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巴特尔部长、宋彩云副部长、王绥林副部长、内蒙古大学林幹教授、内蒙古政协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郝诚之、内蒙古民族集团云文广总裁、内蒙古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公司)董晓民局长(总经理)为副会长,郭兰柱为秘书长、董文琇为副秘书长。经呼和浩特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办公室注册,登记证号为社证字F059号。至此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

三、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的积极贡献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首倡“昭君文化”,组织专家深入研究,搞了多次有影响的活动,包括在湖北兴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分别召开昭君文化研究会,组织专家先后编辑出版了《昭君文化丛书》(一套5本)、《东方和平天使——王昭君》(小说)、《昭君文化高层论坛文集》、《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昭君文化研究和传播大事记》等,并围绕“提炼昭君文化,擦亮历史名城”主题,推出一批成果,引起社会关注。

1. 倡议举办“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原来文化部门每年举办的“昭君庙会”的基础上,提升到由市委、政府主办的大型节庆活动。2005年5月,《光明日报》称昭君文化节是“呼和浩特的城市名片”,是国内外知名的城市文化品牌。2005年

又被国际权威机构“国际节庆协会”评为中国十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节庆活动之一。成为提升呼和浩特形象,改善呼和浩特社会环境的有效举措。

2. 研究会以成果影响决策,深化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和呼和浩特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下发[2000]22号文件,把“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确定为首府文化。从而用形象的特色文化、先进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擦亮了历史文化名城,用名人文化和团结文化提升了呼和浩特的地位。

3. 中央、各省市自治区众多领导高度肯定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弘扬昭君文化的现实意义,希望将昭君文化发扬光大。

4. 昭君文化旅游作为新的跨省、跨国黄金线路,引起业内人士关注。2001年,在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和自治区作家协会、中国旅行社内蒙古分社负责同志的推荐下,俄罗斯国家旅游总局对外联络部部长库克汀先生和乌兰乌德市旅游局局长来华拜见呼和浩特市柳秀市长,共商联合开辟“茶叶之路”跨国旅游、重走王昭君从古长安到贝加尔湖的出塞和亲的草原丝路,寻找历史上明清两代称雄欧亚市场的旅蒙晋商的闪光足迹。“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进入全国性民族艺术重大节庆的行列,被国家旅游局正式列为全国100个民间艺术节活动之一。

5. 国内外新闻媒体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省市自治区新闻媒体,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都以整版、专访加按语推荐等方式扩大宣传。全国性媒体已刊发昭君文化的重要论文、图片、相关信息数千篇,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提高了呼和浩特市的文化品味。

6. 呼和浩特市正在成为昭君文化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及文化产业开发中心。七届“昭君文化理论研讨会”和五届“昭君文化高层论坛”共收到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论文数百篇,都分别结集出版。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组织编纂的国内第

一套对昭君文化进行理论性、系统化研究的学术著作《昭君文化丛书》,由林幹教授主编,200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马冀教授的《昭君文化研究》、郝诚之编审主编的《昭君文化与民族经济》、可永雪教授和余国钦教授主编的《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作家巴特尔主编的《昭君论文选》和李世馨文博馆员主编的《昭君图册》。《昭君文化丛书》集昭君文化理论研究、昭君经济现象探析、昭君文化研究动态、昭君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以及形象化的昭君文化载体,包括遗迹、著作、活动等,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把昭君文化以全景方式介绍给读者,是昭君文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昭君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在呼和浩特社会科学界是一件大事,也是全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版标志着昭君文化信息中心、研究中心在呼和浩特正式形成。

7. 为企业服务,与企业联手,初步建起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机制。《北京晨报》报道,内蒙古企业争打“昭君牌”,昭君商标1亿不卖。伊利乳业集团大作智力广告,市政府将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结合,组织“昭君归故里,伊利送真情”学习考察团,赴湖北等地宣传昭君文化,开拓奶业市场,显示了政府驾驭市场、培育品牌、文化搭桥、经贸唱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能力,社会反响很好。

“昭君品牌热”风靡内蒙古和湖北,“昭君”黄酒、“昭君”香烟、“昭君”茶、“昭君”杯、“昭君”牌马头琴、“昭君”牌防蛀储香驼绒被、昭君大酒店、《和亲宴》套餐、昭君美食城、昭君花园和昭君新村住宅小区等如雨后春笋出现。

8. “昭君文化热”蔚然成风。已从内蒙古自治区波及到外省,从万里蓝天到宝岛台湾,一直影响到大洋彼岸。河北省的知名企业兆君(昭君的谐音)羊绒衫厂已把昭君当做东方女性美、心灵美的形象大使,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落户,建立“昭君园区”;2001年8月,他们在国际大都市上海举行“‘民族经典兆君情’全国汇展”,以“国宝”羊绒的奢华、高贵、舒展,演绎现代民族服饰的精致、典雅与韵味,以自然、纯情、和谐的魅力

打动人心。让消费者领略“大漠风情”宽厚豁达与“和平使者”的冰清玉洁,品味“夜来香的清爽典雅”与“梦幻”的咖啡色彩。新闻界朋友评论说:“我们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相信,兆君羊绒服饰,把民族的精华与时代的风韵深深地融入了现代服饰中,在金秋色彩飞扬的季节,她将成为我们消费的主题。”该厂还与铁路部门联合,将呼和浩特到湖北武汉的火车冠名“兆君号”专列。内蒙古国际航空公司和宾悦大酒店、呼和浩特卷烟厂联合举办“昭君杯晚会”、“昭君杯空姐优质服务大赛”等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开放意识,歌颂朋友遍天下。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先后以“伊利情”、“乾坤缘”命名大型晚会,揭示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和“化对立为和谐”的崇高追求,在国内外造成良好的影响。美国拉斯维加斯市长在卫星电视交流节目中谈志向,说愿意当中国王昭君式的“和平友好使者”。日本友人宇野玄二先生主动参加2002年8月和200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昭君文化理论研讨会,畅谈了自己对中国王昭君形象认识的10年心路历程。2004年9月,联合国在我国湖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大会组委会确定《和亲使者王昭君》作为大会标志性雕塑。

9. 在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建议下,一批品味很高,艺术性、历史性相融的反映昭君文化的建筑、雕塑、道路和艺术作品应运而生。如高14.8m跨越29.8m,1997年7月12日竣工的、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题名的“和亲门”,长江三峡的大理石“昭君雕像”,和林格尔县的“昭君大道”等等,都以深刻的内涵和文化的品位,成了观光旅游的新景点。

10. 发起组织“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2006年下半年开始,赴北京、湖北、陕西等地走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建立全国性昭君文化研究机构。

四、昭君文化与世界同行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和谐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王昭君是中国四大佳丽之一,美名飞越八万里,横跨两千年。作为世界公认的“民族友好使者”,她是历史赐予内蒙古的一位最高尚、最受欢迎而又最靓丽的“形象大使”。

昭君品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是一种比较罕见的值得国内重视和研究的新文化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端“昭君黄酒”庆功,60年代“昭君”牌中音马头琴在千里草原歌唱,70年代“昭君”香烟悄然问世,到80年代内蒙古第一家合资涉外企业平地崛起(乌兰夫副主席亲题“昭君大酒店”),昭君商标一亿元不卖。企业家的感悟是深刻的:“看到了我的商品就看到了昭君;与其说企业在经营商品,不如说我们在经营品牌。”

昭君文化内涵丰富,有口皆碑,是一笔不可代替的中华财富。内蒙古和湖北都以昭君为荣,古往今来已有一千多首词来反映她。海峡两岸寻根找昭君,全球变“文明冲突”为“文明对话”议昭君。法兰西的专著、日本的国宝画、美国拉斯维加斯市长的心愿、香港的国际评论,都说明“化干戈为玉帛”是人类理想。从三峡岸边的“昭君石雕”到长城脚下的“昭君大道”,从航空小姐的“昭君杯”比赛,到高速列车的“兆君号”冠名,都验证了南方北方爱国一心、黄河长江文化一脉。

以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是我们新世纪的任务。昭君文化经济领域的众多演绎、众多挖掘、众多创新,让人大开眼界。从呼和浩特市市委、市政府用内涵丰富、定位独特、高雅文明的现代民族节日“昭君文化节”取代“把人变成神”的“昭君庙会”,从把昭君故事由“舞台形象”变为“历史真实”,从“被迫出塞”还原为“自愿和亲”,被扭曲的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貌。有平等才有真正的团结,有互信互利才有“真诚到永远”的交易。昭君文化是两个民族的平等文化、团结文化、谁也离不

开谁的互补文化。

现在,昭君文化作为诚信永远的见证,“美”文化、“和”文化的典范,引来了世界五大洲的目光。“像昭君一样看同胞、看天下”,“像昭君一样看草原、看历史、看呼和浩特”,已成了中外朋友的共识。从留学生回国建“昭君牧场”,到建筑师精心盖“昭君新村”;从舞剧《塞上昭君》获奖,到邮票《昭君出塞》争购,开放的昭君文化和开放的呼和浩特一起,像春风一样吹遍了中华,吹响了五洲,撒着春雨,播着绿色。

现在,一个叫响全国的民族友好日和一座城市连在了一起,一位千古流芳、光彩照人的民族友好使者和一座城市连在了一起,一套全国首推的《昭君文化丛书》研究成果和一座城市连在一起,一批现代“革命昭君”组成的群体和一座城市连在了一起,一种以草原经济崛起为标志的绿色文明和一座城市连在了一起,一个特殊的中华“和”文化的展示平台和一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这座城市就是中国·呼和浩特。一个以和谐求发展,

以发展促和谐,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化是撬动地球的杠杆。它是无形的,更是无价的。一次“昭君归故里,伊利献真情”的南北对话,创造了中国智力广告的新案例,为伊利雪糕打进“火炉城”武汉铺平了道路。“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的招商引资、艺术交流、科技合作,吸引世界各国朋友客商,相聚青城,互通有无,促进理解,共谋发展。展示了中国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变化,也显示着中国和平崛起、以邻为友、共创美好的诚意。从而雄辩地说明,历史名城呼和浩特在世人眼中成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正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现代化草原大都市,有着昭君般美丽、诚信、勇于创新的魅力城市,不但自古与伟大的中华同根,而且今日与发展的世界同行!

作者李世馨,男,汉族,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常务副秘书长、文博研究员。

影像·读图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场



《我与昭君》序

■ 贾方舟

春香要出书,约我写几句,盛情难却,不能不应。说来我们也算有点缘分,1986年,在呼和浩特市文化局领导下的昭君剧组讨论《塞上昭君》剧本,我的好友杜遼是当时的文化局领导,非要拉我去参加剧本讨论,我于戏剧是外行,本没有发言权,但又不能不从命。当时听了剧本的故事梗概,我就觉得昭君出塞以后的故事编得太复杂、内部争权夺利的情节太血腥,我不得不说出我的意见:写戏要有矛盾有冲突才会好看,但应考虑昭君是自告奋勇到塞外来和亲,一个年轻美貌的南方女子来到遥远的北方边陲,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怎么一来就让她身处这样复杂的人事环境、面对这样激烈的内部纷争?我觉得这样对她有些不公。我建议这个剧在整体上应该强化其“抒情性”的一面,弱化其“情节性”一面。尽力塑造一个从胸怀到外表都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美人”形象,这样才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不想我这个外行的意见得到回应,认为“言之成理”,后来修改剧本时还真的参照了我的意见。其实,我不过是作为一个男人本能地有一种“怜香惜玉”之情,体恤一个历史美人的生存机遇,想为她“解围”,让她在塞外生活得好一些。现在看来,这个意见也可以算是为扮演昭君的春香(虽然那时我还不认识她)“解围”了,这样她也可以在一种舒缓的氛围中轻松地演绎这个角色。

那时,春香还是艺术学校的学生,一个来自牧区的普通牧民的孩子。在昭君这个角色的激烈竞争中,她最终被选定为《塞上昭君》的一号人物——出演王昭君。那时,她正好和出塞时的昭君同龄(19岁)。演昭君这个经历,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件,也是成为影响她一生的大事件。作为一个演员,通过对历史上这样一位优秀女性的切身体验,使她的精神品质获得极大提升。

春香成功地出演昭君后,强烈的求知欲又促使她继续入学深造,先后在内蒙师范大学艺术系和中国音乐学院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她虽然离开了舞台,但却没有离开昭君。昭君成为她挥之不去的一个精神楷模。当她通过充实自己获得一定的文化底蕴后,她又策划和编导了民族歌舞《昭君出塞》,将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长调、呼麦和蒙古舞蹈融汇其中。至此,她仍然没有满足关于昭君的艺术想象和塑造,于是,她又从演昭君逐渐过渡到画昭君、书写昭君,决心做一个传播昭君文化的使者,以完成她的心愿和梦想。

离开自己的所学专业客串到书画领域并不是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她为此求师拜友,习字画画,狠下了一番功夫。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她很快得到长进。天生的灵气使她对飞动的笔墨有了自己的体会,她甚至从蒙古族对火神的信奉中感悟到“火”的气息有助于绘画和书法意象的形成。飞奔的骏马飘扬的马鬃和马尾,全然是烈焰般的气象。昭君身姿也能在旋动的运笔中形成。如果在人物的造型和书体的结构上再下些功夫,还能有更大的长进。每个专业都有它的知识体系和必修的技能,春香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优秀演员,没有必要去转行做一个专业画家或书法家,但多方面的修养和爱好,一定会提升她的文化品位和生活品质。能歌善舞、能写会画,这样全面的艺术技能和兴趣爱好,最终都会构成对一个人的精神滋补,塑造出一个从艺者有底蕴、有内涵的文化形象。

春香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迈进,祝愿她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羽翼丰满的从艺者。

作者贾方舟,男,汉族,美术评论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马蹄飞处绽春香

——为乌日勒春香著书《我与昭君》宣言

萧 宽

豪笔翰墨泼出一匹骏马——腾空鬃扬不见马蹄
那是你风驰电掣的笔痕留下飞白禅悟的时空
乌日勒春香——名字言行为人处世与书画和亲

飘逸诗情洋溢画魂啊哈哟陶冶性情颐养身心

诞生鄂尔多斯莽原梦幻成吉思汗呐喊些憾错代年轮
天生丽质慧内秀外率性纯真刚直不阿奠基再造风景
八十年代昭君史剧遍选精英坎坷幸运联袂芙蓉出水
掌声鲜花妒羨荣辱环球舞台开场谢幕交替日月碰杯

默然爵位恬淡名利不屑灯红笑对酒绿漫舞精神牧鞭
爱恋草原情依花草喜闻乳香梦绕篝火痴醉哈达芳心
叩问命运何来灵魂归宿逢场谈笑风生独尊哲思禅悟
新千年代或许阴差阳错可能意想不到眉扫文房四宝
铺纸挥毫泼墨流彩沉迷丹青顶礼国粹风靡画坛传闻
弹指岁月翩然参展入刊获奖证书叠加艺海直挂云帆
字画舞台登场酒瓶茶具饰品重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再著新书《我与昭君》更是美学评论大家贾方舟序

百变鬼才再次感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历史判官邮寄铁证——长江后浪推前浪！
为免前浪摔在沙滩上——前浪化铁雕塑巨人
一朵撒日朗花——在肩上飘香飘香……

作者萧宽，男，汉族，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书画院副院长。

读乌日勒春香《我与昭君》

滑国璋

南国由来孕丽姝，昭阳殿冷泣苍梧。
侍君岂肯屈权势，体己毋宁嫁朔胡。
百代姻亲能靖远，千秋青冢峙平芜。
汉官环佩今何在，独有春香出画图。

作者滑国璋，男，汉族，书画家，内蒙古文史馆馆员。

约稿函

《昭君文化》创刊了！诚恳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本刊开设栏目：论坛：刊登关于昭君文化的新观点、新论点。子栏目有：观点集萃、新论点。字数不限。研究：刊登昭君及其相关延伸拓展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理论探索论文。子栏目有：历史昭君、文艺昭君、文化昭君、传说昭君、产业昭君、呼韩邪研究、匈奴研究、北方民族研究、游牧文化研究、荆楚文化研究、和亲研究、民族研究、民俗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女性文化研究等。字数5000至10000字。新作苑：刊登歌颂王昭君的诗歌、散文、小说等。字数不限。赏析：刊登有关昭君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评论文章等。子栏目有：诗文赏析、书画欣赏等。字数4000字以内。记录：刊登传播、弘扬、研究昭君文化的人物、事件、活动记录。可配照片。子栏目有：活动剪影、回顾、研究者漫话等。字数3000字以内。作品窗口：介绍有关昭君的各种作品。子栏目有：国内作品、国外作品。字数500至1000字。新发现：刊登有关昭君的最新发现。风物志：刊登与昭君一生相关地区的风土人情、特色产品、历史故事等。子栏目有：故里风物、汉宫风物、漠北风物、呼和浩特风物等。字数2000字以内。昭君名商品和企业：刊登以昭君命名商品、商标、企业介绍。可配图片。字数1000字以内。

联系人：李世馨

电话：0471-5263784 13015212148

邮箱：13015212148@163.com QQ：875790820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亿峰岛物业办公楼三楼昭君文化研究会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昭君文化》编辑部